◎ 世界史精览 ◎

战盾不列颠

——丘吉尔再振日不落国威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战盾不列颠

——丘吉尔再振日不落国威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战盾不列颠
刘 泓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10.625 插页:4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9 000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3.00 元 (全 32 册)388.00 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录

第一章　性急的早产儿

显赫的布伦海姆宫的主人对马尔巴罗公爵的后嗣生在更衣室，感到不满意

1874年11月30日，大不列颠王国的马尔巴罗公爵正在自己祖传的布伦海姆宫举行舞会。

错落有秩的灯火，优雅轻柔的乐曲，一对对翩翩起舞的绅男淑女，使得这座古老而富丽堂煌的宫殿显得分外迷人。

在这些俊男靓女中有一位年轻的妇人很引人注目，她那身色调、质地都不同寻常的时装配上那套灿烂夺目的钻石首饰，不难让人猜测到她生活的富有程度。她不断地换着舞，频频地向周围的熟人打招呼，她做得是那么有分寸，热情

而又不失风度，平易近人中带有一种说不出的傲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她曾是位有过良好家教的姑娘。

尽管她竭力保持舞步的轻盈和平稳，但从她额头上细细的汗珠儿和轻轻的、稍显急促喘气中，可以感到她已有些力不从心。即使她努力把身体挺直，并将裙子的收腰放松来遮掩臃肿的腰身，却仍然让人无法不看出她已是位马上就要当母亲的人了。

这位美丽、活泼、好赶热闹而又十分贪玩的女人，就是伦道夫·丘吉尔夫人。

突然，丘吉尔夫人面部出现十分痛苦的表情，她对人说她感到非常不适，需要休息，周围的人们赶紧七手八脚地把她扶到就近的一间临时女更衣室，那里面堆满了大衣、帽子和毛皮围巾。不一会儿，一阵异常响亮的婴儿的啼哭从里面传了出来。一个健康的男婴哇哇大哭着来到人世。他长得非常结实，棕黄色的头发，有一个翘起的圆圆的鼻头，这一点很象他的马尔巴罗家族的祖先。

他虽是一个比一般孩子提前两个月出生的早产儿，但却表现出盎然的活力，他的哭声总是

那么嘹亮，以致于布伦海姆宫这座昔日幽静富丽的贵族庭院无法保持原有的宁静。这使得本来对这个名门之后竟然超前出世，并且竟然在那种不同寻常的环境中出世而感到有伤体面的马尔巴罗公爵夫人更觉脸上无光，她不只一次对人说："我生了不少孩子，他们的嗓门都够大的了，可是象这个新生儿这样厉害的叫声，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

没过多久，《泰晤士报》按着英国上层社会的传统，在头版登出了只有一句话的公告："伦道夫·丘吉尔夫人11月30日在布伦海姆宫早产一子。"当时以及后来都有人对"早产"持怀疑态度，有人说："我们无法断定孩子提前出世是由于他自己性急，还是由于他父亲伦道夫勋爵性急。"

温斯顿·丘吉尔就这样急匆匆地带着争议来到人世间，他不仅出生得急，在以后的国际、国内舞台上也是个急性子，他的政敌一直把他叫着"性急的年轻人"，更有甚者，称他为"性急的早产儿"。

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马尔巴罗家族第七代公爵约翰·温斯顿·斯潘

塞·丘吉尔和弗朗西斯公爵夫人（伦敦德里侯爵小姐）的第三个儿子。英国除王室外，公爵家族总共不超过20个，其中马尔巴罗家族按封爵次序列为第10位。英国贵族比其他国家的贵族更重视家族的古老性，因此他们总想证明自己的祖先是11世纪跟随威廉占领者来到不列颠群岛的诺曼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封建主。马尔巴罗公爵们也说自己的祖先是跟威廉来到不列颠群岛的诺曼人。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也没有人拿出一份确凿的证据说明这是无稽之谈。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丘吉尔的第一代祖先约翰·丘吉尔生活在17世纪，是多塞特郡的法律学家，铁杆保皇分子。1620年约翰·丘吉尔得子温斯顿·丘吉尔（本文主人公的第二代祖先）。

温斯顿22岁从军，在17世纪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为国王查理一世作战。1643年5月，已升为上尉的温斯顿·丘吉尔利用战事不甚紧张的机会同德雷克夫人的女儿完婚。新娘的父亲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因参加16世纪海盗式远征和掠夺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领地而

闻名。他掠夺了大量财富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起分享，因而受到了女王的庇护，并受封爵士称号。

当时，丘吉尔与德雷克两家处于相互敌对的政治营垒。丘吉尔上尉为国王而战，而他岳父一家却站在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一边。然而，两家都认为政治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这桩婚事。丘吉尔家族这一特点在其后代的生活中还将多次出现——从来不把对政治原则的忠诚置于对利害的权衡之上。

温斯顿·丘吉尔夫人共生了12个孩子，7个夭折，其余的都非常精明能干，并在一生中取得了很多成就，当然，他们的行为是颇不令人赞赏的。特别是其女阿拉贝拉及其子约翰都是靠不怎么光彩的手段青云直上的。

“丘吉尔一家同其他一些公爵家庭一样，最初是靠女人的堕落得以飞黄腾达的。”路易斯·布罗德在为丘吉尔作传时写道。

使丘吉尔家族取得成功并获得荣耀的是阿拉贝拉·丘吉尔。她的父亲几经周折才使得她当上了查理二世的兄弟约克公爵（后来的英王詹姆士二世）的侍女。起初，阿拉贝拉在约克公

爵夫人的宫中当女官，她在这个岗位上并不出名。她的相貌并不美，身材高大，面色苍白，瘦得简直皮包骨，可是后来她的地位却一下子高升了。下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阿拉贝拉的命运：

一天，阿拉贝拉骑马游玩，马奔跑起来，阿拉贝拉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因为马跑得很快，她被摔得很重、很疼，然而，这一跤却给阿拉贝拉带来种种好运。她安然无恙，并且一下子消除了因为她容貌丑陋给人们的不良印象。公爵急忙跑过去，想帮她一下……聚集在阿拉贝拉周围的人看到她躺在地上的姿态极为不雅，他们简直难以相信，那双好看的腿居然长在这样丑陋的丘吉尔小姐身上。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公爵对阿拉贝拉的温情日益加深。约克公爵同阿拉贝拉共生了 4 个孩子，他们都在英国贵族中占有显赫的地位。

阿拉贝拉的兄弟也跟着她地位的升迁扶摇直上。

约翰生于 1650 年，22 岁时已是骑兵上尉，两年后又升为龙骑兵团的上校，35 岁时得到男爵称号。1685 年 6 月，约翰·丘吉尔在一个重

大事件中大显身手。觊觎英国王位的蒙墨斯公爵在不列颠群岛登陆后，向布里斯托尔推进。温斯顿·丘吉尔立刻偕子约翰晋见国王詹姆士二世表示愿为效劳。约翰当即得到陆军准将军衔并受命镇压叛乱。在7月6日的交战中蒙墨斯兵败被俘，后被斩首。

年轻的准将漂亮，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他十分注意宫中的那些贵妇人，他这样做当然是有个人打算的。当时的英国社会流行这样一句话："谁是皇家的情人，谁就容易高升。"约翰经常为贵妇人们效劳。每次都能得到几千基尼，从而扩大了丘吉尔家族的财产，为家族带来了荣耀，并为马尔巴罗的世袭地位奠定了基础。在1701至1714年的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他在欧洲指挥英国和荷兰军队同法国人作战，取得了很大胜利。

约翰利用在欧洲指挥联军的地位，不仅在欧洲大陆掠夺，而且在英国本土从武器批发商那里勒索大量的钱财。他就这样把军人的荣誉变成了黄金。

约翰·丘吉尔的夫人萨拉·詹宁斯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进取心的女人，她得到安娜女王的

很大恩典。由于夫妇两人都占据着十分有利可图的地位，他们每年可以得到64325英镑的薪俸，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1702年，女王慷慨地封约翰·丘吉尔为公爵，从此以后，他成了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由于国家给予巨额奖金，加之马尔巴罗公爵夫妇受贿与投机取巧，丘吉尔一家积攒了大量财富。

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1722年死于中风，身后无直系继承人，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均在少年时代夭折。议会签署专门证书把马尔巴罗家族的爵位和领地转给了他的女儿亨丽埃塔，不久又由她转给了自己的侄儿查尔斯·斯潘塞。从那时起，斯潘塞·丘吉尔就成为马尔巴罗公爵世代相传的姓氏了。

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的后代既没有什么卓著的业绩，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他们仅仅在自己领地所在的那个郡参与国事。马尔巴罗公爵们大手大脚地挥霍着约翰·丘吉尔置办的财产。在家族经济变得拮据之后，年轻的马尔巴罗们开始通过同富贵的美国女人结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开始这种有利婚姻的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

按照英国法律规定，只有长子才有权继承爵位和领地。次子和幼子只能自己在政府、军队、殖民地行政当局或宗教界寻找出路，因此伦道夫无权继承马尔巴罗爵位和领地。他以优良的成绩读完大学后，打算从事政治活动。

1873年，24岁的伦道夫结识了正在欧洲旅行的美国百万富翁杰罗姆一家并决定同他的一个女儿詹妮结婚。詹妮的父亲伦纳德·杰罗姆个性刚强，不喜欢自己受任何约束，他酷爱赛马，还是个歌剧演唱家。他在美国建造了两个最早的赛马场，组织了一个私人歌剧院。他的妻子是一个有印第安血统的漂亮的美国女人。杰罗姆曾任美国驻的里亚斯特领事，但他对安静的外交工作不感兴趣，于是他放弃了领事工作，成了《纽约时报》的一个老板。事业使他离不开美国，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则大部分时间住在欧洲。

1873年8月，马尔巴罗公爵收到儿子伦道夫的来信。伦道夫在信中说，他打算同詹妮·杰罗姆结婚。父亲对儿子的决定持审慎态度，但儿子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决定。父亲拗不过儿子，但提出条件，等他在马尔巴罗公爵控制的布伦海

姆宫所在地伍德斯托克选区竞选取胜并进入议会之后，再举行婚礼。伦道夫不得已只好接受了父亲提出的条件。

伦道夫顺理成章地被选进了议会，于是在1874年4月与詹妮·杰罗姆结了婚。他妻子带来5万英镑的嫁妆，使他每年可以从中进款约3000英镑。父亲每年给伦道夫1100英镑，并在伦敦给了他一所舒适的房子。这一时期，伦道夫·丘吉尔在伦敦沉缅于和年轻的妻子度过上流社会的生活。

1874年11月30日伦道夫与詹妮生了一个儿子，并从丘吉尔家族传统名字中为他取名为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伦纳德是孩子的美国外公伦纳德·杰罗姆的名字。据说伦纳德家族也算美国的名门望族，温斯顿·丘吉尔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较远的亲缘关系，他们两人有个叫约翰·库克的共同祖先，库克的一个女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母亲上溯四世的曾祖母，另一个女儿是丘吉尔母亲的直系祖先。

詹妮醉身于上流社会花钱甚多的娱乐活动中

小温斯顿的出世使布伦海姆宫的主人们非常不安。这是因为温斯顿的伯父布伦德福德侯爵，即未来的马尔巴罗第八代公爵只有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唯一的继承人有个好歹，那么马尔巴罗的爵位和[illegible]顿·丘吉尔继承。有 20 多[illegible]直未失去做马尔巴罗爵位和领[illegible]。1895 年当 18 岁的康苏埃拉·[illegible]尔特[illegible]位著名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illegible]马[illegible]第九代公爵的妻子来到布伦[illegible]时[illegible]人（温斯顿·丘吉尔的祖母）对她说：“您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而且应该生儿子，不能让这个早产儿温斯顿继承公爵的爵位。”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而“早产儿”温斯顿·丘吉尔因此也就永远失去了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可能。但是，温斯顿并未因此而感到遗憾，因为他的功名心比继承爵位要大得多，仅仅这个崇高的爵位无疑是不能使他满足的。

温斯顿的母亲詹妮在布伦海姆宫是不受欢迎的。这大概是因为她的外貌、魅力、聪慧及活泼的性格都超过了布伦海姆宫有爵位的女人。所以，伦道夫·丘吉尔和妻子宁可离开布伦海姆宫住在伦敦。

这对年轻人家庭的年收入不仅足以使他们不致于受穷，而且还能生活得很舒服。但是他们自幼养成习惯，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因此他们常常入不敷出。詹妮醉心于上流社会花钱甚多的娱乐活动。伦道夫喜欢在自己家里设宴，慷慨地款待朋友。他是一位狂热的赛马爱好者，由于下了大笔的赌注，而输掉很多钱。

伦道夫跻身的上流社会对这对年轻夫妇印象颇佳。这是詹妮的美貌、聪敏和优雅风度起了作用。詹妮随母亲在巴黎居住多年，在与达官贵人的经常交往中养成了优雅的风度。此外，詹妮还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并且又善于写妙趣横生、感情细腻入微的书信。这样一来，英国贵族中的杰出人物都喜欢到伦道夫·丘吉尔的家中拜访，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更是伦道夫家的常客。

年轻的丘吉尔夫妇整天忙于各种社交和应

酬，顾不上照看尚在襁褓中的小温斯顿。当时的英国社会有个传统，那就是上流社会的人自己不教养孩子。温斯顿虽然是在他父亲的伦敦住所长大的，但实际上是由一个姓埃弗雷斯的保姆负责照料，因此，幼年时期的温斯顿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可对保姆的感情却愈来愈深，并且直到丘吉尔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时，还一直真挚地热爱她、尊重她。

由于上流社会出现一桩轰动一时的丑闻而使年轻的伦道夫夫妇在伦敦贵族社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丘吉尔的大多数传记作者对此事避而不谈，温斯顿本人也只说了几句措辞谨慎的话："伦道夫勋爵以其固有的急躁脾气和轻率的献身精神卷入他哥哥的纠葛，使上层人士深为不满。上流社会不再对他微笑了。强大的敌人希望贬低他，而他的敏感和自尊心把冷淡看成了凌辱。伦敦使他感到憎恶。这一创伤甚至过了八年多还没有治愈。"

这些话并没有说清事情的本质和来龙去脉。

事情是这样的：

伦道夫的哥哥伦德福德，也就是马尔巴罗

公爵爵位和领地的继承人，已是个为人夫人父的人，但是还拼命追求一个名叫艾基特·艾利斯福德的伯爵夫人。这在伦敦的上流社会本来也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然而它能引起轩然大波之处在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尔士（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也在追求这位年轻美貌的伯爵夫人，这就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威尔士王子为了接近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便让伯爵当自己的随从，并带他去印度旅行。布伦德福德利用伯爵和王子不在的机会，大大发展了同年轻的伯爵夫人的关系。王子和伯爵回到伦敦以后，这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了。威尔士王子要求伯爵以其妻子与布伦德福德的关系作为理由提出离婚诉讼。这对马尔巴罗公爵爵位的继承人来说是耻辱。同时，威尔士王子还坚持要求布伦德福德同妻子离婚并与伯爵夫人结婚。布伦德福德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不久，因为艾基特·艾利斯福特生了一个孩子，事情就更加糟糕了。

在伦敦的上层社会里，一部分人同情布伦德福德，另一部分人站在王子一边，伦道夫·丘吉尔完全站在自己哥哥一边，他为了维护哥哥

的情面，处事轻率，缺乏节制。

他四处放风："如果事情弄到法院，我将把威尔士王子写给艾利斯福德的几封信书公诸于世。"这种极为缺乏理智的鲁莽举动激怒了王子。威尔士王子于是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诺兰斯(伦道夫婚礼的男傧相)提出要同伦道夫决斗。伦道夫答复："我可以同王子指定的代理人决斗，但决不同未来的国王决斗。"

这件丑闻最后传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女王觉得既伤面子，处理起来也颇棘手，所以只好请首相迪斯累利和在野党领袖哈廷顿出面调停。结果，伦道夫只好按照大法官的授意，书面向威尔士王子道歉。

但是，王子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声称："谁家接待伦道夫·丘吉尔，我就决不登谁家的门!"很自然，贵族社会谁也不想冒与王室公开决裂的风险，因此伦道夫夫妇到处吃闭门羹。

这对伦道夫·丘吉尔来说的的确确是一场灾难。迪斯累利首相出于多年的交情想办法帮伦道夫找了一个暂时的出路。

首相建议伦道夫的父亲马尔巴罗公爵出任爱尔兰总督，目的是想让伦道夫作为公爵的秘

书同公爵一起前往爱尔兰。

虽然担任这个职务开销很大，但苦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马尔巴罗公爵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与儿子及儿媳、孙子一起前往都柏林。他们无可奈何地在爱尔兰熬过了三年的时光，直到1880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政府上台后才免去公爵的这一职务。

1875年以后，英国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从表面上看，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风貌似乎依然如昔，但这一时期不列颠外部的发展已出现新的趋势。年轻的工业国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而在这些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英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却在日益落后。这种形势表明，英国在工业领域和外贸领域的世界垄断地位很快将成为历史。

更令英国人苦恼的是，在1875年至1900年间，经济危机几乎无时不在影响英帝国经济的发展。这是当时英国所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最严重的危机。工业危机伴随着农业危机。危机过程发展的结果使国内阶级矛盾加剧，英国同其他世界强国之间的对抗激化，因此，国内政治生活也出现了新的趋势。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从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的工人运动也活跃起来了，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组织，国内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也广为发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表面上是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竭力使劳动大众脱离社会主义的费边社。

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势迫使英国各个政党着手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活动。保守党和自由党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初期建立的，它们是当时英国两个主要政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形成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即由在下院选举中获得多数的党组织政府，另一个党在议会中充当反对党；反对党时刻准备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由于英国经济、政治发展出现了新趋势，保守党和自由党迫切需要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探索新的政策思想，以便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仍能对日益增加的选民施加影响。在寻求新政策思想的同时，各政党还研究了开展活动的组织形式。

保守党和自由党展开了竞争，看谁能更好地充当人民的代表。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提出了一个所谓民主托利主义的含糊纲领。自由党

当时处于瓦解的最初阶段，以前它打的是贸易自由和企业自主的旗号，19世纪中期，在英国占据世界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这一主张还是行得通的，而19世纪末，世界市场已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自由贸易主义已不合时宜，于是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放弃了这一原则，投向保守党阵营，尽管如此，自由贸易主义仍然是自由党多年来信念的象征。

当伦道夫意识到他在上流社会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时，便对上流社会产生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但他深知，不能只靠仇恨来生活，应该干点事情，伦道夫认为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天才人物，但至少也是个极有天赋的人。他非常想干一番杰出的事业来证实自己的才干，尽可能残酷地报复一下抛弃他的上流社会。这个沽名钓誉的愿望驱使他从事政治活动并企图攫取大权。

伦道夫·丘吉尔最初是从关注爱尔兰问题开始过问政治的。他不只一次地要求立即解决爱尔兰问题，并要求英国议会通过一项同爱尔兰和解的法律。伦道夫当时不是什么有名的政界人物，所以他的这些言论无人理睬，反而给他

父亲带来一些烦恼。他父亲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伦道夫发表这些声明大概是因为喝醉了酒，或是一时失去了理智。

伦道夫·丘吉尔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提出什么主张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通过演说提高自己的名望，为他开辟攫取权力的道路。伦道夫根据局势（自由党由于在组织上进行了改革，所以在1880年的大选中战胜了保守党），首先提出在他看来能够恢复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威信的一些主张；接着他又为改进党的组织结构展开了斗争，他说这是为了使党的工作符合人民的利益。

伦道夫煞费苦心地拟好了演讲稿，并且下功夫背熟记牢，他运用演员般的技巧发表了这次演说。逗人发笑是他演讲的手段。他大胆辛辣的言论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他用污辱性的口吻不仅咒骂了自由党政府的政治家们，而且也攻击了保守党领袖人物。不久，他又把反对保守党领导人的活动从下院转移到报纸和各种集会的讲台上。通过演讲和写文章，伦道夫很快出了名，可在议会中只有几个半心半意的追随者。

伦道夫自迪斯累利死后，就一直在觊觎保守党领袖的宝座，只要他当上了保守党党魁，若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的话，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首相。所以，他要求结束党内的“集体领导”。伦道夫认为只有他才配当党的领袖，因此，在党内结束“集体领导”的同时，应选出“敢于面向人民并且懂得如何领导人民”的领袖人物。当朋友问他对前景的看法时，他回答：“我将当五年反对党领袖，然后当五年首相，再往后就要死了。”

议会改革扩大了选民面。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保守党不得不向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卖弄风情。伦道夫·丘吉尔为此百般讨好工人。他在讲演中极富感召力地呼吁：“保守党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永远无法恢复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党，并且使他们在管理党务方面发挥实际作用。”

伦道夫还要求由各个阶级的代表来领导保守党，从而取消贵族集团对党务的垄断，他的目的是想以新的领导集团取代“老年帮”，由他在这个新的集团中发号施令。

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看出，伦道夫所做的这件事不过是个策略而已。因为他本人正是英国贵族的典型代表，是一等公爵的儿子。若按逻辑推理，或按伦道夫提出的要求办，是应该把他这样的人排除出党的领袖地位的。

伦道夫·丘吉尔四处演讲、宣传，他广泛采用了从自由党人那里抄袭来的口号——“信任人民，人民就会相信你！”同时，还学着迪斯累利的腔调大谈”民主托利主义”，然而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一概念的涵义。他曾毫不掩饰地对人说：“我总担心有人会当众向我提这个问题。”

保守党人密切地注视着伦道夫的活动。出于策略考虑，他们对他的飞黄腾达常常采取忍让的态度，同时，他们也在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旦他失误，他们就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位政治家造成的麻烦。

由于伦道夫粗鲁、自命不凡，完全不把同事、朋友放在眼里并且野心勃勃，本来可以支持他的人也同他越来越疏远了。

1885年，保守党人在英国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根据选举的结果由索尔兹伯里组织政府，伦道夫·丘吉尔获得了仅次于首相的最重

要的职位——财政大臣，并且还当上了下院领袖。

年轻的伦道夫求成心切，他心中时刻在渴望着首相的宝座，这种渴望使他不愿意、也不能甘心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财政领域。他干预外交政策，公开要求与德国和奥地利接近。1886年12月，伦道夫公开主张缩减军事开支，遭到陆军部的拒绝后，便以辞职要挟索尔兹伯里。在此之前，他曾两次用辞职对首相进行讹诈，首相两次让步，从而使他更加坚信政府中没有他是不行的，因此这次他十分自信会达到目的。可是索尔兹伯里实际上有自己的打算，他谋划着同伦道夫来一次决战。这位保守党领导人抓住伦道夫的话柄，使急功近利的、求成心切的年轻人只好辞职。这样，伦道夫·丘吉尔结束了他长达五个月之久的财政大臣的生涯。

伦道夫指望他的辞职会在保守党内激起愤慨，党内会要求索尔兹伯里采纳他提出的缩减军事预算的建议，并请他回到政府中来。但事实上他所期望发生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保守党这艘船把伦道夫从船长台上推开了，而这艘船就象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继续航行。正如伦道夫的

私人秘书所说的："伦道夫是自己从梯子顶上跳下来的，他再也爬不上去了。"

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闪电般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使伦道夫·丘吉尔抑郁难忍，他的健康状况也迅速恶化了。他试图在保守党内积极活动，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但听众越来越少，报刊也很少注意到他。于是他想通过旅行来解脱自己的苦闷。他到过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土耳其、意大利、德国、埃及和南非等地，但无休止的旅行并不能使他的心情好起来。

到1890年，一些保守党人士就保守党声望下降之事呼吁："让伦道夫回来！"但索尔兹伯里的坚决态度使得这一呼吁成为泡影。这一切使伦道夫的精神状态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两年后，当保守党在选举中惨遭失败，自由党人格莱斯顿当选为首相的消息传到伦道夫耳中时，他欣喜若狂，他觉得新生活就在眼前，新的政治生命又将拉开序幕，他时刻等待着保守党下野后能向他求援，然而这一切希望到头来只是乌托邦罢了。此时的伦道夫感到生活之火将熄，他已不怀疑自己早已成为一俱政治僵尸了。

伦道夫·丘吉尔的体力在日益衰竭。1882年夏天，他很长时间被病魔缠身。经过护理、治疗和调养，他的精力稍有恢复。但是，医生诊断他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就是说，他注定不久人世了。

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丘吉尔逝世，享年46岁，据说，这是由于梅毒使他患了疾病的缘故。

第二章　骛索政坛

小温尼并不漂亮，他说话有缺陷，人们认为他迟钝低能

当温斯顿·丘吉尔的父母忙于他们的政务和社交时，小温尼（人们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昵称）是完全托给保姆和家庭女教师照管的。他长得很结实，但并不漂亮。他说话有缺陷，就是有点口吃，而且发音不清楚。他还是个饶舌的孩子，从学会说话时起就几乎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温尼非常自信和固执己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特点愈来愈明显了。

温斯顿不愿意象别的孩子那样学习。他有极好的记忆力，但只对感兴趣的东西才领会得快也记得快。丘吉尔后来自己也承认，他是个非常不好的学生。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他根本就

不学。从一开始他就讨厌数学，并一直与数学无缘。他非常不喜欢经典语言，学了很多年才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字母表，而且还记得不那么牢固。他很爱英语并且学得很好。

温尼在七岁时被送到阿斯科特贵族子弟预备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专为上流社会子弟办的学校，学费非常贵，学校关心的是对孩子的管教而不是教学。

温斯顿这时已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倔强，他根本不愿意遵守学校规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当时，这所学校每周把学生集合在图书馆里，把任性的学生叫出来带到隔壁房间用鞭子抽打。温尼当然挨了一顿鞭子。这使他大为恼火。多年来他一直对这所学校和鞭打他的那位老师怀恨在心。但当18岁的他返回学校准备同他的仇人算帐时，学校的主人已不在人世了，学校也已关闭了。

阿斯科特的生活使温尼的健康受到损害，根据家庭医生的建议，他被送到布赖顿的预备学校就读。在这里，他度过三年的时光，尽管他对纪律的态度依然如故，但已不再受体罚了，老师们都认为温斯顿是一个最执拗、最不守纪律

的学生。

按照英国的传统，上流社会的子女在专门的寄宿学校受教育，为他们进大学深造打基础。在这样的学校上学的学生都出身于英国的上流社会，英国政府世世代代都为这些达官显贵家庭的子女分配固定的贵族学校读书。给丘吉尔家分配的贵族学校在伊顿，也就是说温斯顿在读完预备学校后，应到伊顿的贵族中学继续学习。但由于哈罗的地理位置较好，那里的高山气候对温斯顿虚弱的身体有益，另外，哈罗的学校对学生要求得不那么严格，而伊顿学校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温斯顿则难以达到的。就这样，温斯顿没有被送到伊顿，却被送到了哈罗去读书。

温尼在哈罗从入学考试开始就碰到了许多麻烦。学校要求考生必须用拉丁文写一篇作文，而温斯顿在两个小时中只在考卷上写了一个字，用括弧把它括起来，然后浓浓地涂上墨，再打上几个墨点。这就是他能够写出的一切，尽管如此，温斯顿还是被录取了。

温斯顿在哈罗的学习成绩最差，他固执地不愿意学拉丁文，虽然拉丁文被学校当作一门主课。由于丝毫没有愿望或没有能力学好这门

功课，温斯顿在学业上无法取得进步，也失去了以后进大学读书的可能。他是学校最差的劣等生，人们认为他迟钝、低能。但有一次，他背诵麦考利夫关于古罗马的一本书，背诵了1200行毫无差错，老师和同学们惊叹不已。他还能背出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大段台词，当老师援引《奥赛罗》或《哈姆雷特》出了差错时，他总是不放过机会去纠正老师。

温斯顿的学习成绩不好，使他的父母非常苦恼。父亲认为温斯顿不够聪明，没有能力搞法律。可是，如果不学法律又能学什么呢？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帮助伦道夫·丘吉尔做出了决定。

温斯顿喜欢同自己的小弟弟约翰玩打仗的游戏。他有1500个锡兵，他会独出新裁、花样翻新地指挥锡兵作战。有一次，父亲走进孩子们正在玩打仗的房间里，看到温斯顿玩得非常投入，就问温斯顿："你想将来干什么？"儿子回答："当兵，那还用说！"这就使父母下了决心，他们让温斯顿在哈罗的最后几年转到军校预备班里去读书。

温斯顿虽然有目的地作了准备，但他在报

考英国有名的桑赫斯特军事学校时还是两次名落孙山。第二次落榜之后，父母为了把他弄到桑赫斯特军校，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在他离开哈罗后，父母把他托付给当时主办一所特殊学校的詹姆士上尉。这所“学校”是帮助那些才疏学浅的青年人能够凑凑合合考取军校的临阵磨枪的地方。丘吉尔后来回忆：“只要不是十足的白痴，就准保能从那里考入军校。”詹姆士的学校准确了解军校对考生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且运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塞进学生的脑袋里。

詹姆士上尉不怎么喜欢温斯顿，因为他明显地想对自己的老师指手划脚。在詹姆士学校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对温斯顿未来的生活不能不说颇有影响。

一天，温斯顿和几个朋友正在一座桥上玩得开心，突然间他心中产生一个与众不同的设想：“如果能从桥上跳到桥边的枞树上，再顺着树枝滑到地上，岂不更过瘾？”于是他率先垂范，第一个采取了行动。但由于估量错误，他没有抓住树枝，却从高处跌到地上，严重的脑震荡使他三天后才有知觉，三个月后才能下床。

在家养伤的一年间，温斯顿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机会看到许多上层政治活动家。他们都是丘吉尔家的常客，他们的话题几乎总是政治问题。温斯顿这时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伤好以后，他去下院听会，注意倾听那里的辩论情况，思考着父亲的不能令人羡慕的地位。温斯顿听到的那些话，对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他认为父亲辞去索尔兹伯里政府的职务是个悲剧，是无法挽回的错误。年轻的丘吉尔幻想着，有朝一日父亲重返政坛，他也将跟着父亲从事政治活动，并将支持父亲的一切斗争。

1893 年 8 月，温斯顿伤愈后第三次投靠桑赫斯特军校并被录取。事先，伦道夫凭着老面子请求康诺斯基公爵在第 60 步兵团为儿子保留一个位置，因为他相信儿子总会混上个步兵军官，公爵也已同意伦道夫的这一请求。但伦道夫的这番努力与希望却由于温斯顿十分不够理想的成绩化为乌有。因为骑兵学校除了要付较贵的生活费外，还需备公务用的、运动用的、狩猎用的几匹马，报考的人很少，能否被录取实质上只取决于未来的骑兵军官能否出得起学费。大手大脚好讲排场的丘吉尔一家在经济上本来已

经很困难，而若要供一个骑兵军官学习定得支出大笔费用，可谓雪上加霜。尽管如此，温斯顿的父母还是把儿子送进了桑赫斯特的骑兵学校，他们儿子的学习成绩使他们别无选择。

由于儿子没能力通过步兵考试这种不光彩的原因而放弃康诺斯基公爵的应允，这使得自尊心很强的伦道夫内心充满了极大的痛苦。他在给儿子的信中骂温斯顿："毫无用处"，是"无能之辈"。温斯顿很爱自己的父亲，收到父亲的信后，他很是难过。

桑赫斯特骑兵学校不设置拉丁文、希腊文及其他温斯顿讨厌的课程，学习负担也不重，所以温斯顿觉得这里的生活还算如意。在18个月的学习时间里，他的确阅读了很多军事书籍。另外，跑马场的训练给丘吉尔带来很大乐趣，多年来他一直喜欢马并爱好骑马，当时，温斯顿渴望象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一样，从事戎马生涯。

1895年对温斯顿·丘吉尔来说是十分不幸的一年，先是他深爱的父亲去世了，后来是他依恋不舍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夫人也死去了。在这一年中温斯顿比从前变得成熟了许多。他在军校的最后一次考试成绩是，在130名毕业生中

名列第20位，这对于劣等生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进步，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骑术成绩是最好的。

伦道夫·丘吉尔没有给家里增加什么财产，在他死后，丘吉尔一家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出卖有价证券，当时全家人的主要收入靠詹妮·丘吉尔从美国带来的嫁妆。这笔钱本来足以够这位年轻美貌、性格活泼的寡妇在伦敦上流社会痛痛快快地生活，但詹妮却不善于精打细算，她挥金如土，不善计划，只知道钱可以买东西，因此在孀居后很快又欠了许多新债。但儿子温斯顿不仅不责怪她，而且很理解："我同情您的一切奢侈，甚至超过您对我奢侈的同情。""我相信您必须有礼服，而我必须有波尼马。不幸的是我们太穷了。"温斯顿刚开始独立生活就碰上了穷困的问题。

丘吉尔的母亲失去丈夫后想尽力帮助儿子出人头地。她的一切关系都用来为这一目的服务。她为儿子打开了许多大门，并为她扫清了道路。这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当时英国有这样一个传说：如果某个大家族的幼小子没有得到遗产，那么，贵族阶层就给予这些子孙

一切援助，使他们能够发迹并在国家机关或企业界获得爵位。

丘吉尔后来对人说，他获得国家最高权力，赢得社会地位，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几乎是白手起家。这其实并非与历史的真正面貌相吻和。他在没有得到大笔遗产的情况下，却能顺利地发迹和擢升，这不能不说是与他拥有强有力的支持紧密相关。

丘吉尔和杰罗姆两个家族的社会关系都非常广泛。这些关系延伸到王室、贵族阶层、保守党和自由党上层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詹妮·丘吉尔在温莎受过维多利亚女皇的接见，同王室成员有着友好的交往，肖伯纳也曾出席过丘吉尔家族的宴会。所以，英国人说，丘吉尔是口含银匙出世的。

温斯顿是上帝的宠儿，他一出世命运便对他情有独钟。如果他是公爵的直接继承人，他会继承爵位和财产，但是，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活动限制在上院的范围之内，他就不大可能有远大的前途了。优裕的物质条件会使他消沉，而且，在20世纪，贵族家庭中有爵位的成员已经没有领导英国政府的机会了。根据

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需要，帝国的政权不得不以更大的民主来装点门面。在这种情况下，温斯顿·丘吉尔只好在政治上独立闯荡，使他那无可争议的出众才能有机会展现给世界。正是这种特定的境遇奠定了他日后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

经过母亲的多方周旋，温斯顿从骑兵学校毕业后便在他最理想的第四骠骑兵团服务，并担任中尉的军衔，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但是，他到团里没有多久就已经看出，在军队内循规蹈矩地服役，缓缓地逐级晋升不是他要走的道路。

他不加掩饰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粗暴地把朋友和敌手都推到一边

慢腾腾地前进是温斯顿的天性所不能接受的，他是一个求取功名心切的人，急不可耐地要尽快获得权势，这一点颇得其父的遗传。他不加掩饰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粗暴地把朋友和敌手都推到一边。因此树敌很多。由于大多数人都

不象他那样沿着政治的阶梯向上爬，他便惹来了众人的敌视。如果没有良机和佳运的话，他无疑会步他父亲的后尘；如果在不列颠的舞台上有一个比他更有势力、更有才能的人，他也将无所事事。然而，温斯顿从一出世就与好运结交，他命好也遇到好机会，并且上帝也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安排一个他所无法与之争雄的人。

生活在骠骑兵团的年轻中尉为看不到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迹象而终日抑闷。1895年来自古巴的枪声使他倍受振奋，斗志昂扬。

那一年古巴居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发展成为游击战争，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坎波元帅率兵到古巴镇压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温斯顿决定利用5个月的假期到古巴闻闻火药味。但是，他必须得到西班牙政府的准许才能去古巴。温斯顿于是给他父亲的老朋友——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写了一封信，大使为他取得了西班牙政府的许可。如果他不是伦道夫·丘吉尔的儿子、马尔巴罗公爵的孙子，女王陛下的大使未必会过问此事。如果不是沃尔斯利勋爵没有忘记同伦道夫的友谊，最高统帅部未必会正式同意温斯顿去古巴，小小骠骑兵团中

尉未必会得到最高统帅部总司令的接见，并把他去古巴的旅行安排得象出公差——委派他弄清西班牙陆军使用的新式子弹的质量——一般。

虽然英国公众对古巴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多大兴趣，《每日写真报》还是满足了温斯顿想作为随军记者为其撰稿的愿望。这说明温斯顿在尚未真正开始政治生涯前就为自己操置财产了。每篇5英镑的稿酬同丘吉尔后来所得到的财产相比确实微不足道，但绝不低于有经验的记者 所得到的一般稿酬。报社为什么同这位没有任何新闻记者经验的骑兵中尉签合同呢？曼德尔逊在他写的丘吉尔传记中：完全可以肯定，他的姓氏和他母亲的社会关系使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比新闻界的其他同事更加优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它们反对英国工业和贸易垄断的斗争，使英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轻工业开始居于世界第二位，重工业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这种情况影响了英国的对外贸易结构。金融资本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这之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主要致力于争夺和扩大销售市场，现在它则转

为竭力攫取原料产地和在国外建立大型企业的租借地。这就增强了英帝国政治中的帝国主义倾向。殖民主义思想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不列颠帝国迅速发展起来。1880 年英国的面积为 2000 万平方公里，人口 2 亿，到 19 世纪末帝国面积扩展到 3300 万平方公里，1900 年人口增长到 3.7 亿。如果根据这个数字计算，可以说每个英国人在海外都有 10 个海外殖民地的奴隶为他劳动。

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一方面激化了英国同其他列强如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使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日益加强。英国最老的殖民地爱尔兰反抗斗争日趋激烈，武力镇压和迫害虽然暂时平息了那里的动荡，但英国的统治阶层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寻找更为妥当的办法，以使爱尔兰人能容忍英国对他们的统治。19 世纪末，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发展壮大起来。1881 年苏丹也爆发了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在非洲，英国实行着肆无忌惮的掠夺政策。帝国因此不得不从本土将一批批远征部队派到这些地区。

温斯顿所在的骠骑兵团正是在这种情形下

于1896年秋被派往印度的。

在孟买登陆时，丘吉尔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他乘坐的小船在汹涌的波涛中靠岸时，他用右手抓住了固定在码头岸边上的一个金属环。小船从脚下滑脱，温斯顿只得用一只胳膊悬空，以致膀子脱了骱。后来他的肩膀脱骱的地方还常常疼痛，右臂活动非常不便。

温斯顿酷爱马球，膀子脱骱使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运动才能，这使他非常苦恼。更为糟糕的是，受伤的右臂妨碍他使用骑兵的传统武器，也就是军刀，他只好使用自动毛瑟枪。

丘吉尔对军事活动漫不经心，但玩起马瘾来却十分上瘾。他把脱骱的胳膊牢牢地系在身上，使肩膀的疼痛不致妨碍游戏。除了履行公职和准备马球比赛之外，军官们还有以各种不同方式度过的闲暇时间。在每天中最热的时候，同事们有的睡觉，有的打牌，也有人在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温斯顿并不满意这种闲散、安逸地打发日子。他把这种生活当作愚蠢、枯燥、无聊的行为，每天在工作和运动之余，扑捉蝴蝶作标本，并用4至5小时的时间来阅读历史和哲学著作。

他在那时已经了解，自己是个文化水平很低的人，必须在一些领域具备起码的知识，才能实现追求功名的抱负。

在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温斯顿通过自己杰出的才能，从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马尔萨斯、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经营。他勤劳刻苦，精明强干，善于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地解决问题，加之他出类拔萃的才干，所以他后来的文化知识完全可以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低。在进入老年时，他曾以不无自负的口吻对人说："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然而这正是一个很大的优点，这一点越是广为传播，对国家越有好处。"丘吉尔的这番话并不是说大学教育不重要，实际上恰恰相反，他的这些话是他的虚荣心与卖弄才华的性格结合的产物，因为实际上他非常懂得大学教育的益处。在年轻时，他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进牛津或剑桥大学去接受自修所不能代替的地道的系统教育，由于学校规定进大学必须学过经典语言和其他课程，而使温斯顿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

温斯顿有用不完的精力，他的天性是渴求、轰轰烈烈、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印度东北边

境的帕坦人部落的造反，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政府派宾登·布莱德将军率领3个旅的远征军去镇压帕坦人的起义，温斯顿早就认识这位将军，他请求将军带他参加远征，因编制满额，将军建议他以随军记者的身分参加远征。丘吉尔于是从团里请了假，并同在印度出版的《拓荒者报》报社商妥担任该报随军记者。与此同时，詹妮·丘吉尔也在伦敦同《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她的儿子将从印度给该报投寄稿件。

署名"一个年轻军官"的报导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无疑激励了丘吉尔的写作热情。他把过去用来自修的时间用以写作。他的写作速度很快，只有两个月就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他把手稿寄给住在伦敦的母亲，再由母亲为他寻找出版社。1898年3月，温斯顿的第一部著作《1897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出版并获得成功。

该书使丘吉尔获得了跻身于新闻界的资本，这对于一个学历平庸、年仅23岁的青年军人来说，实在是不很容易的。然它也为丘吉尔招来了敌人，因为在书中，年轻的中尉居然对驻扎在印度的高级将领提出批评，对英国的国防制

度说三道四，这不能不引起驻印英军司令部的气愤，而且也使伦敦军界不满。1898年当他请求参加印度北部又一次讨伐行动时，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温斯顿那时和后来都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小说家或者仅仅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理想和抱负比这要广阔得多。但他知道，一度成为保守党的迪斯累利正是从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转向政治生涯的。此外，迪斯累利的全部政治思想最初也是在其文学著作中阐述出来的。也许这是温斯顿决定在文艺创作上试图显显身手的一个重要动机。

“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同迪士累利一样，从丘吉尔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萨伏罗拉》中，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政治观点和作者对一些政治家的看法。

据说这部小说的故事题材是温斯顿的一位女亲戚帮他编撰的。小说的主题是讲位于地中

海上的一个叫劳拉尼亚的假想国所发生的人民革命运动：人民反对反动的独裁政权，并推翻了这个政权，但人民取得的成果又受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

《萨伏罗拉》被一致认为是丘吉尔的政治宣言。在描写劳拉尼亚国时，作者实际上写出了他那个时代英国政治生活的很多特点。在小说主人公萨伏罗拉身上，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许多特点。萨伏罗拉的办公室正是温斯顿本人未来的办公室，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最显眼的是丘吉尔喜爱的吉本和麦考利的著作，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作者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温斯顿对小说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勾画，事实上是对自己形象的完整勾画："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生活在寂静之中，象艺术和书本描写的那样，怀着哲学家平静的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

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社会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23岁时的温斯顿·丘吉尔就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轻松愉快的生活，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这种虚荣心正是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50年后，温斯顿已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有一次，他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在一位新当选的年轻议员身边坐下来，他先是自言自语地唠叨了一阵，然后突然向那位议员问道："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那个年轻人腼腆地回答说，他当然想知道。丘吉尔毫不掩示地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经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19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过了几年他又补充说："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虽然有两位夫人帮助他，但他仍感到入不敷出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侵占埃及之后，又攫取了苏丹。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族解放斗争，苏丹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885年，他们几乎把全部的外国军队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被击毙。事态的发展激起了英国沙文主义的强大浪潮，政界和舆论界都要求为戈登之死进行残酷的报复。

英国用了很长时间准备"为戈登复仇"的行动，并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当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迫近时，丘吉尔决意要参加这些战役。

温斯顿来到苏丹照例不仅是为了打仗，也是为了报导战争情况。他同新结识的保守党的《晨邮报》老板之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该报将发表他关于苏丹战争的一些文章，报社答应他的报导每登一栏付给15英镑的稿酬。

丘吉尔在骠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国

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令人震惊、极为残忍的进攻。由于右肩脱骱，丘吉尔在冲锋时用的是毛瑟枪，而不是挥舞战刀。当战事告一段落后，温斯顿乘轮船沿尼罗河下行来到开罗，在那里，他开始着手撰写他的第二部著作。

与此同时，温斯顿一直都在思忖着今后的军事生涯。他非常希望能够象他那位声名显赫的祖先——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可是，温斯顿深深懂得，时代不同了，要升到能够指挥一支象样兵团的军衔，必须经过多年循规蹈矩的军人生活，也许还要到帝国最边远的驻军服役。而他自己曾经违背当时的隶属关系，对英国当时最高军事将领指手划脚，破坏了同他们的关系，因此当一名军事将领的前景十分黯淡。将军们显然不乐意让这个血气方刚、粗暴无礼的小中尉比他们自己升得更快。丘吉尔必须另找出路，以期望尽快出人头地。

在温斯顿的大脑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可以忽视的，那就是收入和财产问题。军队的物质待遇是不能让他满意的，维多利亚女王给他军饷，母亲也资助他，虽然有两位夫人帮助他，但

他仍感到入不敷出。渐渐地，他无可奈何地欠了债。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新闻工作为他出名和挣钱提供了机会。

仅仅一个月，他就从寄给《晨邮报》的稿件中得到了 300 多英镑的收入，当时他在军队中的月薪饷不过 12.5 英镑。新闻工作还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升迁的一种手段，而他的的确确越来越想从事政治活动。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苏丹战争以后，丘吉尔决定退伍从事文学创作，以便将来转而从事政治活动。

在结束军人生涯之前，他已开始构思关于苏丹战争的书。从印度归国途中，他取道开罗，进一步搜集了战争素材，同苏丹的著名历史专家座谈，并从苏丹战争的积极参加者那里获得了大量材料。一回到英国，他就专心著书。温斯顿精心构思，注意对所收集的各种素材的运用，并且尽量使事件的叙述准确、鲜明、富有逻辑性，经过努力，他终于写出了至今读起来依然引人入胜的两卷本巨著——《河上的战争》，并于

1899 年 10 月出版。

在书中，他不仅叙述了亲自参加过的战争，而且实际上写了一部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丘吉尔在写作中第一次体验到终生伴随着他的创作的愉快感，享受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乐趣。

温斯顿已决意离开军队，用不着担心高级军官会给他穿小鞋了，因此他在这本书里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些文章剖析了当时英国政治的某些特点，揭示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可憎面目，至今还有意义。丘吉尔写道："马赫迪的遗体被从陵墓中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进步托利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同这种行为。"

1899 年 6 月，温斯顿回到英国后，走访了保守党总部。这之前他曾来这里打听提他作议员候选人的可能性。总部客气地接待了伦道夫·丘吉尔的儿子，向他解释说一切取决于钱。为

了支付竞选运动的费用，必须有钱才行。如果温斯顿打算得到一个使他能够十拿九稳地进入议会的可靠选区，那么每年就必须花费大约1000英镑；碰运气的选区便宜一些；而毫无把握的选区则基本上用不了多少钱。温斯顿那时没有这笔钱，因此那次谈话一无所获。谈妥的只有一点，就是让这位未来的议员候选人暂时先在保守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一些演说，让他尝试一下竞选的味道。

保守党总部建议丘吉尔1899年6月在奥德姆选区竞选，因为这个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已死，需要举行例外的议会选举。

这个选区位于兰开夏郡工业区的中心，选民主要是当地的纺织工人。对于温斯顿来说，这里完全是个陌生的世界——他既不了解选民的需要，也不了解他们的利益，对于如何使选民相信马尔巴罗公爵的后裔将是他们在议会中称心如意的代表这一点，他心中全然无数。

在温斯顿的竞选演说中，那些关于英国民族正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以及英帝国如何伟大等言辞，并没有给听众留下什么印象。他的忠实的同盟者、他的母亲——伦道夫·丘吉尔夫人

乘着敞篷马车在选区四周奔波，起劲地为儿子的竞选搞宣传拉选票，但她的努力同样是毫无结果的。温斯顿想进入议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在1900年的议会选举中，他汲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事先广泛争取赞助，在演说方面也颇下了一番功夫，终于获得了勉强的胜利。怎样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当上了议员。

1898年，温斯顿在从苏丹归国的轮船上结识了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丁·斯蒂文斯，后来斯蒂文斯在《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最年轻的男子汉》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丘吉尔进入议会前两年的形象刻划得恰如其分："温斯顿·丘吉尔甚至从外表看来也是个不谦虚的人。""他自命不凡的这个缺点是无法克服的，无论从年龄、从正常的理性或从事实本身来看，都没有为此提供条件……丘吉尔是个沽名钓誉、处事谨慎的人，与其说他在盘算如何飞黄腾达，不如说他在深刻地进行自我省察，而这种省察的结果使他相信，他具备将来成为叱咤一时的人物的天赋个性。他没有学习过怎样成为一位蛊惑家，但他生来就是一个蛊惑家，因此，他熟

悉这一套……现在，他自称是个民主保守党人。保守思想即信念是可以改变的，而民主思想作为一种方法却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因为他的未来是在20世纪。”丘吉尔后来的活动证明斯蒂文斯的看法是正确的。

丘吉尔无论是在他政治生涯的初期，还是其政治生涯的后期，都没有形成十分明确的、深思熟虑的、系统的观点，或者说，没有形成固定的世界观。曼德尔逊在为丘吉尔作传时："如果问起丘吉尔，根据他的观点，世界应该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需要改造，他准会陷入窘境，回答不上来……简言之，丘吉尔没有世界观。”或许曼德尔逊的话有些偏激。虽然丘吉尔不能事事深谋远虑，但对事物他常常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温斯顿不特别信仰宗教，他对待教会只是一般地说得过去，就象尊重对本阶层有利的一种老法规那样尊重教会。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生活伊始就形成了系统的观点，这就是信仰我愿意信仰的东西，并让理智沿着它可以发展的那个方向去发展。我并不担心打算的是一套，而信仰的又是一套，这两者之间是水

火不相容的。”

丘吉尔的一生始终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他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创作方面，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发挥这种杰出人物的作用。他在议会中的初期活动就体现出这种信念。丘吉尔自信，他的使命就是统治英国。

如果有人问丘吉尔为什么要当议员，他准会说：“为了当大臣。”当大臣又是为什么呢？温斯顿准会信心十足地回答：“为了当首相。”

但是，1901 年摆在丘吉尔面前的当务之急还不是这些，而是如何在议会里正式迈出第一步。具体说就是，如何出色地完成“处女演说”——作为下院新议员在议会发表自己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年轻时就很健谈，他应邀参加社交活动坐在桌旁说个没完，而且常常因为对那些自己一窍不通的问题高谈阔论而引起宾主发笑。然而，在上流社会宴席上的闲谈是一回事，在议会中的首次演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次演说要给人们留下一位新政治家的印象。重要的是，演说的叙述形式能吸引人，口齿清楚，当

然主要的还是演说的内容。

英国议会有这样的传统：新议员来到下院后不能立即发表演说，他们至少要经过一个月后才能发表演说。但丘吉尔不满意这个传统，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等待，于是只过了四天他就迫不急待地来到下院，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说。

伦道夫·丘吉尔这个人对议员会来说是记忆犹新的，所以，对伦道夫的儿子在下院首次亮相格外注意。

温斯顿坐在他父亲退职前在下院坐过的位置——紧靠前排，挨着过道的一个坐位。他来到下院还不到五分钟，人们就看到他舒展着双腿懒洋洋地坐在那里，大礼帽扣在前额上，伸直的双腿搭在一起，双手插在口袋里，他仿佛不是最年轻的议员，而是一位最年长的议员环视着四周。

总的说演讲是成功的，受到议员们的热烈欢迎。下院的两方面人，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为丘吉尔鼓掌。

但是，保守党的领袖们却紧锁眉头，因为年轻的保守党代表在演说中对布尔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这与保守

党的路线——把反布尔人的战争进行到底并严厉地对付他们——是相违背的。温斯顿的这种举措，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年轻或勇敢的行为，显然，他是故意采取这种“鲁莽”举动的。温斯顿的目的在于，他想借此表明，他将步自己父亲的后尘——对本党的领袖发动攻击，从而迫使他们向他讨好，给予他领导党的显要职位。

约瑟夫·张伯伦听完了丘吉尔的讲演后，对邻座的人耳语：“议会的议席就这样白白扔掉了。”

历史进入20世纪时，不列颠帝国遵循的仍是自由贸易原则，国家不得干预国内经济生活与各种力量的自由竞争。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赞成这个原则。当英国在世界经济中还占垄断地位的时候，自由贸易的原则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当时的形势，并给英国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是，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和工业领域中丧失了垄断地位，它与其他列强的竞争便更加激烈了，自由贸易政策已不再适应世界工业与形成的新形势。

德国和美国，作为英帝国的竞争对手，首先在国际上筑起了强大的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的

国内市场和本国经济的发展。

保守党人约瑟夫·张伯伦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形势，1903年5月15日，他在自己的伯明翰选区发表了演说，他提议，照着德国和美国的范例，建立一个包括英国及其领地在内的关税同盟。他建议用关税壁垒保护不列颠帝国，阻挡第三国商品的渗入，而不列颠帝国内部生产的商品则享有优惠税率，或叫特惠税率。张伯伦断言，这个方法可能使英国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若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而采纳张伯伦的这个提议，首先得到好处的是与张伯伦有关的重工业部门，而轻工业部门却获利较微。贸易界也不相信关税会带来好处，实施特惠制反而会导致英国进口粮食价格的上涨。这就意味着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的下降。所以，许多人反对放弃自由贸易原则。

当时的英国各派力量就关税问题进行了长达约30年的激烈争讨，最后帝国终于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转而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这是后话。

英帝国的政治生活，由于约瑟夫·张伯伦

的演说，而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以后，关税问题便成为议会和新闻界热烈辩论的话题。

因为第二次英布战争（1899 年开始的持续 4 年之久的英国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而分裂的自由党人在遇到信仰危机时立刻团结起来。保守党人及其政府却分裂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以张伯伦为首，主张实行关税壁垒，另一部分人以巴尔弗首相为首，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

温斯顿在这种形势面前，头脑是冷静的，他努力使自己的大脑不热起来，以便平静地观察和分析局势，从而找出一条在政坛上可以迅速腾达的捷径。

经过一段认真的思考后，温斯顿感到，反对关税壁垒政策可以给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并得到关税反对者们的支持，于是，在张伯伦的伯明翰演说发表约一个星期之后，丘吉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温斯顿反对张伯伦的理由正是自由党为保护自由贸易政策而提出来的那些理由。他说："自由贸易和粮食的制度可以使英国民众有可能从贫困与灾难的深渊上升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首位。"实际上，英国当时尚有 1/3 的人们处于

饥饿的边缘，或许丘吉尔对这种情况真的毫无所知，因为他对“社会问题”向来漠不关心，甚至厌恶、反感。但这些无碍丘吉尔无比自信地断定，英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是极好的，他本身也并不为这些自相矛盾的看法而感到难堪。

为了使政府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丘吉尔又搬出“保守党的政策应该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套理论。实际上，政府就是没有丘吉尔制造的麻烦也已困难重重。巴尔弗两面受敌——张伯伦以辞职相威胁，要求巴尔弗正式站到关税壁垒政策的立场上来；拥护自由贸易政策的人从另一方面在政府里向巴尔弗施加压力。

1909 年 9 月 9 日，张伯伦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全部辞职，巴尔弗着手组织新政府，温斯顿的机会来了。

在温斯顿之前，有许多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来达到高升的目的——对自己党的首领进行系统的批评。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的人都采用过这种手段并取得了不同的效果。

如果批评首相和党魁的人确实是一位重要人物，此人留在党内或投奔政敌阵营都可能给政府与党造成严重的损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会对这种不安分子采取息事宁人的“保守疗法”——给他一个政府职位。不安分子为了保住这个职位，立即会由政府的反对者变成政府的捍卫者，并对政府的行动遵循集体负责的原则。

伦道夫·丘吉尔曾采取过这种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今他的儿子也沿着他的道路走过来。

然而巴尔弗在组织新政府时并没有给考虑温斯顿，这就使温斯顿不能再对巴尔弗的政府尽力竭力了。

对于巴尔弗的这番举动，用“偶而的疏忽”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巴尔弗把一个大臣的职位交给才华和精力都比温斯顿差得多的年轻人手中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巴尔弗对丘吉尔的轻视。巴尔弗不想让丘吉尔进入政府，表明他不想对丘吉尔作出让步。

于是，温斯顿·丘吉尔决定离开保守党，投奔自由党。

当然，丘吉尔投奔自由党并非出于任何原则上的分歧，而是想升官。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从一个党跳到另一个党的现象是司空

见惯的。如果一个政治活动家从一个党转向另一个党是因为他的观点有所改变，那么他未必会受到谴责。然而，丘吉尔这次跳槽，无论他自己怎样竭力证明是出于原则考虑，人们都无法相信他的辩词。

在刚刚转到自由党阵营后不久，丘吉尔就对人说："我并不同意自由党的某些观点。"丘吉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保守分子，投靠自由党并不能改变他的初衷。他清楚，如果想向上爬，而且要爬得很快，就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既然保守党不给他机会，他只有参加自由党了。当然，他的另一个考虑还有，当时的保守党处境危急，如一条正在下沉的船，必须尽早跳下来脱身。

他的一位朋友在事后提醒他："温斯顿，你应当检点些，家鼠离开下沉的船舶只能一次，不能再干第二次，如果你想这样干两次，那你就将完蛋。"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温斯顿的这位朋友是多虑了。20年以后，温斯顿·丘吉尔再一次离开了自由党那条下沉的船舶，并且，成功地再次出现于保守党人的座位上。

对资产阶级政治家来说，他们在议会搞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深思熟虑的表演，是

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们可以在下院和政治集会上互相痛骂，视如仇敌，但个人生活中照旧是好朋友。这也是英国政治生活中颇为有趣的一个现象。

丘吉尔也喜欢与反对党的领袖们交朋友，他并不看重党籍，年轻时他就对自己的母亲说："玩弄政治是非常好的赌博。"

丘吉尔从自己演说的讲台下面取出一块大约 3/4 英磅重的面包，并且来回晃动着它

丘吉尔与保守党断绝关系后，开始四处演说来阐述自己新的政治纲领。

他想方设法痛骂保守党并证明该党对人民利益的损害。不排除，他在激烈的辩论中发表了许多较客观的看法。他说，保守党是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强大同盟，这个党执政意味着党的机器在实行暴政。他"义愤满腔"地指出，保守党"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最后他评价：保守党的政策"对千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

是廉价的劳动力。”

掌声过后，丘吉尔从自己演说的讲台下面取出一块大约3/4英磅重的面包，并且来回晃动着它：“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时，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之后，他又拿起另一块两磅重的面包：“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啊！”

温斯顿在重大社会改革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也提出一些含糊的看法：“我们应该明确声明，在急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凡是个人特权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地方，社会利益应该优先……我们应该朝着美好的、组织得更加公正的社会前进……这种社会将代表着光辉灿烂和光明正大的新时代。”但丘吉尔没有说明，向“美好”社会前进的具体方针、策略是什么。

1904年的春末夏初，丘吉尔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一边转移到了自由党人那边，并与劳合·乔治坐在一起，他俩后来成了好朋友（丘吉尔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保守党政府由于党内在对外贸易政策问题上的斗争而瘫痪了。张伯伦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巴尔弗解散议会并举行新的选举，

目的是想通过选举争取选民对实施保护关税政策问题表示态度。

政府再犹豫不定已不可能了，无论怎样，此时的帝国政府必须拿出一套决定性的意见了，出于无奈，巴尔弗玩了一个花招。

1905 年 12 月 4 日，巴尔弗宣布辞职。他认为，在他辞职后，自由党人不得不组织一个在议会不占多数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势必会马上垮台。他这种推算的根据是，自由党人的队伍不团结。

但是，巴尔弗失算了。

他过高地估计了自由党人队伍的不团结和自由党领导层中的分歧。

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于 1905 年 12 月 5 日组织政府。新政府立即解散议会，并定于 1906 年 1 月举行下届选举。

巴尔弗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人长达 10 年的执政，在以后的 17 年里，都是自由党人任首相。

坎贝尔·班纳曼出身于格拉斯哥大商人家庭，这个家庭的信念是倾向保守党的。然而，班纳曼却是在自由党内实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并

于1899年成了自由党的首领。

班纳曼在他的政府里安排了许多信念与保守党人非常相似的自由党人。外交部交给爱德华·格雷主管;阿斯奎斯出任财政大臣,因而成了首相的继承人;劳合·乔治当上了贸易大臣。

班纳曼准备把丘吉尔安排在财政部次官的职位上,这是个显要的职位,而且是个肥缺儿。如果丘吉尔当上了财政部次官,他就成了阿斯奎斯的右手和在下院的代理人,这对一个想在政坛上腾达的年轻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财政部次官的薪俸比其他部次官的薪俸要多得多,每年可有5000英镑的收入。再者,此职务可以为在下届政府变动时进入内阁开辟道路。

然而,丘吉尔却选择了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职务。温斯顿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般人都不太理解,只有那些了解他的人才晓得他的"苦衷"。

殖民地事务部大臣额尔金勋爵对殖民地问题了解甚少,而且还参加了上院会议。因此,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的代表只有丘吉尔了。这样,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要全面地发挥主动性、独立性和无穷的干劲,就有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1906年1月英议会举行选举，自由党人获胜，温斯顿·丘吉尔出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足智多谋的年轻次官给额尔金带来了许多麻烦。丘吉尔经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每隔半小时就要去说服一次大臣，要大臣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接受他的看法，却又不让自己的上司插一句话。额尔金除了耐心地等待，别无其他的办法，只有在他的次官讲得唇焦口燥后，才简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也不能这样干。"一次，丘吉尔在呈交给上层的一份备忘录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我的看法。"额尔金也只批示了一句话："但这不是我的看法。"

部下们眼里的次官，是个虽年轻，却喜欢发号施令的人，每当他们要与他打交道时，心里都觉得有点发怵。

无论怎样，丘吉尔投奔自己党是并不失算的。

20世纪初叶的不列颠议会中，出现了相当有影响的工党代表。在英国，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组为工党后，许多人把这个新党视为与欧洲其他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相似的社会主义党。这时，俄国爆发了1905年革命，欧洲各国的社会

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在英国国内，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

1906年夏，丘吉尔正在瑞士度假，他要求自己的秘书把法国内政部长克雷蒙梭的一篇反社会主义的讲话寄给他。在休假期间，丘吉尔仔细研究了克雷蒙梭的讲话。

从瑞士返回英国后，温斯顿抓紧时间阅读了许多当时风行一时的关于英国工联主义理论的著作。10月，他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演说。丘吉尔一口咬定，英国工人阶级不需要有自己的政党，它的利益应由工会来代表。他说："劳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字眼，那么，谁有权代表劳动者呢？我认为，工会比其他任何组织更应该有权代表劳动者，应该由它派出劳动者的代表参加下院。"温斯顿坚信，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建立独立的代表组织，对其阶级本身来说有害无益。

丘吉尔号召工人阶级委托自由党，即英国资产阶级的党来保护自己的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利益。号召工人放弃议会里的独立代表权，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放弃独立的政治斗争。因为丘吉尔担心，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走独立斗争的道

路，并采取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

丘吉尔坚定地向听众表明，他是百分之百地否定和仇视革命运动的，他声称："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的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他的这种立场直至他生命结束时从未改变过。

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与英国工党分子的机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温斯顿并不十分清楚。他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常常把社会主义与机会主义混淆起来。他把社会主义学说归结为集体主义，而把自由主义学说归结为个人主义，并且极力证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是没有任何原则差别的，如果说二者有差别，也是社会主义者臆想出来的。

丘吉尔在道格拉斯的讲演中说："我们在给街道提供照明和安排供水时，是集体干的。但是，当事情涉及到向一位女人求爱时，就不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而女人也不会以集体的方式嫁给我们。"

在很短的时间内，丘吉尔就以他特有的充沛精力和丰富的首创精神，在公众面前树立起

一位年轻有为的大臣形象。有钱有势的人们开始明白，如果让丘吉尔掌权，他是会卖劲地为英帝国有产阶层的利益效劳的，因为他要实现出人头地的理想与帝国的利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906年8月15日，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一个心腹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国王陛下高兴地指出，如果您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党的观念之上，您一定能成为一位可以信赖的大臣，而且还能成为一位严肃的政治活动家。"

1907年5月，丘吉尔的功绩得到帝国的正式承认，32岁的次官当上了三级文官，这在英国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从这时起，丘吉尔在自己的姓后除了打上"M·P"（议会议员）外，还打上了"P·C"（三级文官）。

20世纪初年，各强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07年，英国同俄国达成了协议，组成协约国来反对德国及其同伙。

英国海军元帅费希尔当时正负责改组海军。如果说帝国从前建设海军的目的是以殖民地港湾为基地在辽阔海面上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的海军应该集中在欧洲水域活动，这样

海军就可以用来对付德国。

费希尔把只能在殖民地完成“警察职能”的小型船舶换成了能够对付德国海军的大型军舰，他不仅为英国海军准备了这种大型的主力舰且在舰上配备了13.5英寸口径的大炮。

战争已迫在眉捷。

丘吉尔这时对军事问题发生了兴趣。1907年，他与费希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与费希尔交往，使他有可能详细了解英国海军的状况和发展前景。

在那些年代里，丘吉尔对拿破仑越来越感兴趣。即使到非洲去旅行，也没忘记把大量的关于拿破仑的文献资料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进行研究。

政治生涯的初步成绩和良好的开端，使丘吉尔确信，他注定会成就一番大业。

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丘吉尔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1907年底，坎贝尔·班纳曼首相重病缠身，眼看即将不久于人世。这就意味着将会换一位新首相，而且也要对政府进行改组。

在英国，政府由两种等级的大臣组成。一些

大臣是内阁成员称为阁员大臣，他们为数不多，代表政府掌握着全部大权。另一些是非阁员大臣，他们的作用和影响远没有前者那么重要。丘吉尔看到政府即将改组，便打算力争成为内阁成员。

1908年，班纳曼首相辞职，阿斯奎斯成了首相并按着自己的愿望组织政府。

何时开战尚不清楚，性情急躁的丘吉尔认为，在海军部任职不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希望，因此，他拒绝了新首相关于让他出任海军大臣的建议。虽然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的工作，在社会问题方面是大有作为的，但丘吉尔从未对此发生过任何兴趣，故而也回绝了阿斯奎斯关于让他出任地方政府事务部大臣的建议。

丘吉尔决定当贸易大臣，虽然当时一般的人对此职位评价不高，薪水也只有2000英镑(许多大臣的年收入可达5000英镑)，但丘吉尔认为贸易大臣是阁员大臣，可以在内阁中占一席位。他相信，贸易部会是他继续向上爬的好阶梯。

在这段日子里，还有一件事对丘吉尔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1908年8月15日的报纸上

刊登了他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娅订婚的消息。

克莱门蒂娜·霍齐娅出身于一个与丘吉尔类似的家庭。她的父亲曾是龙骑兵团长，而母亲是艾尔里勋爵的女儿，来自于爱尔兰——苏格兰著名的贵族家庭。这个家庭在丘吉尔的新选区丹迪市具有很大的影响。克莱门蒂娜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是一位有学问的女人，她明智、幽默，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她不仅讨人喜欢，还很标致。

温斯顿·丘吉尔已决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他在议会代表一个可靠的选区，当上了内阁成员，他享有很大的声誉，成为时事的核心人物。

33岁的丘吉尔已在政坛上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就。他坚信，不列颠帝国的政治舞台，将是他实践宏图大志的最佳场所。

1911年8月，帝国的铁路工人为声援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宣布总罢工。一时间，正常的运输秩序被打破了。车站的站台上，候车室里，挤满了那些无法按时上车的人，各种货物、物资，把货场塞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温斯顿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等地方当局求援，立即决定用军队去维持秩序。

他动员了 50000 名士兵，给每个士兵配备了 20 发子弹，并把这支军队部署于各个战略据点。

丘吉尔表现得盛气凌人，他洋洋得意地边看地图边指挥部队前进，动用军队驱散游行队伍。被派往伦敦、利物浦和拉内利三市的士兵奉命向游行者开了枪，造成了伤亡事件。

反政府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一时间，帝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一些议员也因为丘吉尔在政府没有很好了解情况、研究出妥善的和解方式之前，就擅自动用军队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

然而，英国的统治集团从丘吉尔的行动中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丘吉尔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可靠卫士，是一个在复杂情况下善于采取积极行动的人，一个赋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才能的人，尽管有些言行显得“过分热心”。在统治集团眼中，丘吉尔的形象日益高大起来，不久，这一点就有了实际效果。

动用军队对付工人，意味着作为“自由党政

治家”的年轻的丘吉尔向工人们的短暂调情永远完结了。

1911年，世界大战日益临近。这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炮艇来到摩洛哥，表示德国对非洲大陆的“兴趣”。

这一事件在英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豹子号”在非洲的出现，不仅把英德间矛盾的尖锐化与深刻化在刹那间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导致自由党政府的许多成员要求澄清对外政策的立场问题。

丘吉尔完全拥护劳合·乔治在伦敦塞丁区的演说，那就是，如果德国人迫使英国作战，英国定将战斗下去。

德国人没有料到英国政府中会有人持如此“激进”的立场，因此反应上有些被动，他们觉得这是德国驻英大使德尔尼赫伯爵工作得不够出色造成的结果，所以决意要把伯爵召回德国。

丘吉尔同德尔尼赫很熟，听到伯爵即将回国的消息后决定在伯爵离开前举行一次告别晚餐会，在晚餐会上他对伯爵说：“德国不应该企图同英国在海上开战。如果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造两艘……

“豹子号”出现后，丘吉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同德国打仗已不可避免，其他所有问题都置于次要地位！他“义正严辞”地对人说：“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事！”

丘吉尔更加经常地去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被允许可以获知有关英国的战备情况，他还频频与陆军作战局局长亨利·威尔逊将军接触。温斯顿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英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他越来越关心对外政策问题。

丘吉尔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健全的思维。由于受过骑兵军官学校的军事教育，他能够迅速地、内行地分析一系列重要的军事问题，善于收集那些著名军事专家最感兴趣的意见和结论。

根据军事专家的想法和情报，丘吉尔写出了一份关于“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的备忘录呈报给首相。备忘录写得很成功，他在备忘录中确认，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战役将在德法两国军队之间进行，他提出向法国派遣13个师的远征军，加上辅助部队共计30万人，抛开了他先前对未来战争的设想——英国应当主要依靠海军作战，为数不多的英国陆军在大陆强国的庞大陆军之中不可避免会覆灭。但他没有估计到日

趋迫近的战争究竟有多大规模。无论怎样，丘吉尔作为一个政治家已逐渐成熟。

在同工人运动作斗争中表现出的坚决果断，在研究军事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促使阿斯奎斯及其主要阁员挑中丘吉尔为海军部大臣的候选人。因为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证明，海军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准备很差，需要一位得力的干将到海军部去领导工作。

1911 年 9 月底，阿斯奎斯首相向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几年前曾提过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去海军部?"

在丘吉尔看来，海军部随着时移境迁，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可以在军事方面大有作为。另一方面，由于他自己在内政部的过分坚决、有时甚至是冒险的行为，激起了社会舆论的尖锐反对，所以，丘吉尔自己也不大愿意在内政部再做下去，而海军部的位置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转换工作环境的机会，也颇有希望给他一个迅速升迁的活动空间。

1911 年 10 月 23 日，丘吉尔正式坐上了海军大臣的交椅。

从丘吉尔转入海军部时起，他作为一位国

务活动家的成长时期已告结束。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任务是尽快训练同德国作战的海军。准备他认为随时都会开始的战争。

第三章　入主唐宁街

“失去了党，也失去了雷肠。”

初进海军部的温斯顿·丘吉尔，对海军事务并不熟悉。同以往一样，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他总是要找个学识渊博的人来帮助他，这时，丘吉尔立即想起了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费希尔曾经是他的老朋友，但因他反对增加海军预算，两个人闹崩了，可这并不妨碍丘吉尔与将军握手言和的决心。在丘吉尔看来，他迫切需要的是费希尔的支持，至于以往的分歧、争吵，已不再是应该计较、顾虑的事了。这样，费希尔成了新的海军大臣的非正式顾问。

丘吉尔是个精力充沛、闲不住的人。他视察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细了解舰艇的部署情况和舰队的

需要。丘吉尔想要建立一支能迅速打垮德国舰队的英国舰队。

在海军部里，丘吉尔刻意造成一种临战的气氛，使海军各级领导人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值班人员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发出紧急警报。

为了使自己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他把北海大地图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参谋人员每天在地图上用小纸旗标出德国海军舰队的部署情况。他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详细了解潜在敌军舰队的活动。

1912年1月，柏林想同伦敦就海军准备问题进行谈判。英国政府打算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同德国就调整两国装备问题达成协议。丘吉尔对帝国政府的这种意向持异议态度。

当不列颠的谈判代表刚刚踏上德意志的土地时，德皇威廉二世正在国会郑重宣布：大幅度增加陆军和海军的军费开支。德国皇帝宣称：“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德国人民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的年轻人！”

丘吉尔抓住这些言论便大做文章。他既没有和首相商量，也没有征得内阁的意见，就擅自在格拉斯格发表演说，惹出许多流言蜚语。

他声称："英国从来不缺海员，因为英国的儿童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思想准备。""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在说明英国和德国海军的不同之处时，他强调指出："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

"海军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种奢侈"的说法引起柏林的极大愤懑。丘吉尔在格拉斯哥的演说在英国也引起众多的不满。政府认为他的讲话不够慎重，太激烈，保守党人又幸灾乐祸地说："能期望这个家伙干点什么呢？"

丘吉尔对这些反响是不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搭理的。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是，如何尽快地、有效地加强英国海军的战争准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丘吉尔在英国海军部实行了重大改革。他命令，把军舰上的

13.5英寸口径炮换上了15英寸口径炮。由于战争迫近，演练和试验这种新型武器的时间不多，所以确定采用这种武器需要异乎寻常的决心，并要对在军舰上使用这种武器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负完全责任。后来，又决定把军舰烧煤改为烧石油，因为使用石油燃料能提高军舰的速度和机动性，会给英国海军带来很大的优势。英国煤炭过剩，却根本没有石油，为了获得石油，丘吉尔决定建立大不列颠——伊朗石油公司，帝国政府付给伊朗政府一笔为数不大的款子，取得在伊朗勘探、开采和加工石油的垄断权，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归英国政府占有。

这些措施的代价是巨大的，丘吉尔和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之间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913年底，丘吉尔将一份超过5000万英镑的海军预算草案提交政府审核，这是当时帝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军预算。

劳合·乔治曾以辞职相挟来反对这个预算，丘吉尔也不肯让步。最后经过多方调节，双方都作了妥协，丘吉尔缩减预算100万英镑，劳合·乔治同意给海军拨款总额为5200万英镑。

丘吉尔的这些言行，使自由党人清楚地看

到："丘吉尔不是自由党人。他不懂得自由党人的观点。"这对丘吉尔很不利，因为他不能指望得到党的无条件的必要支持。

他同保守党的关系依然不好，虽然保守党人赞赏他的海军政策以及他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演说，但他们仍然认为，丘吉尔是一个无原则的、不可靠的、政治上危险的人物。保守党人根据是，丘吉尔在任海军大臣以前，本来反对增加海军的军费开支，现在，他看到改建海军可以提高自己的声誉，又增加海军预算了。政治观点多变的丘吉尔，被当时的一家报纸称为"无骨气的怪物"。

大战的帷幕尚未拉开，丘吉尔与政府间的矛盾却已显露端倪。他竭尽心智地在海军部鞠躬尽瘁，是坚信，未来的世界规模的大战场，将是他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政治抱负最佳契机。

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着温斯顿·丘吉尔所设计的轨迹发展。他的战略思想不仅与政府的许多官员们格格不入，且在战场上接二连三地被挫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给了丘吉尔一个"契机"——一个失去海军大臣宝座的契机。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时，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德国的失败宣告结束，英国及其同盟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天晚上，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宴会。伦敦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歌声和人们欢快的笑声，市民们为战争的结束而欣喜和快慰。

丘吉尔却“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他清楚地意识到“帝国将面临着新的、也许是更大的压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有两种心情：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他确信，对于一战后的不列颠帝国来说，应把这样的国策纳入意识日程——“同德国人民和睦相处，而对布尔什维克则要干戈相见。”

20世纪20年代一开始，丘吉尔便遇到了不幸的事。1921年6月份，67岁的伦道夫夫人因患血中毒病故了。还没等丘吉尔从母亲逝世的悲痛中摆脱出来，这一年的8月，温斯顿8岁的女儿玛丽戈尔德又死了，这使他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痛苦。

在战后的最初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浪潮尚未向英国本土以外蔓延，保守党人一度容忍了主持政府的自由党人劳合·乔治。到20年代

时，保守党认为已没有必要继续同自由党联合了。他们怪罪劳合·乔治没能成功地进行反苏俄的斗争，仿佛另一个什么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便可以保证武装干涉的成功。保守党人认为，劳合·乔治在爱尔兰问题上走得太远了，他们对战后初期政府向工人阶级的让步也不满。

保守党人想利用自由党失势的机会，按照英国的传统，在和平时期组织一党政府。

1922年10月19日，保守党与自由党的联合宣告破裂，劳合·乔治除了提出辞职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新的一党执政的政府由保守党领袖鲍纳·劳组织，这届政府基本上是由青年活动家组成的，丘吉尔因为是自由党人，自然没有被任用。丘吉尔为此很不服气，他称鲍纳·劳的政府为“11个第二流人物的政府”。

紧接着举行的下院选举，就更加令丘吉尔头痛。

丘吉尔的政治处境是十分微妙的。他对保守党怀有真正的好感，而丹迪市选区（丘吉尔是丹迪市选区的候选人，自由党人在这里的势力很强。）的情绪却是明显地向着社会主义的。在

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决定选择中间道路，他宣布，他既反对极端顽固的保守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

在内心里，温斯顿已经割舍了他在政治生涯的青春期所追求的“自由主义”，他仇恨苏俄，随时随地准备动用武力镇压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抗，积极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但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他不得不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

丘吉尔把自己装扮成进步的活动家，他侈谈劳动者的住宅条件差，必须改善住宅条件，希望增加对失业的补贴，应当改善社会服务工作，他甚至把保守党称为顽固落后分子的党。但是，这并未奏效，选民们仍然不信任丘吉尔。

竞选运动伊始，他就患了阑尾炎。这对丘吉尔来说，实在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在医院切除了阑尾后，他有相当一段时间只能卧床休息，同选民们的联系，他不得不通过妻子克莱门蒂娜来完成。

克莱门蒂娜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玛丽来到丹迪市，代表丈夫进行竞选活动。她竭尽全力想使选民们站到丘吉尔一边，但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补。在群众大会上，克莱门蒂娜的演说

常被场内的叫喊声打断，更有甚者，朝她抛撒令人打喷嚏的粉末迫使她停止讲话。

为保住自己在议会中的地位，丘吉尔未痊愈就出了院。

1922 年 11 月 14 日，丘吉尔坐着残废人的轮椅来到约 9000 人的群众集会上，虽然他满脸病态，行动也不方便，但听众并没有因此对他表示更多的同情与怜悯。他几次想开始演说，都被大厅中四起的喊声所制止。丘吉尔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

1922 年的选举结果对丘吉尔是个沉重的打击，他遭到了彻底失败，他的竞争对手工党的莫雷利以绝对多数被选入议会。这是自 1900 年以来丘吉尔首次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许多年后当谈起那一时刻伤心的滋味时，他还是那么记忆犹新："我甚至未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议会中的议席，失去了党，也失去了盲肠。"

1923 年，在关税保护主义的旗帜下，英帝国进行了新的选举。

丘吉尔认为，他进入议会的机会又来了。他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工党和苏联，想以此为他重返保守党铺平道路，这自然引起选区内持某种进步观点的人士和自由党人对他的反感。

工人们尤其憎恶丘吉尔，甚至不许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言。1923年12月3日，当丘吉尔想在伦敦发表演说时，当局不得不派大量的骑兵和步兵警察来保护他。市民们在极力保持泰然自若的丘吉尔面前挥舞拳头，用石块打碎了他的汽车玻璃。警察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控制了事态的扩大。丘吉尔气愤地说："这是英国最坏的一群人，与其说他们象英国人，倒不如说更象俄国狼。"

选举的结果是，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新政府仍旧奉行资产阶级的对内对外政策，为了掩人耳目，巩固政权，它同苏联也建立了外交关系。

丘吉尔在竞选中又遭到了失败。

事隔不久，出于政治前途考虑，温斯顿再次登上了保守党的航船。

20年代末，保守党内部为了争夺领导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印度问题。

多少年来，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挑动宗教的和种姓的相互仇恨，从而削弱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丘吉尔在这方面特别卖力，他唆使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说印度教徒在军事上是无能的，根本敌不过穆斯林。

大多数保守党人都懂得，丘吉尔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了帝国政策的殖民主义性质，这种论调不仅陈腐，而且对帝国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使印度人确信，他们只有通过本身的斗争，才能从英国人手中争得自由。在保守党内部，以鲍尔温为首的人坚决反对丘吉尔。

丘吉尔失败了。1931 年由保守党和工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没有启用他。从此后的许多年，他不得不当一名普通议员，英国人又称“后座议员”。

丘吉尔一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需要很大开支，赚的钱怎么也不够用

20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西方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作“黑暗年代”。

1931年8月建立的联合政府进一步削减了失业工人的津贴，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军人的薪饷也同时降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专政变得更加残酷。

1932年，以摩斯莱为头子的英国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

1935年，不列颠帝国政府通过极反动的煽动叛乱法案。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必须采用保护关税的税率。这样，1931年，政府废除了1925年实行的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1932年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并在英联邦内实行特惠制。

30年代，对于温斯顿·丘吉尔来说，也是个“苦难年代”，特别是30年代的头几年，尤其使他感到困难重重。

这期间，他返回政府工作的前途渺茫，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恰特韦尔庄园给报纸杂志写文章和著书以打发光阴。

他很少去下院，只是想对某一问题发表看法时才去。一次，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严厉谴责他说：“丘吉尔有什么权力像上帝在终审

法院那样到下院发完议论就走？……除了自己的话，他谁的话也不听!”他的话博得了下院的一致赞同。

事业上不如意，已让他颇为苦恼，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同样使他伤脑筋。

丘吉尔一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需要很大的开支。克莱门蒂娜穿衣打扮花钱很多，连她的丈夫都抱怨说，得写大量文章才能支付她买的一件新衣服钱。丘吉尔也很讲究衣着，喜欢用高级品。他的儿子伦道夫埋怨父亲没有让他在牛津大学毕业，20岁就让他当上了新闻记者。他从小嗜酒成癖，花钱和他父亲不相上下，赚的钱怎么也不够用。

丘吉尔曾向来恰特韦尔作客的一位客人谈起他儿子的事，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父母的只有在孩子出生前才能管住他们。"

这期间，让丘吉尔最感兴趣的事，莫过于写作了。他不只一次地对人说，写作使他在苦闷中得到安慰，写作是休息，是真正的快乐。

撰写六卷本的《马尔巴罗传》，对丘吉尔来说就是这种"真正的快乐"。

温斯顿从小钦佩马尔巴罗家族的奠基人约翰·丘吉尔。约翰·丘吉尔在一生中经历过战争，参加过“革命”，搞过阴谋，遇到过惊险，艳史颇多，这些经历足够写一部十分有趣的书。丘吉尔读过描写他的著名祖先的所有材料，对约翰·丘吉尔的经历知道得非常清楚。在布伦海姆宫藏有约翰·丘吉尔去世后保存下来的大批文献资料，历史学家们还从未接触过这些材料。

丘吉尔在着手写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传记前，曾经长时间地犹豫不定。约翰的经历矛盾重重，错综复杂，这使温斯顿很为难，有些经历甚至使丘吉尔难堪得无从下笔，不知曰何才妥。

众所周知，约翰·丘吉尔是得到英王詹姆斯二世的支持才提拔起来的，可是当国王想把英国变成天主教国家实行君主专制时，约翰·丘吉尔背叛了国王，帮助奥伦治的威廉（荷兰执政者，詹姆斯二世的女婿）篡夺英王王位，迫使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当威廉组织袭击停泊在布勒斯特的法国舰队时，约翰·丘吉尔向詹姆斯二世告发了所策划的作战计划。对于约翰·丘吉尔此番行动的目的，史学家众说纷纭。有的解释说，他准备在詹姆斯恢复英王王位时重新

得到国王的赏识。有的则断言，约翰·丘吉尔把军事计划泄露给敌人，是想使英国的作战计划归于失败，从而达到撤销英军总司令，由他取而代之的目的。

还有就是关于约翰·丘吉尔的种种绯闻，这方面的记载和传闻，使得温斯顿准备在为祖先树碑立传时大伤脑筋。然而，又不得不面对它们：

约翰·丘吉尔置身于那些靠情夫发财致富的贵夫人包围之中，在很短时间内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然而却往往得不到克利夫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欢心。有一天，约翰·丘吉尔和公爵夫人在一起幽会时被国王看见了，他吓得跳窗而逃。约翰·丘吉尔这一冒失的献媚举动，得到公爵夫人5000英镑的赏钱。勤俭的约翰马上用这笔钱购买土地出租，每年收入500英镑。历史学家在书中写道："在约翰·丘吉尔看来，他可以靠天赋的一切来大捞一把。""他在20岁的时候，依靠自己的仪表不俗和富有活力赚钱；到了60岁时，则靠自己的才能和荣誉赚钱。"

丘吉尔用了很长时间来构思他的这部著作。和往常一样，他邀请许多研究过布伦海姆宫

档案的科学工作者共同研究，并从伦敦和巴黎的书库里选择一些必要的文献资料，海军和陆军的一些军事专家帮助他描述约翰·丘吉尔参加过的一些战役的情景。

丘吉尔首先对材料进行分析对比，并同专家们讨论，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

他总是力图使自己的祖先在自己的笔下光彩、高大起来。如他曾用约翰·丘吉尔同贫穷的萨拉·詹宁斯结婚一事，来反驳以往著作中对约翰那些“不雅之事”的描述，但这往往于事无补。丘吉尔不得不承认，他的祖先曾经得到其妹妹情夫的保护，也从自己的情妇手里拿过钱并设法把这些钱再投入周转赚钱；曾在詹姆斯国王手下担任过很高的职务，然后又背叛了国王；曾给敌人奥伦治的威廉通风报信。

丘吉尔把《马尔巴罗传》写成一部情节紧张、充满争权夺利的小说——在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欧洲战场上，在欧洲帝王宫廷里，都在进行的斗争。在温斯顿看来，正是这种权力之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实质。他认为，他祖先的荣誉和金钱都是在英国反法斗争中取得的，并将欧洲历史的发展向前推进了好多年。丘吉尔从这一

时期发生的事件中，看到了英国数百年来推行“力量均衡”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根据。

在著书的同时，丘吉尔在下院的工作不多，最初只是就印度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他曾提出议案，反对印度自治和给予印度自治权力，企图用改革印度管理会带来可怕后果来恐吓下院和政府。

丘吉尔只争取到40多位代表的支持，后来发展到70多位保守党党员，他们组成了“印度保卫同盟”，这个组织在印度问题上反政府的政策达4年之久，活动经费是由印度的大公们支付的。

如果按着这种方向发展下去，他的政治前程大概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但丘吉尔转而研究德国纳粹分子上台后，在复仇的旗帜下对英国的威胁问题，这帮助他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在30年代中期，丘吉尔讲演的话题由印度转到德国。

德国不顾凡尔赛和约，偷偷地重整军备，纳粹分子在复仇和准备新战争的旗帜下攫取了德国政权，当时英国许多人考虑这将威胁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丘吉尔越来越深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在1932年参观马尔巴罗当年作战的地区时，十分注意德国事态的发展，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他已意识到，纳粹分子上台后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给苏联，也给英国的利益带来致命的危险。

各大国在此时对外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苏联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具体方案，采纳这个方案，可以缩小军事威胁，减轻人民的纳税负担。英国政府在当时严重的和平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施展计谋，它口头上拥护裁军，实际上却极力阻挠采纳苏联的建议。帝国政府提出与苏联相对立的方案，其实质是原封不动地保存自己的军队，同时尽量削减对方的军队

1933年4月，丘吉尔已预测到事态的发展方向：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

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3年，以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德国人于这一年的年底宣布不再参加裁军会议，并退出了国际联盟。这便证实了丘吉尔的推测。

裁军会议失败后，温斯顿感到被捆住的双手已经放开了，他的奋斗方向已不再是可能的裁军，而是争取大力重整英国的军事装备。

丘吉尔同英国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看法不一样，他正确地肯定了技术装备在20世纪战争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设计、制造和使用坦克方面做了许多。现在，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又放在了空军上。

丘吉尔是把德国作为英国军事上的潜在敌人来考虑问题的。

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同西欧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人最担心的是德国的空军。丘吉尔因此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极力设法迅速改装英国空军。

鉴于这种思想，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次成功的演说。丘吉尔st这次演说证明，他无论对德国的动向还是对英国军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许多人为此而迷惑不解——丘吉尔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却能掌握充分可靠的实际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得出为以后的事态所证实的结论。

熟悉丘吉尔的人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多年来一直坚持收集有关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的情报，同陆军部和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也保持密切接触。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还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保持联系，也同柏林的人建立了联系。

这些重要人物中，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就是一位使温斯顿受益匪浅的人。林德曼是一位精通军事技术的专家，1932年同丘吉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林德曼常常开车从牛津到丘吉尔的恰特韦尔家中作客。他在现代战争的科学问题方面，尤其在各种统计问题方面，成了丘吉尔的主要顾问。在整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和林德曼一直保持富有成效的合作，丘吉尔从林德曼那

里获得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发表了，在英国，乃至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美国驻伦敦大使D·肯尼迪让他23岁的儿子约翰以“慕尼黑及其后果”为题撰写论文。约翰欣然同意这个选题，根据父亲的建议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提供的材料撰写论文。他采用丘吉尔的论题，并力求把论题展开。文章写成后，父亲很满意，并决定把这篇论文发表出去。约翰·肯尼迪的《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出版后，很快被抢购一空。

1934年，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本国空军的措施。下院在讨论这些措施时，丘吉尔再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那样容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那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象一头捆缚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已达到我国空军的2/3……到1935年

底，即便政府的这些提案付诸实施，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和我们的空军几乎相等。”

1934年11月，丘吉尔对国王的答辩词作了一些修正，指出：“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丘吉尔说：德国现在已有了一支空军，如果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那么到了明年的今天，德国空军的实力至少和我们相等，也许比我们还要强些；如果英国和德国都按现在的速度实行自己的军备计划，再过一年或两年，德国空军实力将超过我们50%，到1937年就比我们强几乎一倍。

“没有希特勒和他挑起的一些事情，丘吉尔可能永远不会重返政府工作。”

1936年3月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上，阐述了他一生所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

丘吉尔说：“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

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

他进一步阐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具有极大的引诱力。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住了欧洲的生气勃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

他强调指出：英国“以日益提高的声誉和日益扩大的帝国而出现于世界，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独立也受到保护，安然无恙。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本能的优良传统。”“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根据这些原则，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并且力图称霸欧洲呢？丘吉尔认为，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并不威胁英国。德国则不然，它哪个国家都不放在眼里，“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的领导是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的唯一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后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

丘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温斯顿·丘吉尔的出发点是，英国实行自己的欧洲政策时，必须依靠法国和国际联盟，必须利用国际联盟建立欧洲反德阵线。

虽然，丘吉尔在这里没有提到苏联，但是，从他关于国际联盟的论断中，可以看出他不排除苏联参加这个阵线，也不排除英国同苏联合作共同遏制德国的可能。

英国当时奉行一条著名的“力量均衡”原

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求在欧洲建立并保持英国的霸权。英国自由主义的大政论家诺曼·恩德雷在1923年时写道：“‘力量均衡’实质上意味着建立我国力量的优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处的地位意味着我们……不能容忍敌对国家的兵力强大到我们无法抵抗的程度，否则我们在外交上就要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在地球上的自由往来也要得到敌国的默认。这就是‘力量均衡’的目的，‘力量均衡’的原则，实际上意味着要求力量上的优势……而要求力量优势就意味着侵略行为。”

可见，丘吉尔发表的这个纲领是对英国“力量均衡”原则的现实而有力的解释。他比英国当时许多政治家更早地认识到30年代德国对英国造成的威胁，看清了对英国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希特勒德国已准备好对苏作战，而是它已成了英国的危险敌人。

在丘吉尔的心目中，后者比前者变得日益重要，这也正是他比他的其他同胞高明处所在。这样，丘吉尔的纲领自然成为英国同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希特勒德国进行斗争的纲领。

对丘吉尔本人的政治前途来说，联合其他

国家共同抵抗德国人进攻的政策，实在是可以提供再好不过的一个机会。丘吉尔同希特勒对立，是因为他害怕纳粹德国变得比过去强大，从而向英国在西欧的霸权挑战。丘吉尔相信，只要动员英国起来反抗希特勒，他就有可能重新得到政府某一职位。

美国政论家弗里西斯·尼尔森下了一个结论："没有希特勒和他挑起的一些事件，丘吉尔永远不可能重返政府工作。"

丘吉尔对希特勒曾一度有过好感，他高度评价并尊重希特勒政治上的成就，钦佩一个普通上等兵当了国家的元首，还欣赏希特勒仇视其最凶恶的敌人——苏联和革命运动。

丘吉尔从没见过希特勒。1932年，他到德国旅行时，曾经准备在慕尼黑会见希特勒，但这次会见未能实现。后来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两次邀请他访问德国并同希特勒会晤，但丘吉尔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他小心地回绝了这些邀请，事后他心有余悸地说："凡是在这一时期访问过德国元首的英国人，后来都很尴尬或者名誉扫地。"

1936年，丘吉尔在朋友的帮助下，对德国

的军费作了专门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每年的军费开支为10亿英镑，丘吉尔就这一问题在下院发表了演说。

1935年夏，英帝国与德国人签定“英德海军协定”，目的是指望建立起来的德国舰队成为德国在波罗的海对苏作战的手段，但丘吉尔却准确地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后果——“英德海军协定”将导致德国加强反英力量和在德国掀起复仇情绪的一切活动。

温斯顿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英国这种单独行动将会有利于和平事业。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德国舰队的吨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够绝对控制波罗的海，并且不久以后，阻止欧洲发生战争的因素之一也就将逐渐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势而论，我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大……但最坏的情况则是影响我们在世界那一边的地位，就是说，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

丘吉尔奋力抨击帝国政府的政策，但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其根源在于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反对共产主义。1936年在西班牙发生法西斯暴动，而后又出现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干涉，当时丘吉尔主张“不干涉”西班牙事务，

而当时英国政府执行的正是这一政策，它不仅适合“西班牙的利益”，也适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利益。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这次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党，又怎么会赞成他们呢？……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不过问西班牙的事情做得对。”对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仇恨，妨碍丘吉尔看清“不干涉”政策，不仅使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事业遭到损害，而且也违背了英国的战略利益。

实际上，丘吉尔在30年代大叫英国战备不够是不甚客观的。众所周知，英国在30年代后半期的军费开支非常大，武器装备的生产规模也很大，这是世界经济危机后，促进国内工业增长的因素之一。1935～1936年度的军事预算为13690万英镑，1938～1939年度的军事预算为25440万英镑。这一预算，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重整军备，首先是改组空军。英帝国在二战前夕，并不象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手无寸铁，无所用心”，它与其他大陆强国一样，卷入了军备竞赛。

1938年，国际关系上的首要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德国要求瓜分这个国家，要霸占它

的大部分领土。英国首相张伯伦打算满足德国的这些奢望。

丘吉尔则很清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德国，而英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地位则会相应地遭到削弱，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对英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9 月 21 日，丘吉尔向新闻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做法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和安全。恰恰相反，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 25 个师的兵力用于西线；此外，还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威胁，所有国家的自由和民主都将受到威胁。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英国政府中，以张伯伦首相为首的一些官员反对同苏联接触，他们的政策是同德国达成

协议反对苏联，而不是联合苏联反对纳粹德国。

随着事态的发展，议会里赞同丘吉尔“必须联合俄国”主张的保守党活动家虽说逐渐多起来，但还只是少数中层人士，如塞西尔勋爵、劳埃德勋爵、爱德华·格里格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等，这样微薄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张伯伦的方针的。

在30年代，苏联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成立某种形式的世界阵线，以制止德国对欧洲的侵略扩张，但在英国，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根本未被理睬。

英帝国没有利用苏联的这些建议向德国施加压力，而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这些建议，深恐因为重视斯大林提出的建议而遭到鄙视，一切事情照常进行，好象苏俄根本不存在似的，以致于英伦三岛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很高代价。

1938年9月28日，张伯伦在下院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表演说，在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人递给他一张字条。张伯伦的表情突然变了样，好象年轻了10岁。他向众人宣布：希特勒同意把军队的动员令推迟24小时，并同英

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行政首脑在慕尼黑会晤。下院对这一消息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很久以来绷紧的神经仿佛一下子可以彻底放松放松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没有随声附和。丘吉尔走到张伯伦面前，同他握手说："祝您成功，您真幸运。"

1938 年 9 月底，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前往慕尼黑，在墨索里尼参加下，签订了协议，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从此明显地被削弱了，几个月之后完全被德国吞并。

张伯伦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一次午餐会，参加午餐会的有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和辛克莱，还有几个"后座"的著名的保守党人：丘吉尔、艾登、劳埃德和罗伯特·塞西尔。丘吉尔劝说他们立即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要求不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可是这些人均表示自己不能签名。有人担心这样会被看成敌视首相的行为；有人认为不经过党的协商，不能采取这样重要的步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有决定，就纷纷离去时，温斯顿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从慕尼黑归来的张伯伦，刚刚踏上英国的土地，就神采飞扬地向民众宣布："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内维尔·张伯伦实在太天真了！他根本没有料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这次慕尼黑会晤中讨论了对英作战的前景。墨索里尼在过后写给希特勒的信中："元首！现在到了对付英国的时候了。我向您提醒我在慕尼黑说过的意大利准备直接参加攻打这个岛的想法。我已准备由陆军和空军参战。你知道这已是我所希望的。"

温斯顿·丘吉尔客观地看到了，慕尼黑协定带来的欧洲力量对比的变化给英帝国造成的危害，他清楚地认识到，慕尼黑协定的签署，是英国和法国在国际事务决策上的失败。他在下院谴责这个协定时，向议员们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要以为这件事会就此结束，这只不过是惩罚的开端，这不过是以后每年都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

正如丘吉尔所认识到的那样，慕尼黑事件后，希特勒用十分挑衅的口气同英国对话。他扬言，他不喜欢丘吉尔或某些英国政治家参与政权，希特勒声称："如果英国人逐渐丢弃他们从

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下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

丘吉尔和他为数不多的同伴，虽然谴责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慕尼黑协定来反对张伯伦政府，以达到改变政府和改变政策的目的。丘吉尔在下院谴责慕尼黑协定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替张伯伦辩护："没有哪一个人象首相那样坚决地、不妥协地追求和平，这是人人皆知的。象他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

温斯顿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尽可能不激怒保守党领袖。他深知，没有党的领导人的同意，他得不到大臣的职位。下院以360票对114票同意了慕尼黑协定。下院的在野工党投了反对票。投弃权票的有30～40名。在不同意政府对慕尼黑协定评价的保守党员中有丘吉尔。

在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持久、稳定的和平”并激起短暂的喜悦之后，人们开始迅速觉醒。许多人都认识到，慕尼黑事件只能使同德国的战争更加迫近，英国只有同苏联结成联盟才有生路。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在英国“出现了

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大运动……政府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做好战争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重大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和刺激德国、意大利。”

帝国政府基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耍了个小小的外交手腕——伦敦的官员们突然成了苏联大使馆的常客，但莫斯科并未被此迷惑，在1939年2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同英国大使的谈话记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向大使指出，暂时还看不出你们对慕尼黑方针有任何改变的迹象……我们的谈话只不过摆出姿态，是战术手段，而不是张伯伦同我们合作的实际意图。”

在那些日子里，本来还有可能扭转局势，可伦敦却拿英国民众的命运作赌注，继续玩弄冒险的把戏，终于把事情弄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开进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了。德国公然撕毁了在慕尼黑达成的需要共同解决这类问题的协议，在没有征得英国同意的情况下，悍然行动了。

“慕尼黑政策”正式破产。

慕尼黑会议之后，英法两国的领导人都坚信，一旦中欧出现新的复杂情况，德国会同他们

协商解决，但他们没有料到希特勒会把慕尼黑协定当成一纸空文。

现在举世皆知，不仅希特勒的话不能相信，就连张伯伦也是用最愚昧无知的方式欺骗了民众。由于英国首相的目光短浅和天真幼稚，世界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倾向希特勒方面。

在希特勒的鼓动和英国政府的纵容下，1939 年 4 月，意大利法西斯占领了阿尔巴尼亚。

4 月底，丘吉尔针对意大利法西斯的这一侵略行径，在下院发表了著名的声明："我根据 25 年的和平与战争的经验，相信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和阿尔巴尼亚的被侵犯这两件事情中，听说英帝国各部大臣对于将发生的事好象毫无所知……我不相信这是英国情报工作的过失……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为了缩小其影响和重要性而任意加以筛选和粉饰，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了。

很显然，当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迟早要把能够领导抗德战争的坚强有力的人吸收进来，

随着客观局势的发展，丘吉尔参加政府取得政权的希望与日俱增。

张伯伦在日记里写道："战争的可能性越大，丘吉尔进入政府的机会就越多。"

1939年春夏之交，张伯伦尽管屡遭挫折，仍然希望同希特勒谈判并取得成功，希望 英国与德国之间不发生战争。既然首相有这种意向，那么丘吉尔进入政府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了，因为希特勒会把吸收丘吉尔进入政府看作是对柏林不够友好的举动。

性急的丘吉尔不想坐等事态的发展，对张伯伦首相的决定也不满意，于是在1939年3月，丘吉尔基于只有扩大现在的政府，他才有可能获得大臣职位的考虑，联合艾登和30位保守党议员，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有些宣传媒介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

张伯伦则另有打算，急于求成的丘吉尔没有达到目的。

保守党人准备让丘吉尔继续扮演大喊大叫的英国哈巴狗的角色，他们认为，嗒巴狗是不能上餐桌的，只能呆在狗窝和院子里。

1939年3月，就张伯伦退休后首相后选人

问题，举行了民意测验，当时有38%的人提名艾登，只有7%的人提名丘吉尔。

张伯伦的政策当时已渐渐失去民心，失去了社会舆论的支持。英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要防止新的战争，不能不联合苏联。在英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这种情绪。丘吉尔指出："自己把自己弄到这种可怕的地步，现在，至关重要的是依靠更广泛的支持。"

张伯伦政府并未理睬关于寄希望于苏联的要求。相反，在1939年3月以后到战前的5个半月的时间内，英国政府仍然继续实行同侵略者妥协的政策，而且用一整套外交手段把妥协政策掩盖起来。

这套外交手段最为明显的表现在1939年英、法同苏联的谈判中。

4月15日，英国政府致函苏联政府，询问苏联政府是否同意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当苏联的任何欧洲邻国一旦遭到侵略需要它支援时，苏联政府即准备提供援助。

这个建议实质上带有挑衅性质。伦敦建议莫斯科准备在一定的情况下对德作战，可是它对苏联却不承担任何义务，其用心不是别的，就

是企图使苏联卷入一对一的对德战争。甚至连英国驻苏大使西兹也感到自己政府的建议没有道理，他向苏联政府递交建议后，认真地想了一天，然后向本国外交部报告说，这个建议给人的印象好象是“我们没有打算采取什么重要步骤，苏联当然担心它是在替别人火中取栗。”

与英国政府相反，苏联政府对组织反侵略阵线是满怀诚意的。在收到英国的建议后，苏联政府于1939年4月17日，向英、法政府提交了自己的建议——当欧洲的侵略势力侵犯任何一个缔约国时，三国有义务彼此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全面援助。

1939年春，英、法两国的外交和内政的局势，使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同意按苏联政府提出的建议举行谈判。但是，谈判进行得很勉强，英法两国也不打算把谈判顺利地进行到底。张伯伦有意拖延谈判，他需要时间，以便同德国达成协议。

在英国下院经常提出同苏联举行谈判的问题，丘吉尔、艾登和劳合·乔治主张迅速同苏联结成同盟。

丘吉尔在辩论中说道：“我始终不能理解

……按照苏联政府提出的广泛而简单的建议，同俄国达成协议有什么不好？联盟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抵抗侵略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我看不出苏联的建议有什么不好。”丘吉尔问道：“为什么你现在不愿意成为苏联的同盟者，在这个时候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丘吉尔渴望同苏联结盟的同时，还要求同苏联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丘吉尔说道：“显然，俄国除非得到平等的待遇，否则是不准备签订协定的……国王陛下的政府曾长期忽略了我国的国防，又已经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全部军事力量，现在对技术问题不加考虑就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又拒绝并丢掉了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最坏的战争之中，这样，政府就辜负了国民的信任……”

温斯顿·丘吉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抛开了强烈的反苏成见，作出了非常理智的、深邃的判断，显示出一位大国务活动家的品质。

要是张伯伦政府听取了他的意见，德国法西斯很难在1939年9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事实上的帝国政府，却走着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英国政府在慕尼黑会议后的头几个月，就试图同纳粹分子谈判，不过后者只是听听而已。1939年夏，英国政府更坚定地向德国政府提出举行谈判的问题，向希特勒提供了一份经过仔细研究的谈判提纲，并许诺将作出重大让步来引诱希特勒。5月，波兰驻英大使向本国外交部的书面报告写道，毫无疑问，张伯伦正在排除一切障碍，"设法同柏林，可能的话也同罗马谈判"。大使认为，张伯伦在这之前不久的讲话"是再次建议德国同他达成协议，我不知道如今已是第几次建议了，同时从他这篇讲话中还可以看出，他对同苏联结成联盟早就持反对态度"。

据1939年6月13日德国外交部副部长魏茨泽克同英国驻柏林大使亨德森谈话的记录记载，亨德森"似乎通知说，伦敦已做好同柏林的谈判准备"，"他批准英国在莫斯科的政策"，认为"同俄国签订公约没有任何意义"。过了两个星期，双方又会见了一次，又是亨德森探寻"新的英、德谈判开始的时间"。英国代表准备答应，

只要德国人决定正式开始同英国谈判，英国就停止莫斯科的谈判”。

魏茨克写道：“同14天前一样，大使又询问是否要结束英国在莫斯科的谈判，以促进英、德开始谈判……用他的话说，认为张伯伦离开和平路线是绝对错误的。”所谓“和平路线”应理解为对侵略者的“绥靖”路线。

的确，英国政府如此向纳粹分子献媚，甚至在1939年夏那样危险的月份，也没有离开最危险的慕尼黑道路。

英国外交的两面把戏自然要妨碍莫斯科谈判取得成效，使得苏、英、法军事代表团于1939年8月开始的谈判毫无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几十年以后，英国《卫报》写道：“从公布的1939年的文件中清楚地看到，如果张伯伦政府听取了苏联的劝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致于在这一年爆发。英、法和苏联的联盟是能制止战争的，因为当时希特勒下不了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决心。”“如果张伯伦和他的大臣们愿意，英国是有可能同苏联结盟的。俄国需要结盟，也想结盟。英国需要结盟，但不想结盟。”

丘吉尔在总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政策时说："英国人洋洋得意的蠢事和孤力无援……在制造破坏和平的骇人听闻的灾难中起了一定作用。"

丘吉尔在得知希特勒把自己看成敌人之后，担心潜伏在英国的许多德国间谍会暗害他，便请过去曾保卫过他的苏格兰场的巡官汤姆森带枪到他身边来，整夜警戒。丘吉尔平时自己也格外小心，严加防范，做到枪不离身。他是这样解释他的这些举动的："在那段等待时机的时间里，我知道，如果战争爆发——谁还能怀疑这点呢？——一副沉重的担子将落到我的肩上。"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时局的变化，为丘吉尔打开了通往政权之门。

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当天，丘吉尔接到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邀请，要他晚上到唐宁街10号去见张伯伦。丘吉尔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在9月1日这天表现得克制、谨慎。

果然不出温斯顿所料，张伯伦提议他进入政府并作为战时内阁的阁员。丘吉尔立即表示

同意。接着，他们商谈了战时内阁的人选问题，丘吉尔想趁机拉几个自己的追随者进战时内阁。

9月1日深夜到2日凌晨，丘吉尔伏案疾书，他写信给张伯伦，建议要求自由党的代表人物（指他的追随者阿希博尔德·辛克莱）和安东尼·艾登参加政府工作（艾登因反对张伯伦同意大利妥协于1938年2月20日辞职）。丘吉尔在这封信中重复了其他议员在议会中发表的意见，担心张伯伦逃避对德宣战。

张伯伦不仅拖延宣战，而且拖延丘吉尔进入政府，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张伯伦主张同希特勒谈判，决不肯轻易为吸收象丘吉尔这样的人物参加政府而激怒德国元首。

9月2日深夜到3日凌晨，丘吉尔在给张伯伦写的信中："星期五你跟我谈过，我将成为你的同事，而且还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可是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虽然我觉得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似乎和你对我说'大局已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但我终究不知道，在这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丘吉尔自然对所发生的一切是了如指掌的，只是他不愿意在下院公开反对张伯伦。因为如果他这样做，虽然能达到对德宣战的目的，但很能影响首相吸收他进入政府。丘吉尔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张伯伦害怕他在下院发表对政府的言论，正是为了使丘吉尔在这些天里保持沉默，张伯伦才在9月1日邀请他加入政府。

9月2日深夜到3日凌晨，当丘吉尔发现首相在拖延时间，便决定恐吓张伯伦一下。

他通知张伯伦，如果在预定的9月3日中午的下院辩论开始前，他还得不到张伯伦对他进入政府有什么进一步打算的话，他将在下院发表演说。同时，他还请求张伯伦同他一起讨论未来的战时内阁的人选问题。他用这种方式提出战时内阁人选必须同他协商的要求。

丘吉尔究竟打算在9月3日的议会辩论时做些什么，不得而知。不管怎样，张伯伦在这一天总还是把丘吉尔约束住了，他在下院给丘吉尔一张便条，请他在辩论结束后立即会面。

“从1939年9月3日上午11点起，英国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张伯伦在下院宣布说。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指出：“是下院把战争强

加在动摇不定的英国政府头上的。”几经曲折，英帝国政府终于作出了得到下院支持的决定。

丘吉尔完全有理由分享这一决定的喜悦。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前几天的心情激动和极度兴奋之后，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议员们演说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抓住了我。我觉得心地坦然，并体会到一种凌架于人间事务和个人问题之上的超然感。”

然而，人间事务和个人问题是不能忘却的。对德国宣战等于正式承认内维尔·张伯伦的政策彻底失败，这意味着，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张伯伦将不可避免地离开首相宝座，因此，丘吉尔考虑要使自己成为取代张伯伦出席首相的当仁不让的候选人。

在战前的年代里，丘吉尔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曾进行过坚持不懈地批评，而且他的批评又多为事态的发展所证实。所以，在英国的社会舆论中，他是深孚众望的，人们把他看成是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权威人士。

丘吉尔懂得，纵然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本，却仍不足以使他取得首相职位。能否取得首相职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在下院占压倒多数

的保守党。

因此，在开战前后，丘吉尔不再对保守党及其领袖张伯伦提任何批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强调既往不咎，换句话说，就是对张伯伦和保守党其他领袖所执行的遭到可耻失败的政策的责任既往不咎。丘吉尔极力表明，他在内政、外交及战时一切问题上，都同这些人真诚合作。

就是在家里，他也不准自己或家庭成员对张伯伦有任何戏谑之言。过去，在丘吉尔家的早餐桌上，总会听到许多批评张伯伦和其他慕尼黑分子的尖刻语言。而这时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说话的人则要受到批评。

一次，在丘吉尔一家进早餐时，丘吉尔的一个孩子刚刚说了句温和的笑话，丘吉尔的脸上立刻出现严峻的表情。温斯顿非常严肃地说："如果你们想对我的领导人发表侮辱性的意见，就请退席。现在，我们已经团结一致共同从事一项巨大事业，我不愿再听到对首相说出这类语言。"在场的那些知底细的人，都忍不住要发笑，因为谁人都晓得，几天前，也是坐在同一张桌前，还可以任意讽刺张伯伦。

1939年，保守党在下院占压倒多数。丘吉

尔在开战前又异军突起，与众不同，几乎是完全孤立的。这种形势，都对丘吉尔进入政府不利。他自己很清楚，如果只能得到两个反对派和几个“不安分守己”的保守党人的支持，必然一事无成。他必须把整个保守党引到自己方面来，而不是分裂这个党，无论如何，他是准备这样做的。

痛苦年代的经验使他确信，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

张伯伦政府是不想打这场战争的。于是在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出现了历史上称之为“奇怪战争”的时期。在这些日子里，虽然英国已经正式对德宣战，而实际上英国并未真正投入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行径的战争。英、法两国政府在援助波兰的问题上袖手旁观，而在波兰陷落后又不想刺激德国人，深怕妨碍对德议和。实质上，是慕尼黑政策在新条件下的继续。

希特勒曾对其亲信说明英国和法国的政策：“虽然它们对我们宣了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将真正同我们作战。”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没有错。当时，事情的演变的确没有超出形式上的对德宣战。英、法政府故意回避接近苏联边

界，回避一切有碍于希特勒东进的积极军事行动和步骤，在德法西部战线一弹未发。事实证明，希特勒分子的预计是正确的。

作为张伯伦政府海军大臣和阁员的丘吉尔，对帝国政府奉行的这条政治路线并不赞赏，可是因为他已经是政府官员了，就没有公开对此提出批评。为了不致触怒张伯伦和政府其他同事，丘吉尔只是偶尔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积极进行抗德战争。

希特勒向德国提出伪善的和平建议，声称只要丘吉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在英国政府内不取得优势，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对此，丘吉尔给以回击，鲜明地指出，希特勒和纳粹制度是对英法两国致命的威胁。

在“奇怪的战争”时期，丘吉尔在海军部非常紧张地开展工作。对于庞大的英帝国军队来说，这段日子，海军活动最积极，海上进行了真正的战争，丘吉尔每天工作达18个小时。在丘吉尔的领导下，把商船队编入海军护航舰队，制定了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计划，组织改造新的军舰，并组织探索德国潜艇和袭击舰。

丘吉尔在这段时间，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建立了直接联系。罗斯福是明智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遇事冷静、沉着，从不鲁莽，这往往正是丘吉尔所做不到的。

罗斯福总统当时很可能已经预见到，英国政治的未来是属于丘吉尔的。同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见过一面的罗斯福，以个人的名义，于1939年9月11日给丘吉尔写信，欢迎他重返海军部："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和我联系。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

丘吉尔读着罗斯福的信，内心十分激动，他知道，总统先生的这种表示，是对他政治上的最大支持，因为首相和总统很熟悉，罗斯福的信，等于向首相表明了他自己的态度。

丘吉尔立即给总统回了信，从此开始，一直到罗斯福总统去世，两人通信达千封之多。

英国政府明白，"奇怪的战争"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于是便试图寻找出路，把对德战争转向对苏战争，也就是想要通过某种方式结束对德战争，以便联合德国一同反苏。

1939年底，在英国统治集团的唆使下爆发

了苏芬战争。伦敦认为转移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苏芬战争爆发后，英法政府不仅对芬兰提供了各种援助，而且决定，通过挪威和瑞典派遣援军支援芬兰进行反苏战争。从而表明，英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丘吉尔支持张伯伦向芬兰派遣英法援军的计划，虽然他曾打算在挪威和瑞典发动攻势以阻止瑞典对德国的矿石供应，但他还是同意了张伯伦关于把战争从德国转到苏联身上的政策。

丘吉尔的这种立场是有一系列的原因的。他当然高兴德国和苏联两虎相争，也可能他不想同张伯伦和其他想转移战争祸水的政府中的同仁们分道扬镳。在那段时间里，他完全改变了前些年未进入政府前的对苏态度，很像对苏干涉时期和20年代那样，又重新敌视苏联。丘吉尔关于苏联的言论同首相的观点实际上毫无不同之处。

1940年初春，张伯伦异想天开地以为英国对德战争的胜利已有保证。他认为，在“奇怪的战争”期间，英法两国充分动员了自己的一切资

源，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得有利于同盟国，未来的胜利是有把握的。张伯伦在重大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屡犯错误之后，又做了一次错误的估计。

芬兰领导人在芬兰军队遭到失败后，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协议，这样，英国也就避免了因执行转移战争路线必然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在张伯伦声明“胜利已有保证”的五天之后，德国人向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并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国家。英国想利用自己的海军、空军和陆军在挪威抵抗德国人的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

“奇怪的战争”政策的破产，芬兰战争失利和挪威的失败，激起了英国人民对张伯伦政府的严重不满。人们在迁怒于张伯伦的同时，热情欢迎丘吉尔。这种舆论氛围笼罩了整个英伦三岛，也影响到下院，不仅工党人士，就连追随丘吉尔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都已明白，张伯伦政府已不可能再有所作为。

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只获得了81票的多数，这是惨重的失败，因为支持政府的多数票通常达240票之多。许多保守党员投

了反对票或者弃权，也表明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投票结果表明政府必须辞职。国内和多数人的心情是，只有温斯顿·丘吉尔可以作为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的无可争议的继承人。

丘吉尔了解这种心情，同时也知道，张伯伦和保守党的许多领袖不会提他作为候选人。

保守党人不喜欢丘吉尔的独断专行，丘吉尔多年来对他们的“凌辱”尚且记忆犹新，当然，他们也不相信丘吉尔能按照他们的意志领导战争。总之，保守党人想从拥护慕尼黑政策的人当中，选择冷静、可靠的自己人作为首相的后选人。

社会舆论赞成丘吉尔领导政府，可是丘吉尔本人不能过分表现他觊觎首相宝座。原因之一是，他不只一次地当众宣布，在发生战争的非常时期，他准备在不论什么人的领导下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原因之二是，直接要求首相职位，就使自己同保守党及其最高领导人对立起来。丘吉尔内心十分清楚——急于求成反而会一事无成。

当英国保守党领导集团的夺权之争正在

"中原逐鹿"时，德国在西线发动了攻势。法西斯袭击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

攻势是5月10日早晨开始的，张伯伦企图利用这一新形势，紧握大权不放。他认为，在战争紧急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敢强行改组政府，工党和自由党也会同意建立他领导的联合政府。

张伯伦再一次犯了错误。他遭到了工党和自由党的拒绝。这时，张伯伦才明白，大势已去，局势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于是，他到白金汗宫向国王递交了政府辞呈。

当时的政治局势对丘吉尔十分有利，人民拥护同法西斯德国进行积极的、坚决的斗争，而在当时不列颠帝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当中，只有丘吉尔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卓越才能。

1940年5月10日下午6时，英王授权丘吉尔组织政府。

温斯顿·丘吉尔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权。

他在回忆1940年5月10日"被授予主持国政大权"的心情时，有这样一段独白："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的多事之秋，我的脉搏始终

平稳……我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丘吉尔始终认为，他命中注定要高居于众人之上。他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当上了英国首相，并对自己所承担的重任充满了信心：“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我虽然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他说：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你们。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和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已经变成独裁者”，“所有的人都害怕首相，我也怕……”

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法前线的崩溃，使不列颠帝国面临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关头。

内政和外交上的一系列问题，一下子全部摆在了丘吉尔的面前。

丘吉尔政府仍由慕尼黑分子把持，不仅仅因为丘吉尔要依靠慕尼黑分子领导的保守党和保守党人在下院占多数，而且由于丘吉尔和慕尼黑分子的阶级立场相同，所以他们很容易达成谅解。

在政府中保留了慕尼黑分子，使得英国的爱国进步力量不得不为驱逐这些分子进行长期斗争。同时，慕尼黑分子对丘吉尔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且使抗击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复杂化了。

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接受了下院领袖和国防大臣的职务。作为国防大臣，他实际上

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虽然丘吉尔只在较低的军职上服过役，而且服役的时间非常短，但由于他多年来对军事问题感兴趣，钻研军事史，并且仔细研究过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的工作，这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有可能向军事领导人提出大量的“出色想法”。在战争年代对丘吉尔有着深刻了解的罗斯福总统也曾称赞丘吉尔的丰富想象力，他说丘吉尔总有不少“出色的想法，一天能出100个主意，其中可能有4个是有价值的”。

从总的方面来讲，丘吉尔和军事将领们对战争的进程有着相当多相同的观点。但丘吉尔的性格果断、自信、专断，并且不论是谁都不能触犯他，同他争辩非常困难，他能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地压过别人。这一切使英国的军人们感到，与丘吉尔共事很困难，幸运的事，这位首相加战略家的时代巨人和职业军人之间的摩擦并未发展成为重大冲突。

丘吉尔对民政部门的领导也是如此。

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真正建立起战时秩序，迅速建立起庞大的陆军，扩大了空军和海军，积极发展军火工业。

丘吉尔喜欢外交，很重视外交方面的工作。刚刚出任首相，就以同罗斯福总统个人通信的方式，解决了英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丘吉尔也很关心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之后，另外一些外交问题，主要是战后和约问题，在丘吉尔的活动中占踞重要地位。

丘吉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的演说刚健有力，有人认为这主要不是由于他思想深刻和逻辑性强，而是对听众有感染力。但不管怎样，丘吉尔的确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他善于雄辩，并能紧紧抓住听众的兴奋点。在对德作战期间，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

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地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

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人民的赞扬，也得到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丘吉尔的威望日益提高。

在战争期间，小型战时内阁的阁员集中掌握了英国的整个大权。战时内阁得到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因此，它有稳固的基础。

丘吉尔就其个人来说，是战时内阁的杰出阁员，他独揽首相和国防大臣的职权，掌握了极大的，实质上是无限的权力。形势所迫，加之丘吉尔本人的无比自信，促成了如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种结果：丘吉尔“已经变成独裁者”。

在丘吉尔首相周围的人，常常感到工作上很为难，他身边的一位同事在日记里说：“所有的人（指战时内阁成员，笔者注）都怕首相，我也怕……。”

丘吉尔把自己领导国务活动的方法概括如下：“我想做的所有事情，经过阁员的明智讨论后，总能按照我的见解得到通过。”丘吉尔所谓的“明智讨论”，一般都要接受他的观点和意见才能结束。

也有例外：

有一天晚上10点钟，丘吉尔在战时内阁的地下指挥部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丘吉尔昂首挺胸地走进来，然后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军需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丘吉尔听罢大发雷霆。他说：“在我的一生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国王的老臣竟会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其实，利特尔顿的建议是很现实的，也

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丘吉尔无言以对，只好悻悻地在午夜过后无可奈何地结束了会议。他愤愤不平地说："简言之，我们一致通过了军需大臣的愚蠢建议。"

"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

丘吉尔取得政权后，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训练陆军、空军，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

法国人坚决要求补充军援。英国的陆军很少，但空军很强，法国政府因此一再要求派遣新的飞行大队去法国。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丘吉尔不顾艰险和个人安危，数次飞往法国，同法国政府官员会谈。会谈中法国人总是要求飞机，而丘吉尔总是回避向法国派遣自己的空军后备力量，主张法国靠自己的现有装备进行斗争。

不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被德军截断，丘吉尔这时主要关心的是撤退英国远征军。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虽然终于撤了出来，但这些部队的装备，不得不全部丢弃在法国。

这样，在1940年英军遭到惨重失败，英国继续同德国作战的前景十分暗淡。

丘吉尔在这个非常时刻，表现得异常坚定、勇敢。6月4日，在下院召开会议的时候，丘吉尔首相向全体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充满信心地在空中作战，我们将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丘吉尔曾在1940年5月，试图把墨索里尼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以个人名义给墨索里尼

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他们的友谊，并希望墨索里尼不要同德国站在一起。但这一尝试毫无结果。英国在南欧、地中海和北非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在法国最后挣扎的日子里，为了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丘吉尔积极主张英法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宪法，共同组织一个议会，组织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这项建议的本意是使法国依靠自己的殖民地，首先是北非，继续同德国作战。另外，丘吉尔还有他自己的算盘，那就是，如果他的想法能实现，法兰西殖民帝国和强大的法国海军将处于英国管辖之下。

法国政府这时一心要与取得节节胜利的德国法西斯妥协，而不是向濒于灭亡的英国靠拢。丘吉尔的建议毫无结果。

1940 年 6 月 22 日，法国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英国失掉了所有的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

"在法国被击败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温斯顿·丘吉尔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地提

高了他在民众心中的威望，人民将他看作是民族战争的领袖，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在人民反法斯战争坚定立场的深深感召下，丘吉尔的行动更加果断、勇敢，他以肺腹之言表达了英国人民经过战火考验的不屈精神：“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帝国就是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1940年夏天，当德国空军空袭英国时，英国空军给予坚决的回击。在空战中，英国人的损失十分惨重，可是德国人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英国人民的意志被战火锤炼得更加坚强。

英国政府在法国失败后仍坚持作战，这一举动不仅提高了丘吉尔在广大人民中的声望，也渐渐改变了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保守党员们渐渐懂得，丘吉尔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只有利用他日益提高的威信，方可挽回这个党在人民当中的声誉。1940年9月底，内维尔·张伯伦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辞职，因此需要选举新的保

守党领袖，丘吉尔被公认为最佳人选。《星期日泰晤士报》表达了保守党领导人的观点："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丘吉尔懂得，英国孤军作战必须设法摆脱不易避免的迅速失败，因此，采取许多坚决措施：根据抗敌需要动员国内各类资源，扩大军火工业，建立民防队，进行反击德军的训练，以防德军入侵英国岛屿时措手不及。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设法争取新的盟友。

德国是可怕的劲敌，所以新的盟友必须具备同德国旗鼓相当的或者超过德国的实力。当时只有两个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没有参战。就是苏联和美国。丘吉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两个国家。

他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书信往来，共同商讨最重要的英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问题。丘吉尔积极设法说服罗斯福，要他相信，英国取得胜利对美国有利，而德国若取得胜利必将给美国带来不幸和灾难。他千方百计地鼓动美国参加抗德战争。

经过多番努力，丘吉尔终于同罗斯福谈妥，英国以租让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的50

艘旧驱逐舰。这一交易与其说使英国海军得到补充，不如说在推动美国参战上取得重大进展。

与此同时，在 1940 年下半年和 1941 年上半年，美国给予英国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是对处于困难时期的英国一个有力的支援。

华盛顿虽向伦敦伸出援助之手，但并不急于参战。丘吉尔首相担心，在美国尚未与英国坚决地并肩战斗之前，就会有不堪回首的悲剧出现。基于这种考虑，丘吉尔认为，利用苏联与德国抗争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苏联在 1939 年就想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抗击法西斯德国，并制止它发动战争。莫斯科的领导人准备，如果不能制止战争，就同别的反法西斯国家一起迅速消灭纳粹势力。然而，由于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一种"暧昧"态度和消极举措，致使英、苏同盟一直未能形成。

但是，不论英国以前有过何种不明智的举动，它在"英勇的孤军作战"时期，用自己的努力弥补了以往的一切过失。

丘吉尔决心改正张伯伦时期所犯的错误，并在对德作战中得到苏联的支援。然而，如果认

为这时的英国政府立即采取同苏联建立平等关系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方针，是不客观的。

妨碍采取这种方针的既有英国统治集团内部敌视苏联的因素，也有前慕尼黑分子不想同苏联一起进行抗德斗争的因素。另外，也有丘吉尔本人的作用在里面。丘吉尔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使到了他政治生活的暮年，也没有改变。他曾在40年代的广播讲话中，正式声明："纳粹制度具备同共产主义一样的最坏特征……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哪一个人象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对以前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每句话，至今毫不反悔。"

但是，局势的发展迫使丘吉尔把感情放在次要地位。1940年夏，他任命当时的工党左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为驻苏大使，责成他努力改善英苏关系，并说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放弃中立。

丘吉尔得到情报说，德国正在苏联边界一带集结军队。丘吉尔不能确定这是否意味着希特勒准备攻打苏联。使丘吉尔坐立不安的是，德军在苏联边境地区的集结会不会仅仅是对苏联

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苏联会不会不战而降。

对丘吉尔来说，就象需要空气那样需要德苏开战。英国只能在德苏开战的情况下，才能争取到强大的盟友，才能指望在对德斗争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取得对德斗争的胜利。只有苏联参战，英国才能在美国站到它这方面来之前坚持下来，因此，丘吉尔强烈希望德国和苏联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开战。

德苏之间的战争，符合英帝国主义者的长期战略意图，同时也是挽救英国的最后希望。没有苏德战争，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可能会有灭顶之灾。

丘吉尔亲自写信给斯大林，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在4月12日到13日的深夜将丘吉尔的信送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该信："苏联如不立即决定同尚在抵抗轴心国的巴尔干各国友好合作，俄国人将失去同其他各国一起保卫自己边界的最后机会。"这样一来，丘吉尔实际上是要求苏联立即撕毁同德国的互不侵犯条件，并向德国发起进攻。

丘吉尔在催促苏联站出来反对德国的同

时，还唆使德国进攻苏联。

据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同丘吉尔保持密切接触的加拿大人威廉·史蒂文森，在战后出版的书中透露，1941年春天，英国情报中心伙同美国联邦调查局，暗中送给德国驻华盛顿使馆一份材料，内称："从极端可靠的来源得知，一旦德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苏联便对德国进行军事入侵。"根据英国情报人员说，这是"战略性的虚假情报"。很显然，丘吉尔的部下暗中给德国人投送情报的唯一目的是，挑唆德国进攻苏联。

火车正在沙漠中行驶，丘吉尔突然命令停车，并且要求从蒸汽锅炉中取出热水来给他洗澡，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就在许多惊奇的阿拉伯人面前洗澡，还说："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裸体人。"

虽然处于战争环境，丘吉尔还是遵守自己的生活习惯，尤其不能放过周末休息。

他一般在星期五的下午就离开伦敦，到郊区的契克斯首相官邸，他在那里边工作边休息，

度过星期五的下半天、星期六和星期天。

考虑到德国人已把丘吉尔视为顽强可怕的敌人，担心德国人谋害他，并且更怕德国人趁丘吉尔住在契克斯时，空袭首相官邸，安全保卫人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

其中的一种措施是，每次首相要去契克斯前，都要观察天气情况，尤其是夜晚月色的明暗度，如果从空中容易发现契克斯时，丘吉尔则不住在那里，而改道到迪奇莱住所度周末。迪奇莱住所的主人是丘吉尔的一个朋友，丘吉尔在迪奇莱住所度周末，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有时迪奇莱住所的主人还邀请一些首相需要的客人同他一起度过周末。

丘吉尔非常喜欢看电影，在度周末时，经常放映一些他事先挑选好的电影。据说，他当时最喜欢的一部影片是《飞吧，汉密尔顿》，在战时，这部影片他看了六遍，并且授予这部影片的导演亚历山大·科尔骑士称号。

丘吉尔非常喜欢洗澡，据他的保镖汤姆森说，20 年代初，有一次他们乘火车去埃及，火车正在沙漠中行驶，丘吉尔突然命令停车，并且要求从蒸汽锅炉中取出热水给他洗澡，一切准

备停当之后，他就在许多惊奇的阿拉伯人面前洗了澡，还说："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裸体人。"

契克斯离伦敦不远，乘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丘吉尔通常都是星期五就去契克斯，大约在下午四点到达那里，通常还有一些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同他一起去度周末。

丘吉尔在契克斯有三个秘书和一些随从人员，他们是：丘吉尔的私人助手兼侍卫长汤姆森、侍从、保镖汤姆森和一个协助保镖的密探。随同丘吉尔去契克斯的还有两名电影放映师、三名司机和伦敦检察厅为加强保卫工作而增派的执勤人员。

丘吉尔到达契克斯的第一件事是洗澡。他洗 完澡后，常常穿上一件有许多纽扣和拉锁的衣服，这件衣服是丘吉尔专门设计的旅行连衫服，看起来很象一套海怪的装束，每当他穿着这套装束时，看见的人往往会忍俊不住。

丘吉尔完全不顾客人们的整洁装束，就穿着这套衣服去吃饭。午饭后，丘吉尔一般先回到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又穿着仅仅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鲜艳的东方式长袍回到客人中间，据

说他有好几件这种式样的长袍。同客人叙谈一阵之后，丘吉尔便叫上秘书，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工作，常常一直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

这时，尽管丘吉尔的公务繁重，但他感到自己的精力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沛。他的胃口非常好，身体健康，六、七十岁的老人看起来年轻、活跃，与战前时那种老态龙钟的样子比，简直判若两人。

1941 年 6 月中旬，丘吉尔认为，德国开始进攻苏联的日期已经指日可待，甚至可以说指时可待。丘吉尔毫不怀疑，英国必须依赖苏联方面的支援，这是由于德国进攻苏联所带来的支援。

丘吉尔同罗斯福总统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在对德作战中援助苏联，因为从英美两国的切身利益出发也要求这样做。

1941 年春天，德国政府决定派希特勒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访问英国，目的是想同英国议和，并引诱英国同德国站在一起参加反苏战争。

5 月 16 日这一天，是星期六，丘吉尔与以往的许多周末一样，正在迪奇莱度假。丘吉尔在津津有味地看马克斯兄弟主演的喜剧电影的时

候，秘书走过来，请他去接汉密尔顿公爵从苏格兰打来的电话。丘吉尔是不喜欢有人在这个时候打扰他的，虽然汉密尔顿是他的好朋友，他还是请邻座的一位大臣去听电话，了解对方的需要。

汉密尔顿向丘吉尔通报：鲁道夫·赫斯到达苏格兰。

赫斯从自己驾驶的飞机上跳伞后，被英国当局抓获，他说他要见住在附近的汉密尔顿，于是便发生了前面的一段插曲。

英国政府的代表同赫斯开始了秘密会谈，会谈内容至今仍加保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会谈中，赫斯试图使英国领导人同德国签订和约，并共同对苏作战。

德国法西斯政府的领导人认为，前慕尼黑分子肯定强烈影响英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他们能够设法敦促英德两国签订和约。然而，德国领导人对慕尼黑分子的影响估计过高了，而对不愿同法西斯主义和平共处的英国人的决心，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丘吉尔的坚定立场，却估计不足。

从赫斯的言谈中了解到，他建议的和平是

以英国听命于德国为条件的。不难设想，一旦德国取得对苏胜利，这个条件还要无止境地提高。因此，英国统治集团不能够接受赫斯带来的“建议”。

赫斯在会谈中还要求丘吉尔离职，提议由愿意接受这项建议的亲法西斯的人出来组织新政府。

当丘吉尔了解到赫斯及其主人的意图时，深感德国法西斯势力对英帝国以及他本人的危险性，因此断然拒绝了赫斯的建议。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对赫斯的抵英感到焦虑不安。伦敦拒绝了赫斯的建议后，却莫名其妙地一言不发，人们对帝国政府的这种举动不理解。疑虑在世界和英国舆论界扩散开来，这毫无疑问给英国坚持抗战的形象罩上了一层阴影，此种形势对英帝国政府显然是不利的。更令人不解的是，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消这些疑虑。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世界力量的配置情况，以及英国政府在德苏战争中的切身利益，就不难看出英国政府保持沉默的原因所在了。

帝国政府试图给希特勒造成这样的印象就

是，如果希特勒进攻苏联，不会出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情况。英国的《劳工月刊》在1941年写道："这种沉默是否包含一种微妙的含义，就是暗示希特勒可以指望将来得到某种支援，从而推动他去冒险（笔者：指进攻苏联）。希特勒一旦真去冒险，则给他以最坚决的回击。是不是英国外交界的一位智囊人物想把赫斯当作飞去来器，利用反苏诱饵使希特勒上钩？希特勒过去常常这样戏弄英国统治阶级。"

希特勒既没有撤销也没有推迟进攻苏联的计划。如果希特勒无条件地坚持不两面作战的原则，那么他已经吞下去了丢给他的诱饵。

根据丘吉尔领导英国外交的一贯策略，以及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来看，向希特勒抛出诱饵的"英国外交界智囊人物"，很可能正是丘吉尔。

希特勒在30年代后期，曾不止一次地愚弄过英国领导人，内维尔·张伯伦便是典型的受害者。而这次，温斯顿·丘吉尔狡猾地愚弄了希特勒，而且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1941年6月的一个周末，丘吉尔到契克斯休息，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陪同他在棒球场

散步时，问他："您作为共产党人的死敌，在对德战争中支持苏联，是否违背原则?"丘吉尔饶有兴致地回答："一点也不违背原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同情魔王的声明。"

希特勒进攻俄国是上帝赐予丘吉尔的礼物，是丘吉尔长期以来所能得到的最好消息

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契克斯首相官邸，清晨4点钟。

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契克斯的寂静，科尔维克被从梦中惊醒，他用力晃了晃头，努力使自己头脑冷静、清楚起来，拿起了听话筒。

是伦敦的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报告：德国已向苏联进攻。

丘吉尔曾严格命令身边的工作人员，除非德国人入侵英国，切记不要在8点以前叫醒他。所以，科尔维尔只好在8点钟轻轻敲开首相卧

室的门，报告苏德已经开战。

契克斯的所有的人得知德军已经开始进攻苏联时，有一种“很难理解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希特勒进攻俄国是上帝赐予丘吉尔的礼物，是丘吉尔长期以来所能得到的最好消息。

当丘吉尔被告知希特勒已进攻苏俄时，首相先生马上松了一口气。他立即把军事内阁中的亲信——艾登、军需供应部长、比威布鲁克勋爵以及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召到身边，在小范围的会议上作出了发表一个有关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支持苏联的声明。

丘吉尔、比威布鲁克和克里普斯着手起草首相拟于晚9时通过电台宣读的声明。在起草过程中，对苏维埃国家击退法西斯侵略的能力估价却产生了分歧。直到丘吉尔开始演说前20分钟，声明文本才获得最后通过。

丘吉尔善于辞令，他不是靠浮华的词藻，而是靠逻辑性、说理性和鲜明性征服听众。在演说期间，丘吉尔总是口不离烟，那个大大的雪茄要么高高地向上翘着，要么灵活地从一个嘴角移送至另一个嘴角，而其双手则富有表现力地在空中挥舞，两眼显得炯炯有神。

温斯顿·丘吉尔对“残酷的、贪婪的法西斯制度”及其所追求的种族统治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我看到了守卫在自己国土大门和保卫自古以来他们父辈耕耘过的田园的俄国士兵……我看到了成千上万个俄罗斯村庄正蒙受可恶的纳粹军事机器的蹂躏。”

丘吉尔和他最有远见的同伴，不仅知道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威胁程度，而且也知道对英国和美国的威胁程度。

“威胁俄国的危险就是威胁我国和美国的危险。同时，每一个为保卫自己家园而战的俄罗斯人的事业恰恰也是地球上每个角落自由人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他（笔者：指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仅仅是尝试进攻英伦岛屿的前奏而已。”

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中，纳粹德国对英国具有致命的威胁。而苏联则一点也不想染指英国的利益。“我们，”丘吉尔继续说，“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对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充满信心……任何反纳粹主义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希特勒狼狈为奸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由

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将给予俄国和俄罗斯人民以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

丘吉尔以英国决心在陆上、海上和空中迎战希特勒，“使大地摆脱它的阴影”，“不惜任何力量和生命进行战斗”等话语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这个时刻，丘吉尔表现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度。他了解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了解在当时条件下，符合国家利益的最好处置方法。在英国人中，丘吉尔是最坚决最顽固地敌视苏俄者之一，但正是他决定了实现这一帝国战略方针的转折。

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英国任何其他选择都难免最终遭到失败。

著名的工党评论家迈克尔·富特断言：“1941年6月22日以前，英国的胜利是梦想，而在这一天之后，英国的胜利已在预计之中。”

美国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写道：“德俄开战给了英国人一线希望……西方的国务活动家认为，整个战争的命运将取决于俄国抵抗德国侵略的准备情况和实力。”

温斯顿·丘吉尔在英伦岛屿最困难的时刻

执掌帝国大权，他表现出的同英国人民一致的战斗决心，坚定作战的气概，从不动摇的勇气，为当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所称赞。如果丘吉尔当时不是采取这样坚定的立场，那么英国的慕尼黑分子很可能就会在法西斯强敌面前屈膝投降，并同法西斯分子勾结在一起。丘吉尔政府行使权利之后，为适应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采取坚决措施，把国内经济和整个生活引上战时轨道。

丘吉尔比英国其他政治家更早更清楚地懂得，同苏联和美国建立军事同盟是拯救英国的保障，所以他在1941年6月决定同苏联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丘吉尔政府认为，要战胜法西斯德国，必须保持同苏联的同盟关系，1942年5月28日，英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同盟条约。

英国预料，苏联参战后会在俄国的土地上严重削弱德国的军事力量，但是英国人没有料到苏联能彻底战胜德国，因此准备向苏联提供实际援助。

1941年7月12日，英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对德战争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协定规定，在对德作战中彼此给予一切形式的援助和支持，

双方既不同德国谈判，也不同它单独媾和或签订和约。

英苏同盟关系已逐步走上正轨。

但是，丘吉尔并不总是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例如，在讨论签订7月12日协定的时候，丘吉尔提议，协定中应当包括如果苏联取胜，应当在战后的和会上审查苏联边界的条款。丘吉尔的本意是想夺走1939年至1940年加入苏联版图的领土。当时的英国战时内阁不支持这种意见，可是丘吉尔竟然把它提了出来，的确值得回味。

苏联参战，根本改变了世界局势，商讨新的形势下共同的行动方针，成为摆在英、美两国首脑面前的当务之急。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首次私人会晤，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附近阿根夏港停泊的“威尔士亲王号”战舰上举行。根据丘吉尔的统计，在战争年代他同罗斯福总统之间各种形式的会晤多达120天，这种情况在现代历史上是极罕见的。

在1941年8月的会晤中，丘吉尔强调指出：“当莫斯科陷落……德国人一进入外高加索

的时候……俄国人的抵抗就会停止。”

英国总参谋部也持这样的观点，它估计苏联的抵抗期限是3—4周。军事专家在作战部和情报部联合举行的各种会议及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们并没有把“俄罗斯即将失败”这一特殊机密当作一回事。

美国人所持的观点距离自己的英国同行并不远。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参谋部军事计划处的工作人员认为：“德国全面完成粉碎俄国的任务至少需要1个月，至多可能是3个月。”

伦敦和华盛顿的首脑在这次会晤中，作出了援助苏联的决定，计划向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原则决定，实施这项决定还要取决于苏德前线的战斗进展情况。

丘吉尔与罗斯福共同拟定了“大西洋宪章”，宪章声明：英美两国在战胜德国及其附庸国之后，致力于建立公正和民主的世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并非两国政府的真实愿望，仅仅是为了使各国人民支持战争而进行的一种宣传。

两位政治家从总的方面讨论了他们在战后

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他们一致的意见是，战争结束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解除武装，唯独英美两国必须保持自己的武装并主持战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调节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也必须解除武装并听命于不列颠和美利坚，这样一来，他们确定的斗争方针就是要在战后建立英美的世界霸权。这些方针是在苏联已经肩负起抗德战争的重担而美国尚未参战的情况下，由英美两国领导人筹划的。

在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会晤期间，暴露了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的尖锐矛盾，丘吉尔坚决反对美国进入英帝国的经济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任何企图。

在会谈期间，美国的观点占明显的优势，这反映了英美集团的力量对比。两国政治家在这些方面彼此互有戒心。

苏德战争伊始，伦敦和华盛顿并不相信苏联能作长期抵抗，分歧只在于苏联能坚持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上。英国首相本人不止一次地声言苏联濒临毁灭。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恰好在伦敦，丘吉尔曾秘

密地告诉他说，如果俄国能坚持上6周，那将是一个奇迹。

在苏德战争最初的几个月中，丘吉尔和英国的将领以及美国的许多军事领导人违背自己所做的声明，认为英国和美国运往苏联的装备必将落入法西斯之手，“援助苏维埃只会导致战争的延长，而不能挽回它的败局”。

当红军和苏联人民以自己的英勇抵抗不仅粉碎了“闪电战”计划，而且推翻了伦敦和华盛顿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预言时，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援助加强了。在他们的军事战略中随之出现了一种新观点，其中就有“两阶段战争”的战略构想。

伦敦和华盛顿的政治家、战略家把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之间的歼灭战视为欧洲战争的“第一阶段”。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承认，大英帝国所追求的是“使纳粹分子和俄国人互相残杀，直到英国积蓄起力量。”美国领导人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如果说官方地位使温斯顿·丘吉尔审慎从事的话，那么他的儿子伦道夫则不然。他声称：“东方战争最理想的结局是，最后一个德国人打

死最后一个俄国人并且死在一块。”

苏德战争“第一阶段”是苏联最为艰难的时期。这时，伦敦和华盛顿的战略家们蓄意躲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另一边，静观苏联与德国怎样彼此削弱。丘吉尔一边坚持自己的构想，一边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德国人给红军造成的损失越大，对英国就将越有利。”

丘吉尔不相信苏联能够在对德武装斗争中坚持下来，所以他希望美国尽快参加。

在远东，美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军阀利用欧洲战争的时机侵略亚洲和太平洋，这里孕育着日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丘吉尔懂得，两个强国间的利害冲突必将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冲突。日本已同德国结盟，日美冲突终将导致德国和美国开战。因此，丘吉尔尽一切可能怂恿美国政府对日本“表现强硬”。

没有温斯顿·丘吉尔的努力，远东战争也会照样爆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灾难。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天，7 时 55 分，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对集结在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美国舰队进行了密集突击。当时清晨，

海湾内停泊着太平洋舰一半以上的各级舰艇。共94艘。日本飞机象进行演习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轰炸。8艘战列舰有3艘被击沉，5艘遭重创。美国共损失战舰19艘。被炸毁在机场上的美国飞机272架。2400多名军人丧生。当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控制的其他一些地区：关岛、威克岛和中途岛。

1941年12月8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为了回答德、意的宣战，美国国会通过了向这些国家宣战的决定。

美国在珍珠港的失败使海上力量对比暂时变得有利于日本，并为日本扩大对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侵略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军队很快占领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共有15000万人口的地区。

英国和美国推行鼓励日本侵苏的政策，不准备保护自己的领地，在很大程度上给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取胜创造了条件。伦敦向莫斯科的飞去来器回过头来指向了美英两国在东南亚的领地。

然而，当丘吉尔在星期天晚上同美国大使

怀南特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契尔斯从广播中听到日本进攻夏威夷的消息时，却感到“分外高兴”。

罗斯福打电话给丘吉尔，十分震惊地声称：“日本人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了。现在我们大家都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了。”

总统心里明白：日本的进攻必将大大改变英美两国的战略计划。

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苏联的决定性援助，要战胜德国和日本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参战使丘吉尔洋洋自得，有了苏联和美国这两个盟友，英国得救了，从现在开始，英国已经有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实际保障。

丘吉尔政府在有了强大盟友之后，决定英国军队主要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为自己的帝国利益进行殖民战争，而在欧洲大陆消灭德军主力的任务完全由苏联承担。

希腊记者I·杰列比在《丘吉尔的秘密》一书中写道：“丘吉尔希望苏联在战争中流血牺牲，希望在胜利时苏联已完全精疲力尽，无法在欧洲和世界起首要作用。”红军经过战争初期的

短暂失利之后，已经成为决定同盟国能否取胜的重要因素。这时，丘吉尔企图通过战争削弱苏联的想法更加强烈。

战争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的，苏联单独承担对德作战的重担，他们希望形成钳形攻势夹击敌人。为了援助俄国人，本应在开辟东线战场的同时重新开辟西线战场。斯大林焦急不安地紧急呼吁开辟西线第二战场，可是丘吉尔却始终支吾搪塞。他希望俄国人孤立地同德国人斗。这样，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鹬""蚌"都将财尽力竭，英国便可以当"渔翁"了。

按照丘吉尔的意图，英国应当主要在外围作战，用局部性的打击、海上封锁、空袭工业枢纽和居民点等办法削弱敌人的实力，尽力避免在西欧同德国主力激战。

"尽可能借他人之手进行战争"是英帝国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都是利用殖民地国家的居民组织起来的军队去攫取新的殖民地并奴役那里的人民。在欧洲，英国凭借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对敌斗争的欧洲国家联盟，而主要承担斗争重担的步兵总是由参加联盟的其

他欧洲国家提供。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较大，丘吉尔和英国其他政治家引以为戒，决心在这次反轴心国的战争中把主要战争重担加在同盟国的肩上。但需客观指出的是，英国的空军和海军在战争中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苏联的盟友们打算在战争第二阶段，也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国家和法西斯德国时期采取果断行动，以便在胜利之时迫使双方接受自己的媾和条件。而他们精心炮制和实际推行的能反映英国和美国政治方针的军事战略只是一些“小战役”和“非直接”针对法西斯德国的行动。

在丘吉尔的外交政策中，尤其在苏联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明显地表现出两种方针。一种是官方的方针——公开发表有关必须“彻底击溃法西斯”的宣言和声明，对“英勇的俄国军队”深表赞赏。另一种是秘密的方针——借法西斯德国之手削弱苏联，然后对德国实施决定性打击，将它作为英国和美国的对手消灭掉。

在开战后的头几个星期，苏联政府就不得不一再敦促伦敦履行对盟国的义务，要求伦敦

根据1941年6月22日广播讲话和7月12日协定的许诺，向苏联提供支援。最主要的支援就是，英国军队在欧洲大陆参加对德作战。

一切情况表明，英美应当在西线开辟反击德国的第二战场。纳粹头子希特勒十分害怕第二战场，而开辟第二战场必将大大缩短战争进程并减少牺牲。

然而，西方大国的上述策略在盟国关系上制造了严重的困难，妨碍了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正是这种策略延宕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丘吉尔提出以“尤里卡”作为行动代号，以暗号“开罗—3”代表德黑兰

1942年底～1943年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取得的伟大胜利迫使英、美领导人对之刮目相看。这些胜利是以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并且使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它也是苏联人民及其英勇的军队在英、美统治集团违背同盟国义务的条件下取得的。

1943年底以前，反法西斯联盟的三个主要

国家英、美、苏的领导人连一次会晤都没有举行过。1943年1月～8月，丘吉尔与罗斯福有过会晤，但斯大林没有到场。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英、美、苏三强缺乏统一的同盟战略；斯大林忙于战事无法脱身；英、美首脑想要在没有苏联人参加的情况下解决一些与苏联非常密切相关的国际事务和军事问题。

红军的胜利迫使英、美政府重新考虑自己战略战术的某些观点。罗斯福于1943年秋对儿子说："要知道，假如在俄国的战役进程照现在这样下去，那么可能到明年春天第二战场也就不需要了。"

丘吉尔所关切的不仅是歼灭德国这一竞争对手，而且似乎还关切不致因为歼灭德国而引发欧洲各国走红色俄国的路。

三大巨头——英、美、苏三国首脑的会晤，主要源于丘吉尔和罗斯福。

1943年8月7日，丘吉尔首相致函斯大林，建议在英国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筹办三方会晤。

同年7月，罗斯福曾建议斯大林筹组双边会晤。

斯大林把自己要“将两国代表会议……变成三国代表会议”的想法告诉了罗斯福。他建议将会晤地点定在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对丘吉尔也作了类似的答复。

1943年8月19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致函斯大林：“我们再次希望您注意到我们三方会晤的重要性，同时我们完全理解迫使您亲临前线的那些重要原因。”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选择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市作为三巨头会晤的地点是适宜的。

苏联政府首脑在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回信中，对他们有关三巨头会晤重要性的意见表示了支持，但以“军务紧急”为由，对他们提出的会议地点表示异议，并认为三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代表应在最近会晤，应尽早确定交由三国代表讨论的各类问题的范畴。

三巨头最后商定：会期定为11月至12月间，会晤地点指定在三国都设有代表处的国家——伊朗。

10月19～30日，英、美、苏三国外长A·艾登、K·赫尔、B·M·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会晤。会议的

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三大国军事合作课题以及应采取何种措施，“以缩短反对德国和其欧洲附庸国的战争期限”。

莫斯科会议成为德黑兰会议的序曲。

丘吉尔非常喜欢玩弄华丽的词藻，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总是给各种会议和战役冠以名目繁多的代号。

9月底，他在给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反复考虑过我们定于德黑兰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丘吉尔提出了要用古希腊“尤里卡”一词（即“我发现了”）作为这一行动的代号，而以暗号“开罗——3”代替“德黑兰”。

很显然，丘吉尔把自己与发现液体静力学最重要定律的科坛泰斗阿基米德相提并论。

其实，他想在德黑兰从事的不是“开辟”而是“关闭”第二战场。

为了保卫与会代表和其他参加者，丘吉尔建议把英国和俄国的一些部队调往德黑兰，同时还提出了有关行动的伪装细节。

斯大林在复信中表示，除了向“开罗——3”地区亦即德黑兰调动英国和俄国部队外，对来往书信中提到的所有暗号、名称，对一切佯动

手段均表示同意。斯大林还建议对庞大的内部警卫人员应予限制。

罗斯福此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会晤地点应在开罗或前意大利殖民地厄利特里亚首府阿斯马拉为妥，时间应为 11 月 20 日～25 日。

斯大林同意会晤日期的安排，但为了能通过电话和电报继续指挥红军的军事战役，他坚持会议应在德黑兰召开。

罗斯福作了让步，同意在德黑兰举行会晤，他打算 11 月 25 日抵达德黑兰，同时把会期限定在 11 月 27—30 日。

斯大林接受了这种安排。

丘吉尔表示准备“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出席会晤。

丘吉尔曾建议邀请蒋介石来德黑兰，但斯大林坚持只能在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会晤。

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就召开三大国领导人会议的地点和日期进行热烈争论的时候，丘吉尔首相又在酝酿与罗斯福总统单独会晤的计划，他建议罗斯福安排一次英国和美

国的军事参谋部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尔后再与他们的会议相结合，待通过相应的决议后一起前往德黑兰。

当罗斯福建议邀请苏联代表参加英美参谋部领导人会议时，却惊动了丘吉尔。他断然反对这种想法，他的理由是，邀请俄国的军事代表出席英、美参谋部会议会耽误工作，同时，丘吉尔还提出了另一充分论据——德国军人不懂英语！

诚然，问题不在于苏联的校官和将军不懂英语（合适的人选可以找到几十名）。实际上，丘吉尔想背着盟国继续玩弄单独行动的把戏。丘吉尔知道，苏联代表会妨碍英国的陆海军将领实现他进一步拖延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

为了装点门面，丘吉尔同意了在德黑兰会晤前邀请苏联军事代表前往开罗，暗地里却真心希望苏联代表不能成行。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因为会上有国民党中国的代表蒋介石出席，苏方放弃了参加开罗会议。

丘吉尔乘坐的"里纳温"号军舰，从直布罗陀高耸的悬崖峭壁旁通过后，穿越地中海蔚蓝

色的宁静海面，于1944年11月21日清晨在亚历山大港抛锚。再经过短暂的飞行后，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其中包括他的女儿莎拉·奥利弗（后来成了他的副官）很快就在距开罗几公里远的英国驻埃及大使的官邸安顿下来。而在离它不远的别墅里已经住着蒋介石及其夫人。

从英国已经解密的一些文件中获悉，英国政府曾周密策划德黑兰会议，先行制定出与美国串通的计划，以迫使苏联代表团接受丘吉尔的地中海—巴尔干战略、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有关的纲领。

在德黑兰会议开幕前10天，丘吉尔给国防部参谋长伊斯梅将军下达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为与“焦大叔”（即斯大林）的谈判，也就是三大国军事代表会议，准备好议事日程。

伊斯梅将军准备的议事日程草案希望红军部队在苏德战场发起新的进攻，甚至连有关于土耳其参加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问题，也在德黑兰讨论中提了出来。

温斯顿·丘吉尔继续充实自己万变不离其宗的巴尔干战略计划。他认为：“应作出新的努力以建立对亚得西亚的控制。为此，必须着手巴

尔干战役。”丘吉尔战略罗盘的指针，始终对准着巴尔干。

同时，丘吉尔在1943年11月20日致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力图修改在魁北克通过的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议。他在备忘录中写道：“‘霸王’（是诺曼底登陆行动的代号）战役的阴影已降临在我们头上……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定‘霸王’战役的目的和日期，因它势必会妨碍在地中海的战役计划的执行。”

按照丘吉尔的布置，隶属海军部的战役计划处应向他提出一份报告。该报告为延缓“霸王”战役部署罗织出了如气候恶劣等理由。

英国驻开罗大使同样就德黑兰的议事日程问题向丘吉尔呈送了一封便函，其中提出要求予以审查的问题有：关于采取向伊纳努总统施加压力的办法使土耳其参战；关于欧洲协商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关于波兰问题及其未来边界等。

英国外交部长艾登在大使的送审件上，做了如下的批示：“我同意所列各点。”

总之，早在与美国代表团举行开罗会晤前，

英国的政治家们就准备把自己对同盟关系中最重大问题的观点强加给德黑兰会晤。

当蒋介石试图要讨论这个问题时，丘吉尔不留情面地打断了他的发言

1943 年 11 月 22 日～26 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开罗举行会晤，这是德黑兰会议前，英、美政界和军界阵容的大阅兵。

丘吉尔认为，蒋介石当时“严重地干扰了英、美两参谋部的洽谈”，并企图把“中国问题”提到谈判的首位。

于是，温斯顿·丘吉尔便努力说服这位中国官方的最高统帅及其夫人多看看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其他埃及的名胜古迹。

然而，蒋先生的这次的表现却一反常态，给人以做事十分认真，甚至到了古板程度的感觉，蒋介石对远东问题的讨论非常热心。但办事利落的蒋夫人常开玩笑说，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不是他，而是她。看来，他们夫妇都想在大型的政治三重奏中拉首席提琴。

10 月 23 日，开罗会议第一次全会在总统别

墅开幕，与会者有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及其部分随行人员。

根据罗斯福的指示，蒙巴顿上将把英美首脑在魁北克拟定的东南亚战役计划有关在缅甸的军事行动过程告诉了蒋介石，当蒋介石试图要讨论这个问题时，丘吉尔不留情面地打断了他的发言。

在第二天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特意避开蒋介石代表团，讨论关于英、美军队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军事行动问题以及“霸王”计划。

尽管魁北克会议作出决定要在1944年5月开辟第二战场，但丘吉尔却再次为自己所热衷的巴尔干方案辩护。他把实施“霸王”战役中的困难描绘成一幅阴暗的画面，并且声称，英国为此目的最多可派遣16个师的兵力。丘吉尔提出“霸王”战役的实施应根据地中海战役的具体状况而定，即是说，他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巴尔干战略方案。

11月26日，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并拟定了最后宣言。英、美、中三国通过的宣言内容：

“三大盟国进行的这场战争旨在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其目的是为了夺回日本在战争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占据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从中国人那里抢占的领土，诸如满洲里、福摩萨（笔者：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华民国。”

当时英、美、中三国首脑决定，在三巨头德黑兰会晤结束前及苏联同意文件之前，不公布这个宣言。

开罗会议后，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前往德黑兰。

在厄尔布尔士南麓几乎不长林木的高地上，有一座著名的东方古城，这就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这是座兼有欧、亚两种风格的城市。城市的北部，特似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有笔直的街道，街道两旁有缀满果实的栗子树和蓊蓊郁郁的法国梧桐，沿街建有欧式的房子、贵族宫殿和外国使馆。城市的南部较具亚洲色彩，街道弯曲、污秽、尘土滚滚，一排排矮小的房子掩没在高高的泥墙后面，它们都因年久失修而斑剥脱落。在许多大大小小能勉强透进一点光线的私人店铺里，充斥着招徕顾客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在手工作坊里，银匠铜匠的小锤子发出的疯

狂的敲打声不绝于耳。在这里间或地还可以看到塔尖高耸云天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东方式浴室和商队客栈。

德黑兰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从里海到波斯湾的铁路刚好经过德黑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武器、装备和粮食就从波斯湾沿这条铁路和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勇抗击纳粹的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刚刚开始之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已把伊朗变为反对苏联和英国的敌对活动的前哨阵地。德国向近东和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派遣了大量的密探、“教官”，其数量在1941年8月就已达4000人。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均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活动，事实上在伊朗建立起了“第五纵队”。

在伊朗政府机关担任“顾问”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及盖世太保的密探，他们力图把伊朗拉入反苏战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在该国拥有秘密的沙漠机场、武器弹药库，并且组织和训练派往苏联破坏的行动组。

尽管伊朗认真地肃清法西斯奸细，但在东方，由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领导的卡纳

利斯和舍伦贝格的秘密组织、秘密警察 以及里宾特里甫机场中的间谍却潜伏得很深，他们继续进行着破坏活动。

在伊朗的德国间谍的中心任务是，破坏从波斯湾通往苏联边境的交通线。这是英、美两国向苏联红军提供武器弹药的通道。德国的间谍们屡次炸毁外伊朗铁路大动脉上的桥梁、隧道和轨道。

在德黑兰会议前夕，法西斯情报机关就获悉了有关三巨头会晤的筹备情况。后来才查明问题出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休杰森身上，他手下的一个仆人原来是法西斯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

德国纳粹情报机关制订了一个密码代号为“远跳”的绝密计划，预谋 刺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妄图以此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实施这一计划的任务交给了曾谋害奥地利前首相陶尔弗斯的凶手、党卫队突击队长奥托·施考尔采尼，他是一位深受希特勒赏识的人。

富有传奇色彩的苏联军事侦察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以德军中尉保罗·齐贝特的证件为

掩护，打入了纳粹的情报网，并受领了“消灭三巨头”的任务。

莫斯科接到库兹涅佐夫的情报后，紧急采取了保障三巨头安全的一切必要的补充措施，从而使纳碎的“远跳”计划遭到破产。

丘吉尔按照自己的路线从开罗前往德黑兰，在德黑兰，他受到了盛大仪式的欢迎，在他途经的道路两旁，每隔40～50米就派有一些伊朗的骑兵巡逻队，而警车急驰高叫着在前面开道。

丘吉尔在英国公使馆大楼下榻。该大楼几乎与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地域毗邻。使馆的围墙外面栽满了百年栗树，使馆附近还有一个满是浓郁垂柳的绿荫如盖的宽阔的公园，园中树木的绿叶，犹如在平滑如镜的水池和快速流动的沟渠中沐浴一般。

在印度旅和苏联安全部队的警卫下，与会者们身处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安全区”内。

1943年11月28日，星期天，下午4时，德黑兰会议第一次全会开幕。

在富有帝国风格的大厅里，在盖有奶油色呢绒的圆桌旁，自苏联卫国战争进行两年半以

来，以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大盟国的领导人N·B·斯大林、F·D·罗斯福和W·丘吉尔首次相聚。

在英国代表团的组成成员中有：外交部长A·艾登、皇家总参谋长A·布鲁克上将、驻苏联大使A·凯尔、D·迪尔元帅、海军一级上将E·肯宁格海姆勋爵、英国空军参谋长C·波特尔空军上将、国防部参谋长H·伊斯麦将军。

英国古老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世袭贵族、终生反共的温斯顿·丘吉尔，终于和职业革命家斯大林和最终成为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卫士、贵族出身的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共同坐在了德黑兰的一张圆桌旁。

罗斯福被选为大会主席，他在开幕式上致词：

“我想使新家庭的各位成员——围坐在这张桌子旁的本次会议的参加者相信，我们大家是为着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的。这一目的就是要尽快地赢得战争……”

罗斯福还提议讨论诸如战后体制等其他问题。

丘吉尔在罗斯福之后起而发言，他滔滔不

绝地大谈特谈本次会晤的意义：

“这次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世界各种力量最伟大的聚合，有关缩短战争期限，有关赢得胜利，有关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都将由我们决定……”

如果丘吉尔真正担心人类的命运，那么英、美军队就应竭尽一切可能，以便及时地开辟第二战场，拯救千万人的生命。但实际上，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丘吉尔及其政府千方百计地把战争重担和最大牺牲都加在苏联的肩上，与此同时，反希特勒同盟的参加国加紧研究战后和谈的原则，想利用和谈的原则事先捆住苏联的手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丘吉尔首相从战势的进程中已经意识到，苏联经过战争之后，不会象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所预料的那样被击败或被削弱，苏联在战后将成为一个强国。事态的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后期的战争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丘吉尔认为，强大的苏联必定要消灭法西斯主义，随后很可能会在欧洲和世界各国出现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必

将大大加强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胜利了的苏联将把许多欧洲国家从法西斯的魔掌下解救出来，这一事实将进一步刺激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丘吉尔对此，比任何其他的人更感不安。

在斯大林格勒尚未击溃德军之前的1942年10月，丘吉尔曾起草一份备忘录，分送给英国战时内阁的阁员。该备忘录：

“我的全部思想主要集中于欧洲这个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如果俄国的野蛮行径一旦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将是非常可怕的灾难。”

丘吉尔在当时以及战争后期，一再致函苏联政府，表示他对苏军胜利的喜悦和对苏联战绩的赞赏。显然，这些都是礼节性的虚伪表示。1942年10月致战时内阁的秘密备忘录，才是他真实感情和真实想法的披露：

“我相信，欧洲各国大家庭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在欧洲会议的领导下组成统一阵线。我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我希望欧洲会议可以有10余名会员，包括从前的各个大国，包括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

西班牙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土耳其人。”

由于这里所说的是以前的大国，这就意味着丘吉尔已把德国和意大利包括在这个反苏集团内了。他没有把法国列入大国的行列，把它同荷兰和土耳其排在一起。英国战后“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具有鲜明的反苏特征，而这一政策是丘吉尔在1942年底，也就是在反希特勒同盟国粉碎法西斯国家集团之前很早就已经确定了。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丘吉尔首相在德黑兰会晤上的讲话，不过是一个个华丽词藻而已。

“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1943年夏，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战役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转折已经基本确定，苏联红军从本国领土上赶走了侵略者之后，立即向西挺进，准备解放欧洲各国。

这种情况使得第二战场问题出现了另外一

种局面。

随着苏军的西进，伦敦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逐渐认识到，必须赶紧开辟第二战场，这种紧迫感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苏联盟友，莫如说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军队在红军解放西欧之前赶到那里。

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所讨论的最重大的问题是继续进行战争的问题，其中首先是有关战场的问题。

在会上，丘吉尔继续坚持自己的“地中海—巴尔干战略”，极力设法通过有关英美部队进攻巴尔干和东地中海的计划，甚至对这样做将使“霸王”战役推迟2～3个月也在所不惜。

在强渡英吉利海峡开始之前，丘吉尔就意大利战线方面实施夺取罗马的战役进行游说。他建议从部署在地中海地区的22～23个师中仅抽出“足够数量”的部队用以攻打法国，而“留下的师将驻守意大利战线”。

显而易见，丘吉尔的意图不是从西面，而是从南面或东面进攻德国，而且使盟国在巴尔干地区或地中海东部实施主要战役。这样，即使“霸王”战役不归于夭折，也不可避免地会延期

执行。众所周知，这些战役都不能替代在法国的第二战场。它们与其说是追求军事的，不如说是政治目的。

苏联代表团不容许将“霸王”战役拖延到1944年的7～8月份，因为这等于破坏了该战役，因而坚持把5月份定为实施该战役的最后期限。

丘吉尔首相对此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他显得颇为急躁地说：“我们不能保证，5月1日这一日期将得到准确无误地遵守。这一日期的确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够牺牲地中海战役……”

英国代表团不愿说出开辟第二战场的确切日期，这迫使苏联代表团向英国人提出问题——“你们是真相信‘霸王’战役，还是为安慰俄国人只是说说而已。”

丘吉尔仍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1943年底，反希特勒同盟国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英国的重大变化。苏联在抗击希特勒德国及其附庸国的斗争中，成功地发挥了其有力的作用，因此它在决定战后世界命运中的作用也随之加强。美国发展了本国的武装

力量和军火工业，从而使它在同盟国当中的影响增大了。而英国的影响则相对下降。英帝国的大政治家南非联邦总理史末兹在1943年底对英国领导人说：“战后将出现两个巨人，一个是欧洲的俄国，另一个是北美。”

丘吉尔怀着痛苦的激愤的心情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再说，他在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他描绘说：

“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然而，在这三者当中唯有小毛驴能够认准归途。”

但是，随着战争日益接近尾声，丘吉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不得不更多地听取其他盟国的意见，并尊重其要求。

当苏联代表团团长与丘吉尔在11月30日举行的一次会前会晤时，斯大林又提出了何时进行“霸王”战役的问题。他同时指出：“这一战役如果不在5月份进行，那么它从总体上就名存实亡了。因为数月以后天气将转坏，登陆部队也就得不到应有的补给。”

尔后，斯大林又声明说，当盟军在法国北部实施登陆时，红军就将进入进攻，并且准备“不是一次，而是数次实施对敌突击”。这一声明动摇了丘吉尔继续拖延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决定的基础，尽管他回避对此作出具体的回答。

由于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结束欧洲战争后对日宣战，罗斯福支持“霸王”战役的立场得到巩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他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作出符合实际的决定，这一决定也是他的军事顾问向他提出的。

现在，丘吉尔开始充当了一位协调盟军作战，“以便同时从两个方向对敌人实施打击”的热情拥护者。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有关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影响美国政府立场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占领西欧太晚了。罗斯福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使整个德国，以及丹麦、荷兰、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不为红军解放。他认为，把军事行动的重点转向巴尔干可能对“霸王”战役产生消极的影响，并使之受到威胁。因此，他像在开罗会议时一样，又一次没有苟同丘吉尔的“巴尔干方案”。加上苏联代表团的极力反对，英国首相的计划

遭到了否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盟国关系上，有关苏、英、美三国军队的协同行动与作战，首次在德黑兰取得一致。用以进攻法国的军队数量应为35个师，其中英国占16个师，美国占19个师。紧随其后的是一支有强大海、空军支援，人数约100万人的主力部队。

根据丘吉尔的建议，盟军司令部参与了“霸王”战役的伪装演练。丘吉尔指出：“在战时，真情必须伪装，才有价值。”

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公布的三大国宣言中，苏联、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曾声称：我们彼此协调了我们消灭德国军队的计划，我们一致同意有关从东部、西部和南部将要实施的战役规模和期限。

各盟国领导人强烈声明：“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我们从陆上歼灭德国军队，在海上消灭他们的舰艇，从空中毁灭他们的军工厂。

我们的进攻将毫不留情和愈加猛烈。”

德黑兰会议最后决定，英美军队于1944年5月进入西欧。

三巨头在德黑兰的会晤中，不仅要解决军

事问题，而且也有政治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涉及德国未来的问题。

1943年12月1日举行的闭幕会上，罗斯福介绍了他拟定的一个计划——将德国肢解为5个自治国家：普鲁士（版图要缩小）；汉诺威及西北地区；萨克森及莱比锡地区；黑森省、达姆施塔特、卡塞尔和莱茵河以南地区；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基尔运河和汉堡。而鲁尔河和萨尔河两地区都应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罗斯福就这样建议把德国分为5个国家和2块由联合国托管的领土。

丘吉尔则提出一个计划，将德国一分为三：普鲁士、南德国（包括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巴拉蒂纳特即莱茵法尔茨）和鲁尔区。丘吉尔认为，普鲁士可以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而南德国则可归入某个“多瑙河联盟”，亦即重建一个类似的奥匈帝国。

苏联代表团反对肢解德国，反对把它纳入某个联盟之中。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1942年2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指出：“把希特勒集团与德国人民、与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可笑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德国人

民和德意志国家却是永存的。”

在德黑兰会议上，各方还就波兰未来及边界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斯大林在谈及波兰未来和它与苏联的关系时，指出：“俄国比其他大国更关心发展与波兰的良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俄国的邻邦。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恢复波兰、加强波兰而斗争。”

丘吉尔谈论波兰时，犹如“欧洲乐队弹奏乐曲那样动听”。他说英国希望“有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强大而独立的波兰存在”。丘吉尔想在波兰提琴上奏出自己的旋律。英、美统治集团力图在已有条件下使波兰的战后发展沿着旧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老路走下去。但这些都被自然掩饰起来。

丘吉尔在阐述自己有关波兰未来边界的主张时，用了三根火柴来表示，其中一根代表德国，另一根代表波兰，而第三根代表苏联。

丘吉尔看来，为了“保障苏联西部边界的安全”，所有这三根火柴都应当向西前进。其诚意如何，只能猜测了。

丘吉尔带来了一个有关波兰问题的提案。提案声称：

“原则上同意波兰国家和民族的发祥地应位于所谓寇松线与奥得海一线之间，其中还包括组成波兰版图的东普鲁士和奥佩尔省。”

1943 年 11 月 29 日，为纪念三巨头的德黑兰之晤，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它象征着英国、美国和苏联人民在与共同敌人作斗争中的坚强统一。

英国、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团成员，以及各位将军、外交官都出席了在苏联使馆会议大厅举行的仪式。

为参加这一富于历史意义的仪式，丘吉尔首相特意带来了一把宝剑，他要代表乔治六世国王和英国人民，将这把荣誉宝剑授予斯大林格勒的居民。这是对伏尔加要塞保卫者们以英勇的斗争和不朽的功勋，彻底埋葬德军不可战胜神话的赞美。

大约 3 点半钟左右，三大国领导人步入大厅。斯大林着大元帅服，丘吉尔穿一身英国空军最高长官的礼服，而罗斯福只着便装。

乐队奏起了苏联和英国国歌。

丘吉尔拿过装在剑鞘里的宝剑，轻轻地悬空握在手中，然后转向苏联国家元首说：“这把

荣誉宝剑是由许多英国的能工巧匠制造的，现在由我转赠给斯大林格勒的公民。”

在这把宝剑的利刃上，镌刻着以下这些字样：

“赠给斯大林格勒公民——具有钢铁意志的人们

——乔治六世国王及英国国民”

斯大林接过宝剑并把它从剑鞘内抽出后答致词说：

“我以斯大林格勒公民的名义，对乔治六世国王的赠礼表示我的深切谢意。斯大林格勒的公民将高度评价这一礼物。”

然后，斯大林把宝剑递给罗斯福看，罗斯福总统轻声说：“的确，斯大林格勒的公民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宝剑带着响声放回了剑鞘。在红军自动枪手组成的仪仗队的护送下，伏罗希洛夫元帅把这把宝剑放到了隔壁房间（这把宝剑现存于伏尔加格勒国立国防博物馆）。然后，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与各位部长、陆海空军将领在使馆凉台上合影留念。

11 月 30 日晚，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英国

公使馆庆祝自己60岁寿辰。席间，三大国首脑为各盟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强有力的联系频频举杯。

丘吉尔提议："为在德黑兰取得的国际事务方面的巨大进步干杯！"

在12月1日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通过了三大国宣言。

该宣言声称：

"我们表明我们的决心是：无论是战时还是随后的和平时期，我们各国都将协调工作……我们在此间达成的互相谅解，将是我们获得胜利的保证。

至于和平时期，我们都坚信在我们之间业已存在的一致意见，必将保障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认识到了我们的崇高责任，就是实现得到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民大众赞同并将消除历代战争苦难与灾祸的和平……

我们满怀着希望和信心抵达此处，我们也会作为志同道合的真正朋友告别这里。"

三个伟大的国家——苏联、美国和英国，在战胜纳粹势力和巩固反法西斯联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三大国的战斗合作，获得了

发展与巩固。

在反法西斯联盟的历史上，盟国与法西斯列强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首次在德黑兰达成了一致，有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后决议也获得通过。

丘吉尔指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未来的许多方面，都将取决于三大国首脑之间的友谊以及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艾登在英国议院发言时说："德黑兰会议的首要成果是战争期限的缩短。"

丘吉尔首相在警卫严密的保护下来到机场，2名身材高大的中士把总统让进"维利斯牌"（一种苏联制造的轿车）轿车，4名警卫人员神气活现地拔出自动枪跳上在前面快速开动的一辆卡车的跳板。丘吉尔举起右手，用两根手指构成英文"V"字——意即"胜利"。首相的座机朝开罗飞去，不消一会儿，消失在云海中，

12月4日～7日，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第二次英美会议在开罗举行。

事实上，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在开罗又一次试图修改已经商定的在欧洲进行战争的计划，拖延"霸王"战役，并且把精力集中用于

“巴尔干战略计划”。

丘吉尔首相在会上大谈“霸王”战役当前面临的巨大困难，描绘了“大规模最残酷战役”的阴暗图景。他再次坚持有关在实现“霸王”战役的同时，采取向巴尔干大规模的登陆行动以夺取罗得岛的构想。他把夺取该岛与土耳其参加相联系，并且这已成为丘吉尔“巴尔干战略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首相声称：“霸王”战役应当不在德黑兰会议规定的5月开始实施，而应当在7月，以便加强“铁砧”战役。为了更顺利地实现巴尔干—地中海战略计划以及为此腾出大量的登陆船只，丘吉尔和他的司令部都建议美国人放弃“海盗”计划——在缅甸的军事行动，其目标是夺取该国的沿岸地区和安达曼群岛。

在丘吉尔的战略中，政治观点占主要地位。他顽固地反对在西欧打击德国的战略设想，始终坚持通过巴尔干从南面打击敌人的战略计划。据说，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打击敌人。也有人说，他想对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任海军大臣，曾指挥英国海军攻击在德军支

持下的土耳其军队，因战役计划不当，导致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惨败）进行报复。然而，从总的方面说，这些动机在丘吉尔的战略思想中只是起了某种作用。

丘吉尔使英美军队进入巴尔干的目的是，他们以后可以用强大的兵力向北猛冲，占领东南欧和中欧地区，并阻挡苏联红军西进。英军军队进入巴尔干，可以保证这些地区的国家恢复反动秩序，同时也加强了英国的影响。

丘吉尔在给外交大臣的备忘录中写道：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容忍巴尔干共产化，或者还有意大利共产化？……我们的结论是，必须阻止共产党的渗透和入侵。”

丘吉尔曾向指挥欧洲英美联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施加压力，迫使美国人同意巴尔干战略。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英国首相的出发点是，对于建立战后的持久和平来说，西方盟国在巴尔干有强大兵力，比俄国军队占领这个地区更加有利。”

丘吉尔的意图是让在意大利的英美军队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卢布尔雅那通道进入中欧。他坚决主张，由西方盟国而不是由俄国人解放并

占领某些国家的首都，如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华沙等，这样会有很大好处，因为这些首都是建立欧洲秩序的基础。

反对丘吉尔巴尔干战略的不仅仅是苏联，美国人也清楚，巴尔干战略有两方面的意图，既反苏，也反美。罗斯福总统看得很清楚，丘吉尔的计划一旦实现，必然在东南欧建立英国的统治，而美国人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英国朋友——竞争对手火中取栗。

罗斯福总统拒绝了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计划，他强调指出，没有什么可以妨碍‘霸王’战役的实施。

丘吉尔不得不作出让步，他非常勉强地同意了盟国从西欧攻打德国。诚然，罗斯福对丘吉尔也作了一些让步，他在致首相的信函中简要地通报说：“‘海盗’计划已经决定予以取消。”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向斯大林通报有关开罗军事会谈的成果时写道：

“……我们达成了下列有关在1944年进行对德战争的决议。这是对我们三个人在德黑兰作出决议的一个补充。

为了……做好强渡海峡（指英吉利海峡）的

准备，最为优先的战略选择是对德国实施轰炸攻击……我们已下令要尽最大的努力在美国和英国扩大登陆工具的生产，以加强即将到来的强渡海峡战役……”

丘吉尔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但他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大敌当前的条件下，与罗斯福总统一起同红色苏维埃合作，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探索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解决联盟内部各种争执问题的办法，这对一位西方政治家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不能等到“给最后一只护腿钉上最后一颗纽扣”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交战。无论从这些交战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来看，或者从用于这些交战的兵力和技术兵器的数量看，苏德战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

从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国在苏德战场投入的兵力数量上，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一问题：

在苏德战场上，德国投入153个师，仆从国投入37个师，共约550万人，集中了整个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国兵力的75%。

而在西线战场上，总共只有38个不满员的德国师。直接配置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沿海的部队总共只有19个师。

所有这一切为开辟第二战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苏联红军单独同德军作战的同时，对英美方面来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打击法西斯德国和援助苏联的最好的办法，但在西欧美国没有军事行动，英国几乎也没有军事行动。

英国一开始就采取了尽量拖延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

历史经验证明，德国在两线作战总是失败。俾斯麦、毛奇和施利芬都害怕两线作战。希特勒遵循他们的遗训，力图各个歼灭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他的确也达到了这一目的。

因此，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战场可牵制德国约60个师及其盟国20个师，从战略上可成为俄国战场的补充。这一战场可以对法西斯德国心脏地区构成威胁，

并使其处于极为复杂的战略态势。

从当时军事战略形势分析，苏联政府认为，在西欧（法国北部）和北欧（北极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做既可大大改善苏联的军事形势，也可改善英国的军事形势。早在1941年，苏联政府就象英国政府提出过这一看法。

丘吉尔立即拒绝了苏联关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断然宣称："实施重兵登陆，势必意味着流血与失败。"

1941年9月3日，苏联政府又指出在当年就建立第二战场是必要的。"德国人认为西线的危险是虚的，并且深信现在和将来在西线都不会出现任何战场，可以不受惩罚地将全部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

当俄罗斯大地上的军民与法西斯分子浴血鏖战时，丘吉尔首相仍然定期到契克斯的首相官邸休假。他喜欢嘴里含着大雪茄，在房里踱步，或思考问题，或高谈阔论。

他认为，开辟第二战场的主张是"奇谈怪论"和"愚蠢行为"，认为提出主张的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对军事战略"一无所知"，不懂"登

陆战役的特点”，也不懂“大部队在敌岸登陆”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他再一次回绝了苏联政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并拒绝承担这一义务。

丘吉尔首相喜欢向斯大林大声疾呼：“继续战斗”、“彻底消灭希特勒这些坏蛋”，盛赞“苏联人民的英勇、顽强”和“俄国军队捍卫祖国领土、反对纳粹匪徒的伟大斗争”。然而，在他极力用“华而不实的言辞”进行搪塞的同时，却推行一条与苏联假结盟的战略，苏联人认为，实际上，英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未给苏联以应有的支援。

丘吉尔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并不是由于英国的军事力量和武装装备不足，也不是他没有认识到客观局势的现实可能性。戴高乐或多或少地表述了其中的原因——在他们的秘密计划中，并不想趁敌人的力量在俄国战场上日益削弱的时候冒险。

或许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的话更能道出其中的真情——东方战场最好的结局是，最后一个俄国人杀死最后一个德国人并且死在一起。

即温斯顿·丘吉尔计划在打击敌人——纳粹分子的同时，还想打击自己的盟国苏联。

与丘吉尔所谓“不可克服的困难”论调相反，英国人民大众坚决要求丘吉尔政府开辟第二战场，就连丘吉尔的内阁大臣——比威布鲁克勋爵、议员恩尤林·比文、格伦维克、军事评论家维尔纳，也认为英国具备在欧洲建立第二戦场的现实可能性。

到1941年9月，英帝国共有陆军329.1万人，空军75万人，海军50万人。1942年内，英国与其自治领地计划共扩充并装备99个师。仅1941年，英国就生产飞机2万多架，坦克有15000多辆。

当时英国和美国联合的话，就已经拥有可供登陆兵在法国北部登陆的足够吨位的海军舰艇和登陆船只。英、美海军可以保障60～100个师在欧洲大陆登陆。美国向英国提供了排水量为1200万吨的商船队船只。如果说英国人在德国的狂轰滥炸之下能在7天之内撤走约33.8万人的部队的话，那么，英美联合舰队为什么不能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下把第一批30～40师的登陆兵送往从日德兰半岛至比斯开湾的欧洲沿

海任何一地登陆呢？德国海军由于本身力量有限，是不可能限制这一行动的。

自1941年10月莫斯科谈判之后，丘吉尔的国务大臣比威布鲁克批评了英国的战略，他认为，开辟第二战场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不能等到“给最后一只护腿钉上最后一颗钮扣”，他呼吁不能忽视“目前的机会”，声称“从我们方面看，目前的等待是不明智的”。

比威布鲁克这些言论，无疑违背了丘吉尔推行的、帝国总参谋部积极支持的“外围战略”，于是，丘吉尔首相“大义灭亲”，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己的挚友——比威布鲁克被逐出内阁。

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美国人的动机和原则与伦敦是大同小异，但在表现方式上则比较“含蓄”。华盛顿人士有时声称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准备向英国调运美国军队”，而实际上却拒绝执行他们自己制定的那些含糊的、不具体的、通篇充满了“如果”的战略计划。

丘吉尔与华盛顿的领导人都看到，在结束欧洲战争前，应极力在远离法西斯德国重要战略中心的外围地带作战，以便把同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全部重担都推到苏联肩上。

丘吉尔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所持的消极态度，在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不少疑惑和不满，为了给自己的言行辩解，丘吉尔与英国的宣传媒介一起，为公众杜撰了一个“大西洋壁垒”的神话：德国纳粹在法国西海岸筑成了一道“壁垒”。这种“壁垒之说”与戈培尔一伙人所造的舆论声势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丘吉尔颇动感情地说：

“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是难以攻克的，必须关心美、英两国的青年，不让他们的鲜血染红大海，不能让他们的尸体堆满海滩。”丘吉尔此处的用意是，人们应理解他的苦心，他所关心的是以尽可能小的牺牲来实现第二战场的开辟。

在 1941 年 6 月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整个法国的海岸都“大炮林立，布满了铁丝网、坚固火力点和岸防地雷。”

实际的“壁垒”又是怎样的呢？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德国来说在长达 5000 公里的欧洲沿海建起一道绵亘的防御壁垒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要投入庞大的力量，包括：170 个步兵师，220 个预备师，其中包括 10

～15 个坦克师。德国不可能把这么多的武装部队派到西线。因为德国在 1942 年拥有的 267 个师的军队中，有近 70%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都在苏德战场。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仅部署有希特勒军队的 15%的师，而且这些师的补充兵源都是年老的士兵和未打过仗的年轻人，他们装备低劣，配备着从法国和波兰缴获的武器。

原德军“西”集团军群前参谋长布柳门特利特回忆说，在诺曼底沿岸，塞纳河以西 200 英里地带总共只有 6 个师。“连长为了查看本连驻防的地段，整天要在岸边奔波”。有些师的防御地带宽达 200 公里，平均战役密度为 100 公里海岸不足 1 个师。

驻守法国、比利时、荷兰的德军除负责沿海的防御外，还承担“战勤”任务，并分散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内地。

1942 年，西线的德国空军共有轰炸机 400 架，有作战能力的歼击机 200 架。

德国战俘，第 28 军通讯支队的格奥尔格·古特森特中尉也承认：“在东线，我军的兵力很多……而西线有一半地方没有驻军，如果当时人们相信英国人，那就倒霉了。”

1942年，盟军对法国沿海进行了多次袭击，其中包括“吉布提”行动——在蒙巴顿将军指挥下对迪耶普港的袭击。

这是根据丘吉尔的创意所采取的行动，首相提出该创意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欧洲夺占登陆场的种种困难。

登陆兵在迪耶普登陆前，“BBC”据首相之意图广播了一个消息——此番袭击迪耶普目的是有限的，事后，英方对公众的解释：说给过早准备起义的法国爱国者听的。

不难理解，当电波把有关袭击迪耶普的消息传到四面八方时，听众绝不会仅仅是“过早准备起义的法国爱国者”的，那么，这种预告无疑就使袭击丧失了突然性。

伦敦也不会不清楚这种结果，那么，其行动目的就明了了——让德国人听到消息后，做好“迎接”登陆兵的准备。

德国人已经晓得，迪耶普地区将受到威胁，于是他们加强了该地的防御。平时在迪耶普地区仅驻有德军一个营，连同辅助部队共1400人。在英国电台广播了这则“好心”的预告以后，该地已集中了一个满员师。

丘吉尔仅仅为了证明不能开辟第二战场，就不惜把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当作牺牲品。

此次袭击迪耶普的参加者包括：英国“突击队”的勇士们、登陆船队及其护航舰只和加拿大的士兵，他们都表现了非凡的勇敢和对反法西斯事业的忠诚。参加袭击的勇士们向滩头运送坦克，在岸上攻击，前进了数英里，但坚持了约一昼夜，即退回到自己的船上。

这次行动投入的兵力不多，局部丧失了突然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员的重大损失。在参加战斗的5000人当中，阵亡约1000人，被俘2000人，另外，战舰、坦克等也遭到不同程度损失。

事后，英国报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极力证明在法国实施大规模登陆是不可能的。在联合军事会议上，某些美国军官在谈及开辟第二战场的现实性时只要表现一些乐观情绪，英国军官就把在迪耶普受伤的老兵抬进大厅，说明登陆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

难怪美国记者拉尔夫·莫洛索尔对这次袭击的真正目的表示怀疑：

“有意安排这样一次袭击的唯一目的是不

是为英国人反对任何攻入欧洲大陆的企图提供根据。”

丘吉尔的本意是要说明：在法国实施大规模登陆的不可能性”，但研究迪耶普行动的美军军官却得出另一种结论：大规模的进攻，只要能得到大量精锐兵力的保障，就完全有获胜的希望。美国人认为，这次作战实际上没有失败，而是成功的。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在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以不够充分的力量守住了海岸。损失大的原因在于没有后续部队和军需援助跟上。

丘吉尔是个把军事战略和盟国义务置于政治考虑之下的政治家，至于行家们对战役成败因素的分析、战略布置是否得当的评价等等，他是没有更多的心思去理会的。

丘吉尔不仅欺骗苏联，而且欺骗其更亲近的盟友——美利坚

1942年4月初，马歇尔与霍普金斯率使团从美利坚来到伦敦，他们向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提交了一份关于“不晚于1943年4月1日进

入法国”的计划。这份计划实际上是相当概括的，它要求英国应派出主要兵力，理由是美国在不列颠群岛的兵力不足。

丘吉尔对计划是赞不绝口，表现出一付非常热心和感兴趣的样子。他一再称该计划是“宏伟的”，战役是“伟大的”。但丘吉尔首相并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或对即将实施计划应采取的步骤作出任何允诺。

丘吉尔不仅欺骗苏联，而且侵骗其更亲近的盟友——美利坚。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实际上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认为更合理的，是“将我们的右爪伸向法属北非，将我们的左爪伸向挪威北角，只要再等一年，就不致冒险在拉芒什海峡对岸的德国筑垒阵地上碰断我们的牙齿”。

在公众面前，在公开的演说中，丘吉尔却更喜欢用一些能抓住听众心灵的言辞去树立自己的形象。他曾屡次真诚地号召美国“战友”进军欧洲，“肩并肩地进行一场伟大的十字军远征，以解放受苦受难的各国人民”。

受斯大林元帅之命，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军事代表伊萨耶夫少将接受伦敦的邀

请，于1942年5月20日乘专机从莫斯科飞往伦敦。

飞机穿越战争前线和丹麦上空，在英国某机场顺利着陆。他们在伦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丘吉尔表现了东道主的热情和诚意，及盎格鲁萨克森绅士风度。首相把自己的契克斯官邸让给苏联盟友住，自己暂时移居到郊外别墅。

苏联代表团此次伦敦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就统一的同盟战略达成协议——讨论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巩固反法西斯同盟等要害问题。

会谈开始后，莫洛托夫首先向丘吉尔首相介绍了苏德战场的形势——德国人已经将主要的人力物力集中到苏德战，有可能取得优势，接着他向丘吉尔提出了一个问题：

"英国能否在1942年夏秋至少把德国40个师从我国战场引开，并通过战斗把它们牵制在西欧。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打败希特勒的问题将在1942年解决……，盟国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丘吉尔极力证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他时而提出登陆船不够，时而又说法西斯空军力量强大。他仅仅泛泛地谈论将尽一

切可能“给英勇的俄国军队以必要的援助”。

经过几番唇舌之战，1942年5月26日，在英国外交部大楼双方签署了苏英关于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同伙的战争中的同盟和战后合作与互助条约。

丘吉尔感叹地说：“条约是粉碎我们敌人的保证！”

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宣称：“如果几年前签订这样的条约，战争也许就根本不会爆发了！”

1942年7月底，丘吉尔在议会演说时庄重地声明：“如果认为我国和美国准备为我们而打赢战争，那是不明智的。进攻的时节已经到来。已告知所有部队于9月1日前作好准备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然而，丘吉尔没等他自己与罗斯福签署的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墨迹干爽，就我行我素起来了。

丘吉尔执意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为时尚早，计划在其他的地方打击敌人，他一意孤行地推行自己的战略路线。

1942年6月9日，丘吉尔首相收到了来自

情报机关的报告:“东线战场的局势可能出现各种结局,谁胜谁负尚难预料。如果德国人知道,他们一方面受到俄国新的冬季战局的威胁;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英、美在西线的进攻,那么灭顶之灾将会象 1918 年那样闪电般地出现。”但这种估计却完全被忽略了。

1942 年 6 月,苏联代表团刚刚飞离了伦敦,丘吉尔就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同德国法西斯作战的计划,其中包括为转移人们视线的“木星”计划(进攻挪威北部的计划)、可供挑选的“铁锤”计划(美、英两国为策应苏联而于 1942 年 4 月 14 日确定的一系列应急措施的代号。这些措施包括:在英国集结和部署强大的部队;1943 年或可能的话在 1942 年,在北非登陆)以及最受丘吉尔推崇的“体育家”计划(预定在法属北非作战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些意图,帝国总参谋部非常尽力,丘吉尔也施展了种种外交手腕。

1942 年 6 月 17 日,一架“波音”飞机载着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飞往华盛顿。英、美首脑将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谈。

两天后,丘吉尔交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主

要是陈述1942年不能开辟第二战场的理由。其中也写进了准备“包列罗舞”计划（1942年英美制定的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计划的代号）的必要性。但在结尾，丘吉尔再次强调：“英国政府不赞成必败无疑的战役，因为这对俄国毫无帮助……我们坚持认为，在今年不应在法国登陆。”

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丘吉尔公开承认：英国参谋部无法制定1942年进攻欧洲的计划。丘吉尔提出，如果美国也没有这种计划，将实行在北非登陆的计划——“体育家”计划。丘吉尔非常清楚：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将会使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行动告吹。

美国三军参谋长对此作了一项正式声明：“体育家”计划的主要缺点在于，“即使完全成功地实现这一计划也不能迫使德国人从俄国战场撤走一兵一卒，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对此，丘吉尔没有感到丝毫不安，他就象没发生什么似的，继续做他打算做的事。

温斯顿·丘吉尔没费多大力气就说服了来伦敦参加7月20～25日会议的霍普金斯和马歇尔，让他们取消了1942年在欧洲作战的计

划，改为执行进攻北非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新代号是“火炬”。按照丘吉尔的想法，“火炬”不仅应照亮通往北非之路，而且应照亮通往巴尔干之途。丘吉尔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罗斯福电告霍普金斯：“立即实施‘火炬’计划。”

英、美参谋部从此不再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伤脑筋了，它们全力投身于制定进攻西北非的详细计划。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经过丘吉尔首相的几多辛苦奔波，终于被从他的日程表上划去了。

夏季的伦敦温暖又湿润，与阴冷的冬日比起来，夏季更让人喜欢，这是个亲朋聚会、郊游的较好时光。

1942 年 7 月一个月色融融的夜晚，唐宁街 10 号冬园华灯齐放，很是热闹。丘吉尔首相正在这里设宴款待战时内阁成员，当宾客们酒足饭饱之后，他请大臣们到会议大厅，向他们通报：他即将飞抵苏联。

事先，丘吉尔已致函斯大林，表示欲亲自拜会的愿望。他想告知斯大林在伦敦刚刚通过的

一项决议：1942 年将不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丘吉尔不是单为这件事情去莫斯科的，因为他完全可以通过个人信函把决议内容通知给苏联首脑。首相的另一打算是，他想获得有关红军能否打退法西斯军队的大规模进功并守住高加索的第一手情报。丘吉尔之所以对这一情报感兴趣，除了他一贯的政治目的外，还有一种现实的战略考虑——如果红军守不住高加索，德国人就可以由此进入伊朗、伊拉克、埃及和印度，而这正是首相所关心的。

8 月 12 日晨，丘吉尔率一个军事、政治顾问组飞抵莫斯科，这是他首次访苏。

丘吉尔首相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写道：

“我反复思考着我去这个……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时，我曾执意把它扼杀掉。”丘吉尔对自己是毫不掩饰的。

不管丘吉尔到苏联去的用意如何，他飞往“布尔什维克国家”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他的访问是对苏维埃国家实力和影响的承认，是对旨在摧毁这个国家的计划宣告破产的承认。

丘吉尔与斯大林于 8 月 12 日举行会晤，当

时在场的还有美国代表阿费里尔·哈里曼。

温斯顿·丘吉尔滔滔不绝地阐述了1942年盟军在法国登陆在军事上的不客观性——集结在英国的登陆船只和兵力数量不足，在拉芒什和加莱海峡实施登陆战役存在种种困难，在法国沿海登陆会中断1943年战役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抽调许多主要专家。

接着，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英美两国都在准备1943年的大战役”，英国为此将扩充21个师，其中将近一半是坦克师。

丘吉尔断言，1942年英国无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且指出在法国沿海实施6～8个师的登陆战役弊多利少。

为显示自己立场与美国是一致的，他请哈里曼表示一下态度，哈里曼当即表示完全同意首相的意见。

斯大林的观点：“谁不想冒险，谁就永远打不赢战争。”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论点，指出1942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这一段经历作了如下描述：

“我提出了高加索问题。他（笔者：指斯大

林）是否打算保卫而且用多少个师去保卫这条山脉呢？谈到这一问题时，他清楚地、坦率地而且十分熟悉情况地解释了这条屏障的坚固性，据他说，共有25个师用于保卫这条屏障。他指着一条条山间通道说，这些地方都将设防。他还通报说，他们必须在此坚守两个月，直到大雪封山。他声称，他完全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丘吉尔向罗斯福通报他与斯大林的会晤情况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会谈进行得“极不愉快”，斯大林说了“许多令人不快的话，尤其是他说我们十分害怕同德国人打仗……，说我们违背了关于‘铁锤’战役的诺言；说我们没有履行向俄国提供物资的诺言，说我们取走了自己所需的物资，而仅把剩余的物资运给他们。显然，这些话是对英国说的，也同样是对美国说的。”

据丘吉尔说，他驳倒了苏联首脑的这些说法，无论如何，“这样解释清楚比什么都不说要好”。

从莫斯科的会谈中，使丘吉尔感触最深，也是他向罗斯福总统通报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即使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有决心战斗

下去。这正合丘吉尔首相的心愿。

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简要地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俄国人继续打下去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他们对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我们开辟第二战场，但他们对自己的遭遇并未叫苦不迭。"

当苏德战场的血雨腥风和硝烟战火正浓时，丘吉尔又做了一件背弃盟国义务的事——他作出决定：由于极昼期间护航困难，1943年前放弃从北海道向苏联运送军事物资。

"出于自己的良心"，他又提出一个意见：绕道伊朗以加强对苏联的供货。众所周知，"绕道伊朗"与北海航道比战略意义要小得少。

丘吉尔又一次把矛刺向了盟友，把与纳粹德国作战的主要重担继续放到苏联肩上。

他想在中欧打进一个楔子

丘吉尔坚定不移地拒绝按预定时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他一边点燃非洲的"火炬"，一边进步发展他的"巴尔干"或者叫"地中海"的战略主张。

对于地中海地区，丘吉尔很早以来就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既想保住在埃及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如塞浦路斯、马尔他、直布罗陀已夺取的阵地，还计划在利比亚、叙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夺占新的阵地。因此，他极力把英美联合进攻的矛头指向该战场的侧翼。

同以往丘吉尔提出的许多战略方案一样，他坚决主张开辟第二战场的“巴尔干方案”，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从军事上着眼。这一方案实施的目的在于，他力图挡住红军通向巴尔干之路，制止当地民主运动的增强，巩固英国在地中海的阵地，保守它对近东的控制。

丘吉尔本人对此并不掩饰，他曾公开声称，他打算在中欧打进一个楔子，把欧洲和苏俄隔开。

“巴尔干就象一块磁铁，无论罗盘怎样抖动，英国战略的指针始终指向它。”美国记者拉尔夫·英格索尔形象地说。

丘吉尔提出“巴尔干战略”的另一动机是，他想利用在次要方向作战的时机来积蓄力量，以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德国进攻。

为了把“巴尔干战略”付诸实施，丘吉尔在

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项建立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即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诸国反苏集团的计划。该联邦应以保加利亚科堡王朝为首。其成员有：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阿尔巴尼亚。联邦对外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而实际上则受英国领导。1942年1月，希腊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签订的政治联盟条约便是建立该联邦的一个步骤。当时在伦敦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另一反苏集团，即中欧联盟的波捷协议。

丘吉尔在1942年10月给他的内阁成员分发了一份备忘录：

"我的思想首先集中在欧洲，即振兴作为现代民族和文明摇篮的欧洲的强大。如果让俄国的残暴行径践踏古老欧洲国家的文明与独立的话，那将是莫大的灾难。无论现在多么难以预料，但我想，欧洲各族人民大家庭是能够在欧洲联盟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行动的。我希望未来将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

作为"欧洲合众国"的首领，丘吉尔首相建议成立一个由10～12个成员组成的"欧洲政府"，即地区性"欧洲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拥有

国际性军事力量、国际警察和最高法院。自然地，英国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英首相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1943年5月，丘吉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计划，提出了在英、美两国领导下建立“全球大国协会”的主张。英美两国应与中国一道建立全球政府，即全球最高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三个地区性委员会：一个负责欧洲，一个负责美洲，一个负责太平洋。

丘吉尔从大国名单中把苏联排出去这一行动本身就可说明，他的全部计划是针对苏联的，他在后来同土耳其领导人的会晤中公开提出：“必须组织最紧密的反苏同盟。”

但丘吉尔的计划不仅仅把矛盾指向苏联，也还反对美国对欧洲的控制。美国一心想在欧洲大陆上夺取一些经济、政治阵地，它赞同伦敦的反苏意向和行动，却极审慎地对待丘吉尔关于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英、美统治集团在许多问题上保持一致的同时，在战后未来计划的问题上却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为什么要象蜘蛛一样顺着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尖往上爬呢？打击它的膝部岂不更好？”

1943 年元月，非洲，解放不久的卡萨布兰卡，代号“将军”和代号“P 先生”的两个人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会晤。

“卡萨布兰卡”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白宫”。“将军”是美国总统罗斯福，“P 先生”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克会议上更卖力地推行自己的“巴尔干战略”，提出要派兵在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登陆。

丘吉尔在“非洲白宫”会议上提出的另一项任务是，再次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这之前，他曾因未履行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义务，而向苏联明确许诺 1943 年开辟第二战场。

英美领导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决定是，北非战役结束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尔后实施地中海战役。这样一来，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的登陆推

迟了，因而真正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期就自然被推迟了。

“卡萨布兰卡会议是一次折磨人的会议……最后只生下了一个西西里岛小老鼠。”拉尔夫·英格索尔评论道。

1943年5月11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再次会晤，丘吉尔提出彻底放弃英美军队于1943年在西欧登陆的计划。因为在卡萨布兰卡丘吉尔与罗斯福双方早已就此达成了协议，所以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丘吉尔轻而易举地说服了罗斯福。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

把“英美攻入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春天”，使法西斯德国能够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主力保持在东线，并不断地补充该线的兵力。

在伦敦的政治家正忙于践踏同盟国对苏联的义务时，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和其他一些城镇都纷纷举行了由共产党和其他工人组织领导的群众集会，人民希望“不仅为了俄国，而且为了自己”与敌作战。

英国共产党的决议指出：“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是英、美两国人民的直接义务……，人民要求政府采取攻势战略和大胆领导……”

丘吉尔访问德哈维兰飞机厂时，该厂工人向他递交了一份声明："本厂工人希望毫不拖延地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认为：某些身居要职并与希特勒勾结的反动分子已在反对开辟第二战场。"

随着红军的胜利和盟军在地中海地区的连续作战，英国民众争取1943年夏秋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斗争更加增强了。1943年的英国《雷诺新闻》报写道："联合打击必将保证今年的胜利。"

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的胜利和向第聂伯河的前进，完成了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根本转折。到1943年11月前，苏军已解放了近2/3被希特勒的军队所占领的国土。库尔斯克的胜利预示着法西斯德国在军事上的崩溃。

随着红军攻势的扩大，英美统治集团对苏联在没有英美援助的情况下也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和解放欧洲各国人民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时他们不再为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伤脑筋，而是担心如何才能使开辟第二战场的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1943年8月，丘吉尔与罗

斯福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例会，主要讨论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丘吉尔再次坚持他的“巴尔干方案”，要求先占领罗马，向意大林北部挺进，然后在巴尔干、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登陆。丘吉尔喋喋不休地说：“为什么要象蜘蛛一样顺着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尖往上爬呢？打击它的膝部岂不更好？”

华盛顿由于害怕“俄国人不停地向西推进”(摘自 1943 年 2 月 14 日《纽约时报》)，担心俄国人首先进入柏林，不得不明确地表示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便通过战略上更有利的捷径向德国推进——从法国东北通往柏林和德国其他最重要经济中心的路总共只有大约 600～700 公里，从意大利到德国边境要走 1200 公里，从巴尔干则有 1700 公里；并且，向巴尔干和意大利进攻，离开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中心很远，西欧的地形、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来说比意大利和巴尔干有利得多。

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一项代号为“霸王”的战略计划——规定盟军于 1944 年 5 月 1 日在诺曼底登陆。另外，还计划了一次代号为

"铁砧"的战役（在法国南方土伦和马赛附近登陆的辅助性战役）。

由于丘吉尔的倡议，这项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附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霸王"行动只能在下列前提下方可实施：

"风力不太强；

潮汐正好符合要求；

月光条件正好适合要求；

在潮汐和月光合适的条件下天气也适应；

当上述所有条件均不具备时，进攻时间将自动延期一个月，直至下一个满月日期……

在此之前调往西北欧的德军快速预备队不多于12个师，且德军无法从俄国战场抽调15个以上的一类师。"

每个有健康思维的人都明白，要完全具备成功登陆的所有条件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而这恰恰是丘吉尔所需要的，正因为如此，他又制订了一个"伦金"计划，规定在德国突然停止战争时在欧洲实施紧急登陆；德国一旦投降，英、美军队立即占领整个德国。

为在西欧实施登陆战役，在英伦三岛共集结了4个集团军（2个美国集团军，1个英国集

团军，1个加拿大集团军），下辖37个师。此外，美国还有50个师已作好向西欧运输的准备。

盟国空军共有11000架作战飞机和2300多架运输机。登陆的海军兵力共有：战列舰6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93艘，扫雷舰255艘，运输船和登陆船6000余艘，远征军总兵力为287.6万人。

在“霸王”行动实施前夕，英美军队对敌拥有的兵力优势是：人员2.1倍，坦克2.2倍，飞机近23倍。

1944年6月6日凌晨，英、美两国的数千架飞机对诺曼底沿海进行了猛烈轰炸，法国西北部海岸线上万炮齐鸣，“霸王”行动开始了，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役，标志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成功，牵制了西线的法西斯德军。盟军拖住了原来可毫无阻挡地调往东线同苏军作战的德国部分战略预备队。到1944年底，盟军在西线面临的德军共有73个师。

在盟军实施“霸王”行动的同时，苏军于1944年6月10日在列宁格勒战线开始了夏季

攻势的第一阶段，突破了芬军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永备防御工事。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和白俄罗斯的大规模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盟军在法国的胜利。

“霸王”行动的成功，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希特勒逼上了他的先人们走过的地狱之途。

然而对于献身政坛的丘吉尔来说，他还任重道远……

第四章　阿尔戈船英雄

他打算得到“金羊毛”，又自我解嘲地说，幸亏他弄到相当多的威士忌酒，才得以活下来

按着1944年春季的许诺，苏联及时地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以便策应盟国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西欧，许多国家都从法西斯的占领下陆续得到解放。美国历史学家G·菲斯指出：“当苏联严守诺言，按计划发动强大攻势的时候，西方的军事将领不仅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而且所有这些行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行动使他们确信……苏联政府的话是可靠的。”

然而，1944年底，在西线出现了对同盟国非常不利的情况。希特勒利用同盟国在德国边界地区发动攻势的机会，在阿登地区（比利时）

进行反扑。德国人的意图是切断在比利时和荷兰的英、美部队同主力的联系，并消灭这些部队，破坏英、美军队下一年的进攻计划。这样，德国便可以抽调大量部队到东线对付苏军。德军突破前线并向前推进了90公里。德国人的攻势虽然被制止住了，可他们摧毁第二战场的威胁依然严重存在。

这种情况迫使丘吉尔在1945年1月6日向斯大林告急求援，请求“俄国1月份在维斯拉前线或其他某一地区发动强大攻势”。斯大林答复这一请求时写道：“根据盟国在西部战场的处境”，决定“加速准备在整个中部战线向德寇发起的大规模进攻，这个行动至迟在1月底开始……”

1月12日，苏军比原计划提前8天重创希特勒军队，迫使德军不得不立即中止西线的攻势并将部队调往东线。苏联在发动攻势后的头3周就在主攻方向上推进500公里，进入奥得河地区，距离柏林70公里。

苏联忠实地履行了对盟国的义务，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国际威望。

后来，丘吉尔在议会演说时称：“从来没有

任何一个政府能象苏联政府那样，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国际事件，它引起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其中包括英美两国都想了解和协商苏联对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日期和参加规模问题。

随着反法西斯斗争胜利曙光的出现，三强领导人的会议就越发显得迫切了。

会议的必要性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决定的。会议必须讨论与彻底打败法西斯德国及与德国无条件投降有关的种种军事问题，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德国未来的体制问题。战后德国向何处去已成为一个首要问题。将要召开的会议的第二项任务是确定战后持久和平原则，并制定一条对待欧洲各个被解放国家的共同路线。

从 1944 年夏季起，反法西斯同盟国——英、美、苏的领导人就一致同意必须召开一次新的“三巨头”会议。问题仅在于开会的时间与地点。

丘吉尔建议在耶路撒冷、塞得港或亚历山

大港开会，并且声称：如果苏联政府首脑不前往赴会，丘吉尔就准备“在英国召开新的双边会议”。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将会址定在雅尔塔。丘吉尔一有机会就抱怨，似乎会议地点选在雅尔塔是一次失败。当然，他又自我解嘲地说，幸亏他弄到了相当多的威士忌酒，才得以“活”了下来。

喜爱密码代号的丘吉尔为给即将召开的会议想出一个代号来，颇动了一番脑筋。12月31日，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致函中：“您是否给这次行动起了个什么名字？如果没有，我提议叫‘阿尔戈船英雄’”。

显然，丘吉尔同希腊神话中前往科尔斯寻找金羊毛的希腊阿尔戈船英雄进行了比较，他把自己比作神话中的英雄伊阿宋或赫剌克勒斯并打算得到“金羊毛”——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得到苏联的帮助，还有其他等等。

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回答是：“我赞成您取的‘阿尔戈船英雄’这一名称。我与你都是他们的直系后裔。”

斯大林得知开会的消息时，便回信丘吉尔，

同意用“阿尔戈船英雄”作为报道会议的代号，并认为会晤地点是雅尔塔，日期是2月2日。

三大国首脑把这次会议称为“克里木会议”。

如同1943年德黑兰会议前的开罗会议一样，在克里木会议前，丘吉尔提议英、美两国领导人先在马尔他开了会，且别具一格地为之命名为“板球”行动。

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要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先研究一下各项政治和军事问题，并议定一个会议日程表。“您能否来马尔他呆2～3个晚上，以便让参谋长们有机会举行一般性非正式会谈……我认为对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极为重要”。

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罗斯福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了丘吉尔的提议。

1945年1月29日，丘吉尔的座机“空中霸王”号从英国北霍特机场起飞，直抵马耳他。飞机在马耳他机场着陆后，首相稍感疲倦，根据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的建议，到“沃里昂”号巡洋舰的豪华舱内休息。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罗斯福总统一行乘“昆

西”号巡洋舰从美国出发，巡洋舰越过大西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驶向马耳他岛的瓦莱塔港。

2月2日上午9时，“昆西”号巡洋舰在“喷火式”战斗机的护送下驶入瓦莱塔港。这时礼炮齐鸣，海军乐队奏起了乐曲。

晚上6时，丘吉尔与罗斯福在“昆西”号巡洋舰上举行了4个多小时的正式会谈。

丘吉尔再次推动了他的“巴尔干战略”计划，向罗斯福提出让盟军从意大利向奥地利进攻；他反对把盟军从意大利战场向西调到法国去。

从政治上看，丘吉尔的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由南实施突击，以阻止红军解放西欧。他仍然主张把若干个英国师留在希腊，以镇压该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美国的军、政官员们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减轻自己在西线的战争负担，并不打算眼下就激化同苏联政府的矛盾。阿登山区事件已经表明，红军的援助是多么宝贵而及时。英、美双方对政治和战略的争论有时是很激烈的。马歇尔将军要挟说：“如果丘吉尔和罗斯福批准英国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将辞去盟军最高统帅

的职务。

由于支持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罗斯福总统进行了干预，丘吉尔的计划再一次被搁置在一边。

在马耳他会议上，英美两国的军政领导人和外交官虽然有许多严重的分歧，但就许多问题仍然达成了协议，并带着商定的计划参加了克里木会议，与苏联的立场相抗衡。

然而在克里木会议上，对马耳他计划又作出了根本修正。

雅尔塔坐落在达尔山脚一片露天剧场式的半圆形平原上，夹在贝斯特雷与沃多帕特雷两个河谷之间，是克里木南岸的风景区之一。

当蔚兰色的天空出现第一道金光时，如果有幸登上克里木群山的奇峰——美丽的艾·帕特里峰观赏日出，那么，一种奇异的壮观景象将使人终生难忘。

1945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驱车穿过克里木山地，驶向克里木南海岸时，会感到一阵阵迎面吹来的和煦春风和夹杂在春风中的泥土的芬芳。

如同初春的太阳在被解放的克里木升起一

样，政治地平线上出现了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曙光。

1945年2月2日深夜，马耳他的“卢卡”机场显得格外神密和紧张。几天前这里就已被戒严，除了机场的主要几位负责人外，一般工作人员均不晓得内情。此时，从机场的混凝土跑道上，每隔10分钟就有英美两国的军用运输机起飞，并朝雅典飞去。随后，航路转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飞越黑海，直抵克里木。

一架“道格拉斯C—54”型“圣牛”号飞机，大约在午夜时分，飞离跑道，10分钟以后，一架英国空军的“空中霸王”型飞机随即升入天空。

英美两国的6架远程战斗机与“圣牛”和“空中霸王”在雅典上空编队飞行，其中有一架给“圣牛”护航的飞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又返回了机场。当飞临黑海上空某种高空航线时，苏联歼击机给“圣牛”和“空中霸王”担任了护航仪仗队。

在“圣牛”号飞机上坐着的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空中霸王”型飞机坐着的是联合王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经过2000多公里的航行后，正午时分，丘吉尔首相的座机降落在萨克逊机场。飞机发动机刚一停，矮胖的丘吉尔就出现在飞机舷梯上。他身穿黑色的质地很厚的呢大衣，头戴半军用的“老水手”海员帽。

面对着前来欢迎的人们，丘吉尔首相频频地招手致意，然后便在随员的陪同下，钻进架设在机场的帐篷里，去品尝俄国的伏特加酒和鱼子酱了。

当丘吉尔的小酌结束不久，罗斯福的C—54座机也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丘吉尔和所有的人都来到跑道上。乐队奏起了英、美、苏三国的国歌，首相和总统分别乘座“威力斯”敞篷汽车，开始检阅仪仗队。

陪同丘吉尔的是他的女儿，担任英国空军妇女辅助团支队长的萨拉·奥利维尔。车队经过辛菲罗波尔、阿卢什塔驶向雅尔塔。

从克里木公路两旁，丘吉尔看到了未治愈的战争创伤。希特勒占领军给雅尔塔这个昔日的疗养圣地带来了巨大损失，破坏和洗劫了疗养院、工业企业、住宅和港口，摧毁了著名的马桑德洛夫葡萄园和果园。被毁坏的房屋，被烧毁

的德国坦克、汽车和火车残骸这些敌人溃败的痕迹也历历在目。

雅尔塔是 1944 年 4 月 16 日刚刚从德国法西斯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的，所以安顿英、美连勤务人员在内的近 700 人的各种代表团是十分困难的。

会议召开之前，美英的“林纳科”、“含蓄”号及其他各种用途的舰艇都曾在雅尔塔、塞瓦斯托波尔停泊过。从雅尔塔到塞瓦斯托波尔铺设了电报电缆，通到美国海军的“科托克廷”号通信舰，与华盛顿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因担心“科托克廷”号碰上德国的飘雷，未将该舰驶进雅尔塔。

连同这些舰船的水兵、勤务兵、大批警卫人员还有美国人带来的一个印刷厂的工作人员，来到克里木的外国人约有 2500 人。

为了接待与会代表和服务人员，必须重新修复、整修许多殿堂与房舍。为此，向克里木运送了 1500 车厢战时稀缺的建筑材料和设备。仅仅修复原尼古拉二世的夏宫利瓦吉亚宫，就用了 2 万个工作日。

会议安全由苏联军人负责。尽管实际上没

有德国空袭的危险，仍然采取了预防措施。高炮连的炮手们仍昼夜值班，雷达密切注视着任何飞机的接近，舰艇和潜艇警惕地守卫着雅尔塔附近的海面。在德里兰斯间法西斯分子企图暗杀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教训人们已牢牢记住了，虽然此时的形势比昔日要安全些，但谁也不敢对安全问题掉以轻心。

英国代表团下榻在阿卢普卡的沃龙佐夫宫。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是根据英国建筑家艾德·布德的设计，由诺沃罗西斯的总督 M·C·沃龙佐夫伯爵于 19 世纪上半叶建筑的。沃龙佐夫伯爵曾在泰晤士河畔受过教育。他的亲英风格也体现在他的建筑格调上：宫殿的正北与整个群山起伏的背景浑然为一体，是按照英国晚期哥特式风格建造的，近似于中世纪英国大地主的城堡；宫殿正南面向大海，是按摩尔式建筑风格建造的。英国代表团团长温斯顿·丘吉尔非常喜欢这个住处，把它看作是遥远俄国的一小片英国土地。他的女儿萨拉以及 A·艾登、A·卡多甘、艾伦·布鲁克、肯宁海姆、查尔斯·波特尔、驻苏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普等人都同丘吉尔一起住在沃龙佐夫宫。有些代表团成

员则被安派在疗养院的住房内。

年已七旬的英国代表团团长坐在会议桌旁，不停地抽着雪茄烟

1945年2月4日，雅尔塔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明媚，英、美、苏三国代表团成员聚在一起，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大厅的大圆桌四周坐满了各国代表，壁炉烧得正旺，似乎给这个会议平添了许多热烈的气氛。

温斯顿·丘吉尔已是七旬的老人了，但他身体很健康，头脑思考起问题来也绝不比从前差，而且他已不再是"性急的年轻人"了。丘吉尔坐在会议桌旁，不停地抽着雪茄烟，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丘吉尔所率领的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外交大臣A·艾登、常务大臣A·卡多甘、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元帅、国防部长哈·伊斯梅将军、空军中将查尔斯·波特尔和海军参谋长、海军元帅肯宁海姆。

英国首相给这次会议的代表团的主要任务

是，加强帝国在欧洲的影响，维护“力量平衡”、保持不列颠帝国的地位。

会议从研究苏德战场的形势开始，在一周内每天都从清晨工作至深夜。

丘吉尔象在马耳他会谈时一样，又搬出他的“巴尔干方案”，即通过亚得里亚海和卢布尔雅那山口对德军实施突击。但是连罗斯福也不支持他的建议。

会议就盟国陆军与空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德国内脏地区实施新的更猛烈的突击达成了一致。

晚上，罗斯福总统在美国代表团的住处设宴款待与会代表。菲律宾厨师用俄国原料烹制的各种菜肴很受欢迎，席间，代表们为加强盟国在战争中和战后的合作频频举杯。

丘吉尔用自我批评的口吻说：“为什么人们把我叫作反动分子。我向各位保证：我是个民主主义者，并随时可以去职。”

2月5日下午3点55分，丘吉尔拿着一支大雪茄烟，在女儿萨拉副官的陪同下首先来到会议大厅，然后斯大林也缓步到来，最后，罗斯福总统住所的大门打开了，一个黑人侍从推着

他的轮椅走出来，罗斯福面带笑容地与斯大林和丘吉尔一一握手，然后他们就消失在会议大厅内。

这次全体会议讨论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是有关未来德国的问题。三强首脑就打败德国后的共同政治问题和强迫法西斯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丘吉尔和艾登都决心恢复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主力的地位，目的有二：一是为了与德国抗衡，二是为了让法国参加西欧集团。

象在德黑兰会议上一样，丘吉尔与罗斯福都主张肢解德国、消灭德国作为世界市场上的危险竞争对手的计划。

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罗斯福的得力助手、财政部长摩根陶就判定了一份德国农业化的计划，摩根陶指出："我消灭德国侵略威胁的计划非常简单，就是剥夺它的整个重工业。"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赞成摩根陶的计划。丘吉尔还提出把德国分割成北德和南德，前者包括普鲁士，后者包括巴伐利亚，同时把鲁尔和威斯特法利亚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苏联代表团阻止了这一计划。

三国首脑最后决定："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确保德国再也不能破坏世界和平。"

然而，从长远看，丘吉尔对德国问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可以吸收德国参加西欧军事集团，以便同苏联作斗争，帝国参谋总长阿伦·布鲁克在领会了首相意图后，在日记中写道：是肢解德国还是把它逐步变成盟国，以便20年后抗击目前业已存在的来自俄国的威胁?"

可见，丘吉尔要肢解德国的目的在于，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制服德国，并把德国用于今后的反苏斗争。所以丘吉尔坚决反对将德国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中50%付给苏联的计划。

会议在讨论波兰问题时斗争十分激烈。罗斯福有一次挠着头，颇有感触地说："已经有500年了，波兰一直让欧洲人头疼。"

丘吉尔特别关心波兰的未来。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是反动政府，比其他流亡政府更加敌视苏联。"伦敦的波兰人"认为苏联是比希特勒更重要的敌人。波兰政府与其说关心抗德战争，不如说更加关心战后重新夺取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这些地区是波兰白军乘苏俄暂时弱小之

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从苏俄手中夺走的，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苏联同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国家。

丘吉尔政府支持流亡的波兰政府提出的领土要求。他并不是要波兰强大，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始终是个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锋”，他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到1943年初，丘吉尔根据各个战场的形势已经看清，要想从苏联夺走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是毫无指望的。这时，他才勉强同意苏联同波兰按所谓寇松线划定边界线。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提议就波兰问题作出决定，并说：“波兰疆土应当在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其中包括东普鲁士和沃波累省。”斯大林和罗斯福同意这项建议。可在波兰流亡政府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丘吉尔马上收回他在德黑兰所说的话。

他提出新的建议——苏联政府把红军解放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置于联合国代表的监督之下。斯大林就此给丘吉尔写信说：“这简直是对苏联的污辱！”

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尽管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他的一切努力还注定是要失败的。波兰爱国者团结一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机构。苏联对波兰人民的民主力量给予一切形式的援助和支持。同时，苏联政府准备考虑英国政府的意见，使未来的波兰政府建立在广泛的政治基础之上，既包括波兰国内的民主力量，也包括国外的波兰人。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政府首脑一致通过了“像战争中一样，在组织和平方面保持团结一致”的文件。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决心：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和加强在目的与行动上的团结一致，以使联合国在现代战争中的胜利成为可能和无疑。“只有我们三国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保持和加强相互合作和相互理解，人类最高的愿望——巩固而持久的和平才能实现”。

丘吉尔虽然签了字，但签得很勉强。他实际上想的不是同苏联互相谅解，而是千方百计限制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并强迫它同意西方大国向红军解放的欧洲各国输出反革命。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丘吉尔驱车前往塞瓦

斯托波尔。道路在悬崖峭壁之间蜿蜒而行，途经萨蓬山，路过拜达尔山口。不久前红军为了解放这座城市，与法西斯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

首相巡视了塞瓦斯托波尔这座经受过 250 天艰苦围困、被侵略者变成一片废墟的城市。作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裔，他还想看看在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期间英国武装干涉军作战的遗址。

丘吉尔参观了“英军墓地”和俄军打败英国骑兵队的巴拉克拉瓦山谷。陪同丘吉尔参观的陆军部军官向他介绍了英军的勇敢精神，而黑海舰队司令则告诉丘吉尔，苏联军人以及被希特勒匪徒惊恐地称作“黑色死神”的苏联水兵在巴拉克拉瓦山谷和塞瓦斯托波尔是怎样同法西斯强盗英勇作战的。

2 月 14 日，丘吉尔乘车来到萨克森机场，首相的座机已在那里等候，仪仗队也已排列在机场上。丘吉尔绕仪仗队走了一圈，仔细端详着苏联军人的目光，似乎想从中看出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英勇精神的源泉。

丘吉尔的座机向雅典飞去，他迫切地想要给卡佩尔大使和 7 周前曾屠杀过希腊解放运动

爱国者的斯科比将军发出新指示。

离开雅典后，丘吉尔飞往埃及。在亚历山大港，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美国巡洋舰上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随后，丘吉尔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进行了会谈，然后返回英国。

在评价克里木会议的结果时，丘吉尔承认：

"以往的每次会晤都表明，只要三国政府首脑能大胆地正视困难，具有克服困难的坚定决心，通过相互会晤就能取得明显的成果。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胜利后也绝不削弱已牢固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的纽带。"

丘吉尔又指出：英、苏、美保持紧密的团结是必要的，"这种团结可把世界引向繁荣和幸福"。他说，"一旦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产生可怕的分裂，人类命运就不会安宁。"

然而，丘吉尔的实际行动却让人对他以上所言的真实性颇感怀疑。

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了他在1945年3月的政策和策略："第一，苏俄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的阵线来阻止苏俄向前推进；第三，欧洲的这条新阵线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东方；第四，柏林是英、美

军队首要的和真正的目标；第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军进入布拉格有重要意义……；第七，必须遏制铁托元帅的侵略性的要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离开以前……东西方国家之间必须就欧洲的一切主要问题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丘吉尔的这些政策和策略与他几周前在雅尔塔所说的话和签了字的协议相距是多么遥远！现在，苏联对他来说已是致命威胁，必须建立新的阵线来反对苏联。

当然，丘吉尔的公开立场还和从前一样，他至此还没有否认雅尔塔协议，但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他的实际政策完全与雅尔塔协议背道而驰。

丘吉尔不顾雅尔塔协议，企图让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盟军向柏林紧急进军，要先于红军抢先占领柏林。他在1945年4月5日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们同俄国军队会和的地点至关重要，要尽可能向东深入，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应进入柏林。”

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不可能实现这个意图的。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哈里·杜鲁门出任美国总统。丘吉尔认为，破坏反希特勒同盟，实现自己计划的机会又来了。

丘吉尔后来自己也承认："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欢天喜地的人群的时候，我就发电报给蒙哥马利（笔者：该人是西欧英军总司令），吩咐他集中收藏好德军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发给与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他公开承认要在战争末期同没有被彻底击溃的纳粹分子携起手来，掉转枪口反对自己的盟友苏联。

"丘吉尔就象对待反希特勒战争那样起劲地策划这个令人吃惊的，也可说是毒辣的阴谋。如果希特勒的阴谋得逞，将会向全世界展示一幅令人震惊的景象，就是紧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任何间隙立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作战双方的地位和盟友都发生了变化。"I·杰列比说。德国自由主义派评论家哈夫纳关于这个问题写道："希特勒希望东西方冲突

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945 年春天和初夏，胜利者之间的战争确实可能一触即发。据可靠人士说，至少反希特勒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丘吉尔已经准备战争，甚至想挑起战争。”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那么抗击希特勒及其帮凶的一切成果及为此所付出的一切代价将化为乌有。

1945 年 5 月 9 日，德国宣布无条件的投降，丘吉尔偕夫人一起发表演说：“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英国和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我们一起走过了遭受一切牺牲和苦难的幽谷之后，也应本着忠实友谊和相互同情的愿望共同走在胜利和平的阳光大道上。”

但是，丘吉尔的行动则是另外一回事。

丘吉尔要让斯大林明白，“能给他什么，不能给他什么。”

1945 年 5 月 9 日午夜 0 时 43 分，在柏林东郊卡尔斯霍斯特装饰着英、美、苏、法四国国旗的原工程兵学校一座二层楼的饭厅里，前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前海军总司令

弗里德堡上将和空军上将施通普夫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投降书共有9份，出席并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有：代表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朱可夫元帅，代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英国阿瑟·特德空军元帅。

投降书宣布："我们，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全部陆、海、空军以及现时仍在德国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朱可夫宣布："投降书业已签署并从即日起生效。"

中欧时间23时整，欧洲的最后炮声停止了。

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以民主力量的辉煌胜利在欧洲结束了。

当消息传到伦敦时，伦敦人民欢呼雀跃，他们在饱经了战争的忧患和困苦之后，终于盼得了安宁、和平的生活。希特勒的灾祸已消失在"光荣"的烈焰中了，可怕的刽子手终于获得了

自我毁灭的可耻下场。

然而，在这胜利、欢腾的画面背后，“前途”问题却使丘吉尔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这个和平，不是他想象的“和平”，这个和平他控制不了，这个和平将不受西方国家操纵，更不用说由西方国家决定了。战争得以结束的胜利方式，彻底地改变了丘吉尔所设想的“和平”的模式。

“构成三大盟国之间主要纽带的共同危险，已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在丘吉尔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丘吉尔估量了他称之为“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决定了他的新政策。“新敌就是昨天光荣的盟国”。必须发扬反对纳粹敌人的那种劲头，去对付今天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敌人是半斤对八两。此外，这场新的斗争也是为了保卫“民主”而进行的，这就使其具备了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性质。

在丘吉尔看来，这场新的对抗，可以在同斯大林一起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上来进行。

由于苏联以伟大的胜利者的姿态参加了雅尔塔会议，所以伦敦和华盛顿认为，雅尔塔宣言对俄国人太有利了。一方面，在会议期间，红军在德国的东部发起了进攻；另一方面，在雅尔塔

会议上，罗斯福的眼睛更多地是盯着日本，他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迅速结束战争。如果将来和平会议的辩论基础是雅尔塔协定，那么西方国家的事业可以被看作完蛋了。因此，必须在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举行一次新的三国会议，以推翻雅尔塔会议的决议。这样，英、美就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得以用另一种语气同俄国人对话了。

杜鲁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声称："很自然，在罗斯福死后，必须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建立新的关系。为此，我必须会见这两位政府首脑。"

最先主张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并为会议的召开而全力奋斗的人是温斯顿·丘吉尔。唯独他一个人对这次会议有一个清晰和明确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威望问题，而是要扭转德国投降后新形成的局面。在他的思想中，这次新的会议将是斯大林外交上的"滑铁卢战役"（笔者：1915 年 6 月 18 日，英军和普鲁士联军曾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一世。）。如果斯大林不投降，这首次"和平的交锋"将导致一场新的世界性战争，因为西方国家是足够强大的。丘吉尔将这称之为"跟斯大林算帐"。

按照丘吉尔的设想，要召开三国会议，必须

使英、美军队留驻在它们占踞的苏占区的领土上，并且一般来讲，还要求美国军队留在欧洲。没有这张强有力的王牌，对三国会议的发起者来说，召开三国会议就没有意义了——会上，英、美如果不以军事实力作后盾结成共同阵线以对付苏联人的话，那么“跟斯大林算帐”是不可能的。

因此，丘吉尔要跟斯大林“算帐”，必须抢在美国军队离开欧洲之前进行。

丘吉尔希望在参加三国会议之前会晤杜鲁门，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同他在所有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其中的道理不言而明：他想建立对付苏联人的英、美统一战线。因为在会议上不是要同斯大林进行什么讨论，而是要把他逼到墙脚下，把两个西方盟国的观点强加给他。

由于丘吉尔十分清楚，实现这个统一战线困难重重，所以他坚持非同杜鲁门单独会面不可。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是，“我知道华盛顿提防着英国的‘野心’”，认为这可能“在欧洲掘成一条新的鸿沟”，这就是，美国“必须谨防自己被引向对苏俄采取敌视态度”的道路。另外，更主要的是，必须“集中美国所有的力量去反对日

本”。

1945年5月6日，丘吉尔打电报给杜鲁门，向他建议同斯大林一起尽早开一次三国会议。电报中说：“我们应该十分严肃地研究一下我们对苏联的态度，让斯大林明白，‘我们能给他什么，不能给他什么。’”

5月11日，丘吉尔再次打电话给杜鲁门，他坚持由英、美联合或者分别同时“向斯大林发出邀请”。另外，他强调，会议应在6月份举行，地点不要确定在“俄国人现在的军事占领区内”。他的理由是，“已经两次了，都是我们去见他。”“这是个威信问题”。（杜鲁门对此有同感。）

在电报中，他对英国7月份将举行的大选结果表示乐观，并说：“随后，我们可以前往德国赴约，以便进行事关世界当今前途的重大讨论。”“因此，我恳切地邀请您到这里（伦敦）来，英王陛下将为此向您发出最热诚的邀请。然后我们一同出发去会晤约瑟夫大叔，到俄国占领区以外最能吸引他前往的最适宜的地点去会见他。”在电报中，他再次谈到了他的一贯主张：“在此之前，我殷切地希望美国的战线不要后退到我们目前占领的战术战线以内。”他反复地

说："最严重的事件将在未来的两个月内决定。"

对于丘吉尔这份恳切感人的电报，杜鲁门总统竟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不是不明白丘吉尔的意思，而是故意不反驳英国首相的话，以免卷入同他的争论之中去。于是，他轻描淡写地作了答复：我更希望由斯大林提出开会的建议。

丘吉尔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5月12日他又向杜鲁门发动了"新的攻势"。这一天，他给杜鲁门总统发了一封电报，在其中第一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词——"铁幕"，后来这封电报被称为"铁幕"电报。

丘吉尔在电报中说："一道铁幕在边界上（俄国的边界）落下来了。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很可能，从吕贝克、的里雅斯特到科孚岛线以东的整个地区，不久将完全落入他们的手中。"此外，还应加上苏占区的"大片领土"，这些地方现在由英、美军队占领着，即将根据战时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还给俄国人。"然后，铁幕将重新（降得）低低的，可能直抵地面。这样，正当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注意力"集中于逞罚德国"的时候，"俄国是可以无忧无虑地向前推进的，如果他们愿意干的话，可以直抵北海海

滨和大西洋沿岸”。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丘吉尔认为“现在同俄国达成一项谅解，或者看清楚英、美的处境，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所谓“现在”，意味着“在致命地削弱”西方军队之前，或“把它们撤出苏占区的领土”之前。而唯有亲自会见斯大林，才有可能使西方国家达到目的。

应该指出，使丘吉尔“忧虑”的，并非是“苏联的威胁”，而是驻欧美国军事力量的消失，因为没有美国的军事力量，丘吉尔就无法推行他的挑衅性政策，即无法彻底推翻由盟国的胜利所造成的局面。根据丘吉尔的意见，这种局面完全不利于西方国家。

可是，美国人不相信什么“苏联的威胁”，他们准备离开欧洲，这就更增加了丘吉尔的忧虑。

杜鲁门对丘吉尔的“铁幕说”并没有作出响应，甚至还表现出宁愿准备先同斯大林会晤。他是本着另一种精神考虑会上的讨论的。甚至在没有考虑召开这次会议之前，他就想会晤斯大林和丘吉尔，以便就德国投降以后和罗斯福逝世以后的局势交换看法。正是出于这一种想法，他才决定将霍浦金斯（原罗斯福的首席顾问，杜

鲁门又留用之）和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派往莫斯科和伦敦。

丘吉尔期待于这次会议的是跟斯大林“算帐”，他希望斯大林会投降；斯大林要是不投降，他就考虑同苏联兵戈相见。在这两种可能性之中，他认为第一种不大可能，第二种是毫无意义的。

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未知数在于美国的态度。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他所设想的跟斯大林“算帐”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才坚持不懈地努力，以便获得杜鲁门的无保留的支持。

这也正是丘吉尔的悲剧所在——杜鲁门总统态度犹豫，持有保留。美国人的不信任破坏了丘吉尔的努力。对于丘吉尔的动机，华盛顿看得十分清楚，可谓“洞若观火”。华盛顿深信，丘吉尔在走向战争，并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把美国拖进去。

在新的三国会议上，杜鲁门想的却是，首先要同斯大林进行某种“直率”的讨论，其性质不是要跟斯大林“算帐”，不久前在华盛顿的“极端分子”头脑中产生的“核讹诈”思想，在未来

的会议上将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对日作战问题压倒了其他一切考虑。

正当美国总统准备在“三大国”会议之前同斯大林进行一场预备性对话时，丘吉尔却发出了一阵“战争的呼声”，这是西方社会所有与丘吉尔“志同道和”的人的共同的呼声。

丘吉尔选择在 1945 年 5 月 13 日——纳粹德国投降之际，通过电台发表致英国人民文告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还需继续努力，确保我们为之战斗过的简单而光荣的目标，在胜利后的岁月中不致被粗暴地抛弃或置之脑后，自由、民主、解放这些字眼不致遭到歪曲，并将保持我们赋予它们的真正的含义。”

丘吉尔在这里进行史无前例的夸大其词的宣传：“战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英国曾经为之而战的目标尚未达到；这些目标始终是自由、民主、解放；这些并非笼统的字眼，因为即使自由和民主只是表达愿望，解放却意味着一项积极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和有道理的，因为需要解放的国家正忍受着它们在德国入侵时所忍受过的同样的制度。”

在丘吉尔看来，苏盟和纳粹德国之间毫无两样，需要把战争打下去，英国始终是为这一事业而战斗。

丘吉尔公开承认："在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替代了纳粹敌人的威胁。"1945年5月18日，他在同苏联驻伦敦大使Φ·T·古谢夫谈话时说：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就三国继续合作达成协议；要么英、美结盟与苏维埃世界相抗衡。"

而实际上，丘吉尔已经开始按照这一方针行动了。他先是在5月9日胜利日的当天致电在法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要他保存德国的装备，尤其是飞机，因为说不定哪一天，甚至就在现在我们会急需这些东西。不言而喻，丘吉尔要飞机和大炮的目的是同苏联作战。之后，就在他会见古谢夫大使的前一天，丘吉尔命令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航空大臣和空军参谋长，"暂停削减轰炸航空兵"，禁止"销毁英国控制下的德国飞机"。在战胜纳粹德国后的头几天就下这样的命令，丘吉尔的意图实在再明显不过了——从"实力地位"出发同斯大林谈判，并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给他。

丘吉尔与斯大林不共戴天，当他开始谈论苏联时，就勃然大怒。斯大林也采取了攻势，咄咄逼人

1945年5月2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的两个特使即将动身，哈利·霍普金斯赴莫斯科，约瑟夫·戴维斯去伦敦。杜鲁门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会议做准备，也是为了摸清楚斯大林和丘吉尔关于美苏关系的现状和英美关系的现状的确切想法。

约瑟夫·戴维斯遇到的是一位与斯大林不共戴天的人物，这个人为了摆脱苏联人而甘愿冒一切风险。面对这样一位人物，戴维斯感到要完成总统交给的使命是很困难的，因为戴维斯甚至没有机会与他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三国会议的问题。

5月31日，戴维斯返回华盛顿后，向杜鲁门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汇报了他与丘吉尔从5月26日至29日举行的三次会谈的情况。

戴维斯开门见山地开始了谈话，他说："苏

英关系以及同美国关系的恶化使总统深为关切，总统深信如果不能保持三大国的团结，就不会有任何合情合理的和平的前景”。这样，美国人把造成这种形势的责任直接地归咎于英国政府首脑，他们毁灭了丘吉尔期望美国同他的政策进行合作的任何希望。

戴维斯还对丘吉尔说：“总统相信，当前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胜利后的和平。他认为，赢得了战争的三国的责任是，努力保持荣誉，解决彼此间的困难，通过它们的团结来缔造一个公正的、持久的和平。”

杜鲁门总统的使者极力使丘吉尔这个危险的人物恢复理智。因为杜鲁门总统描绘令人忧虑的形势的方式和提请英国首相注意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表明，总统直接了当地把这种局面的责任归咎于英国首相。对于能证明丘吉尔不无道理的“苏联的威胁”，对于英、美应该共同对付的“苏联的威胁”，在戴维斯以总统的名义宣读的文件里丝毫没有提及。

总之，戴维斯所言使丘吉尔明白了杜鲁门的“真实底细”——在总统看来，“局势的恶化”首先是由丘吉尔的政策所造成的，总统的

“保卫和平”的呼吁，纯粹是向丘吉尔发生的，因为正是丘吉尔把和平置于危险之中的。

5月27日，杜鲁门总统收到了丘吉尔首相的照会，照会颇长，算作是对总统特使讲话的答复。这时，杜鲁门还没有接到戴维斯的报告。

这份照会表明，女王陛下的首相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但又表明这个人仍然决心进行最后的努力，争取美国总统支持他的事业。

戴维斯的谈话给丘吉尔的第一个刺激是，杜鲁门想要在三国会议之前单独会晤斯大林。这对丘吉尔来说，这简直是难以忍受的过分。前面谈到过，丘吉尔曾是多么恳切地、真诚地要求在三国会议之前，举行英、美首脑的单独会晤！如果说，杜鲁门总统拒绝这一次会晤使丘吉尔颇感忧虑和遗憾的话，那么首相居然要会见斯大林这一意向则使丘吉尔感到人格的被污辱和伤害。

在丘吉尔看来，杜鲁门这次实在是太过火了。于是，他断然拒绝出席他积极首倡的会议。丘吉尔认为，如果面对杜鲁门这种嚣张不作任何反击，并保持沉默的话，无疑是对大不列颠和

大不列颠各民族的帝国在国际形象上的一个最大的败坏。

使丘吉尔感到愤怒的是：第一，杜鲁门总统不加任何区别地对待英国和苏联；第二，美利坚准备和苏联协调意见，而把英国撇在一边；第三，杜鲁门愿意、甚至决心在三国会议前会晤斯大林；（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提出在另一个会议上单独会见斯大林，我最大的希望是同斯大林和丘吉尔共同坐在一张会议桌旁。"但是，丘吉尔却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肯定，就在他同戴维斯的首次会谈中，他得知了这个"关键点"："杜鲁门总统考虑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单独地会见斯大林。"）第四，美国总统不同意、并在实际上谴责英国政府首脑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把西方国家和俄国的紧张局势归咎于这一政策，把它斥为对和平的危险；第五，美国拒绝了他为推行这一政策而提出的结成英、美反苏共同阵线的主张。

丘吉尔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接受"对英国来说"似乎是耻辱的事情，即使这是无意的也罢"，而英国"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

忠心耿耿地为自由事业而效劳”。他尤其不能“听任这种说法成立，默默地接受也不行，说什么同苏联之间的新的困难纯粹是英、俄两家的事情”。同英国一样，美国也是“有关系、有牵连的”。

在给杜鲁门总统的照会中，丘吉尔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心情——“首相不能轻意地甘心接受如下的认识，即认为对于美国来说，英国和苏俄并非他物，不过是应等量齐观的两个外国；对待它们，应该努力使它们消除最近的战争所带来的困难因素。”

他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概括了他的政治学说的本质：“若不考虑暴力问题，善于恶之间根本谈不上平等。英国和美国为之浴血奋斗并获得胜利的伟大事业和伟大原则，不能简单地降低为一个力量的平衡问题。事实上，世界的安危皆系于此。”

从中可以看出，丘吉尔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过了力量平衡这一神圣原则，而英国正是根据这一原则统治欧洲达数百年之久。丘吉尔的新原则是所谓“善”与“恶”的原则，把世界一分为二，“恶”的代表就是红色俄国，因此，红色

俄国应为整个人类所鄙视。这已不再是一场政治斗争或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场斗争被推到一个更高级的领域——“道义的”和“宗教的”领域——“神圣的”领域，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一切都是合理的，无论采取什么策略，无论采取什么手段。

当丘吉尔开始谈论苏联时，他“就勃然大怒，放肆地进行最猛烈地抨击”。他对于美军撤离欧洲后可能出现的事情怀有恐惧之感，在他看来。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美军的撤离将把“精疲力竭的欧洲置于红军和共产主义的摆布之下”。

戴维斯通过与丘吉尔的会谈得出如下的结论：丘吉尔“更关心保卫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不关心保障和平”。

在谈到对丘吉尔的印象时，戴维斯说：“在听到他如此猛烈地谴责苏联统治的威胁、谴责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后，在听到他表示对苏联领导人的政见声明如此缺乏信心后，我不禁怀疑他是否准备向全世界宣布，首相和英国人民由于没有支持希特勒而犯了错误。因为，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他现在阐述的理论，就是希

特勒和戈培尔在过去四年中，为了拆散盟国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而不断宣布和重申的理论。

1945年6月5日对于丘吉尔来说是个倒霉的日子，这一天，四个驻德盟军的军事指挥官在柏林聚会，签署了著名的声明，四位指挥官对立即撤出这些部队达成了协议，从而决定了苏占区的英、美军队的命运。

丘吉尔当天给杜鲁门发了一份电报，承认他在英军军队留驻苏占区问题上的进行的激烈战斗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说："我怀着深深的忧虑来展望美国军队向中部地区我们的占领线收缩，这种收缩将使苏联的权力扩展到德国的中西地带，使得在我们同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垂下一道铁幕。"

他认为"这种撤退，倘若必须实行的话，也需要与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相配合，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构成世界和平的真正基础。"这就是说，英、美在撤退它们的军队之前，应借助于这些军队的压力，按照丘吉尔所描绘的"世界和平"的形象，在会上解决一切问题。

丘吉尔电报的结束语是——"然而任何真正重大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你我两

人将对未来承担某种巨大的责任。”这既是对杜鲁门的指责，又是对杜鲁门的警告。

根据6月5日声明所建立起来的盟国监督委员会，按规定应在各个战区履行它的职责，这样，英、美军队必须立即撤出苏占区。

虽然丘吉尔准备无视同斯大林签订的各个协议，杜鲁门却希望予以遵守。总统于6月12日致电丘吉尔答复其6月5日的来电：这些协定是罗斯福同未来的总统、当时的副总统“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深入的讨论”之后同意的；所以现在的总统“无法推迟美国军队撤出苏占区的日期，来加速其他问题的解决。”而且也必须考虑俄国人的反应。

6月15日，杜鲁门将美军撤出苏占区的消息电告了丘吉尔。虽然，这早已在丘吉尔的意料之中，但他仍感到胸中“犹如丧钟在振动”。“我只能屈服”，他怀着可以想象得出的痛苦心情无可奈何地说。同一天，他打电报给杜鲁门，说他“显然只有”“遵循”杜鲁门和斯大林作出的“决定”，并说将给英国各个方面“下达必要的指示”。他所能做的现在只剩下“最后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的决定能为在欧洲建立一种持

久的和平作出贡献。”

6月16日，他又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他刚刚读到杜鲁门给莫斯科的关于撤退美军的电报抄件，他宣布他“也准备向蒙哥马利元帅下达指示，让他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便把英国军队同美国军队同时撤到德国的英占区”。

1945年7月1日，美、英部队开始撤出苏占区，丘吉尔以悲凉的语言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失望——“苏俄在欧洲的心脏安家落户了。这对人类是个不祥的事件。”

总的说，丘吉尔的失败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段日子，他没有一件事是称心如意的，先是美国人撤走了他们的军队，迫使英国人也不得不步其后尘；之后是，三大国会议召开的日期也没有按丘吉尔的建议执行。

在丘吉尔的眼中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有多么重要，他坚持尽快召开这一会议的愿望是多么迫切。

在他的思想里，召开会议的日期问题，同将在会上讨论的问题以及举行会议的条件，具有同等重要性。在5月27日的照会中，他强调指出：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并且平等地邀请三个大

国。

丘吉尔认为，杜鲁门总统会以一种善意的、理解的心情来收阅这份照会，然而杜鲁门却让丘吉尔大失所望，尤其在召开会议的日期上。

事实上，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由霍普金斯和斯大林在5月26日第一次会谈时决定的。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缴械投降。5月29日，他致电斯大林，一方面说对能会见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感到“很高兴”，另一方面又强调说“尽早举行”——他已定好于6月15日召开会议。

然而，这件事由不得他了。

6月1日，杜鲁门通知他，会议于7月15日在柏林举行。

这对丘吉尔来说，的确是糟透了。会议地点选在苏占区还勉强能接受，可会议日期要拖后真是太让他沮丧了。

然而，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徒劳的。

后来得知，杜鲁门把会期定在7月15日这一天不是偶然的。杜鲁门和丘吉尔一样，在对苏关系上力图推行“实力地位”政策，原来他已经下令不晚于7月15日进行历史上首次原子弹

试验，同时他已同伦敦共同作出了决定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然而，丘吉尔对此却一无所知。在丘吉尔的政治算盘内，没有将西方的“新式武器”列入其中，但对于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的进展，他是知情的。毫无疑问，如果他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经临近这件事稍有些把握的话，他就会反其道而行之，竭尽全力去争取会议延期而不是提前召开，以便让英、美能利用这一张巨大的王牌。

1945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17 时整，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柏林（波茨坦）的会议在西席林—霍夫宫的中心大厅的一张大圆桌旁召开了。

就在波茨坦会议开幕的同一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的秘密靶场上，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从 33 米高的金属塔顶上爆炸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随着一团蘑菇状烟云腾空而起，天空中像有无数个太阳同时发出了耀眼的强光，巨大的爆炸力把一英里半径内的一切炸得荡然无存。

当天，一封只有 6 个字的密码电报被送到

已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手中，电报上写道："婴儿顺利降生。"

与此同时，已在伦敦的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来到丘吉尔的住处，把一份"婴儿顺利降生"的通知交给英国首相，并向他做了简要的解释：原子弹已经研制成功，"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的代号）告捷。

然而，"曼哈顿计划"生产的不是无辜的"婴儿"，而是"大棒"，一种具有无比破坏力的"大棒"。杜鲁门在这之前就夸下海口："如果原子弹像我预料的那样爆炸成功，我就有了对付俄国壮汉的大棒了。"

当新墨西哥州的爆炸声传到丘吉尔耳朵里时，他立即体会到这一新式武器所具有的巨大的政治意义。他曾为失去了他的强有力的"王牌"——英、美军队留在苏占区——而感到绝望，可是现在，这种令人可怕的、从未看见过的、从未想象过的武器却把一张格外可怕的"王牌"送给了西方。

让丘吉尔尤感重要的是，原子弹的出现使得苏联的援助在对日作战中失去了作用，而为了得到这种援助，美国在苏联的面前失去了行

动的自由，致使丘吉尔争取杜鲁门的努力化为乌有。现在，在丘吉尔看来，刚刚问世的原子弹，不仅是迅速结束世界大战（对日作战）的一个手段，可能还是"结束许多其他事情的手段"。

所谓"其他事情"，是指结束战争时的苏联的实力，但在新式武器面前，这种实力突然被解除了武装。丘吉尔衡量着这种突然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现在可以自由地以另一种语气同苏联说话了，因为他们凭实力出现在会场上。

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表述了他的思想："我们不再需要俄国人了。结束对日战争已不再靠苏联军队参加最后的和持久的大屠杀了。已经没有必要请求他们的恩典了。"

"重大消息"传出以后不久，丘吉尔写信给艾登说："很清楚，美国人已不再希望看到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

欧洲方面，他期待出现其他令人兴高采烈的事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因此，所有引人注目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根据它们的实质和按照联合国的根本原则予以解决了。"这就是说，"我们好象是突然掌握了一种手段，因而可以大发慈悲地缩小东方的大屠杀。"当然，原子弹这种

“手段”，也“在欧洲开辟了更为重要的前景”。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早已指出：“新式武器将结束世界战争和许多其他事情。”

从这时起，丘吉尔就不再怀疑——原子弹使他产生的“思想”也占据了美国人的头脑。

确实，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在对于新式武器的出现所造成的形势的评价上，看法完全一致。这种新式武器的使用，是从政治观点的角度予以考虑的。丘吉尔的思想与华盛顿的主导思想可谓“异口同声”。

使英、美两国领导集团感到不能确定的是——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还是让原子弹在美国沙漠地带爆炸作为对日本的可怕的警告，以使日本立即停止战争。

丘吉尔个人对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结论，他“甚至根本就没有产生过”这个问题，“对日本应该用原子弹”——是他急不可待的。“从7月4日起，即在实际爆炸之前”，他就以英国首相的身份，表示了赞同。

他用“人道”的理由为自己的“急不可待”进行辩护，但结果却成了为使用原子弹而辩护：“阻止一场巨大的、没完没了的屠杀”，“结

束战争，为世界带来和平，用温存的双手去轻轻抚摸饱尝苦难的各国人民的伤口，这一切今天只需以几次爆炸为代价，显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能做到。这在我们饱受折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显得是一种奇迹式的解脱之法……”

但是，历史不是任何个人的“辩词”所能改变的。原子弹的使用，实际上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日战争只是被当作一种借口罢了。实际上，对日战争已基本结束，苏联红军的干预可以迅速使战争告终。丘吉尔在回忆录中，以明白无误的方式否定了对使用原子弹所作的辩解：

“相信日本的命运是由原子弹决定的，那就错了。在第一颗原子弹落下之前，它是失败已成定局。这是由于（美国）海军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使得美国攻占了太平洋上的基地，并将从这些基地出发发动最后的攻击，这种局面应当迫使宗主国（日本）的军队无条件投降。”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始终坚持说使用原子弹是为了结束对日战争，但是除他以外，所有对原子弹的制造和第一次试验成功作出贡献的人，都不同意杜鲁门的说法，他们完全明白原子弹的使用在政治上产生的令人生畏的后果。

杜鲁门和丘吉尔都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次使用原子弹的秘密。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承认，斯大林“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是个出色的盟友”。所以，“应该把左右全局的伟大的新事件通知他”。但这不过是作为一条消息告诉他而已。

要对斯大林产生威慑作用，就必须以突然的方式透露出存在着新式武器。按照丘吉尔的说法，这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是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斯大林，还是等待会议结束时再告诉他。若马上告诉他，告诉的方式的确很难选择；若等到会议结束时再告诉他，英、美就会在会议上失去一张有力的“王牌”，失去向俄国人施加不可抗拒的压力的机会。

从丘吉尔为战时内阁起草的一份备忘录来看，杜鲁门“好象决心要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斯大林），但对选择什么时间犹豫不决，认为最好是等到会议结束”。丘吉尔想的则相反，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心把此事告诉斯大林，最好是以试验作借口”。否则，当原子弹已被投放再告诉他，“就难以答复斯大林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呢？”

对于急于求成的丘吉尔，理由可以顺手拈

来。最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对透露消息的方式进行精心策划，以期获得最可靠的效果。杜鲁门最后决定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

7月21日全体会议结束后，人们刚刚离开会议桌准备走散时，杜鲁门同斯大林以及他们的两名翻译一起退到会议室唯一的大窗子旁边。

丘吉尔知道总统要说什么。“要紧的是看看斯大林作出反应的方式”。无疑，他期待着看到斯大林变得脸色苍白，在可怕的消息打击下，在“今后将左右局势的伟大的新事件”打击下，精神会垮下来。

但丘吉尔看到的却是，“斯大林显得十分高兴”。斯大林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无比？十分可能对整个对日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多走运！”当丘吉尔看到斯大林这种反应后，便断定，斯大林压根儿没领会人们向他透露的事情的重要性。丘吉尔说：“显然，原子弹根本没有在他（斯大林）的心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如果他对于这一宣布将列入世界大事有某种预感的话，他的反应是会被察觉到的。”

但是，新式武器的出现对于波茨坦会议以及“世界事务”并不因此而不构成巨大压力。

原子弹的出现拉开了“原子外交”、“原子讹诈”的序幕，它给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已出现端倪的“冷战”提供了重要手段。

1945年7月23日，从美国传出信息说：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在8月初使用，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迫使日本停止战争，倒不如英国布莱克特教授所说，是为了“对俄国发动一场外交冷战”。使用原子弹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它是对苏联实行“冷战”的最初步骤之一。1945年6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与原子能专家谈话时实际上已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原子弹“可能使俄国在欧洲变得更通情达理一些”。

英、美两国都希望，掌握了原子武器就可以使他们对苏联实行强权政策，用丘吉尔的话说，就能在三国会议以及今后的岁月中恢复“外交平衡”。

丘吉尔想同斯大林闹翻

波茨坦会议在经历了曲折反复后终于召开了，但这是在违背丘吉尔意志的条件下召开的，然而美国人的原子弹的问世，给本来心情已是极糟的丘吉尔一个意外的惊喜。丘吉尔现在心满意足了，他完全有可能达到他政策的目标了。

在失去英、美在苏占区的驻军这张"硬牌"后，丘吉尔作梦也想不到他手中又获得了一张可以跟斯大林"算帐"的"王牌"。

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的会议将成为他的胜利的标志。

在波茨坦，丘吉尔和杜鲁门同斯大林之间存在着分歧。无论是在全体会议上还是在外交部长每天的例会上，"都没有能够消除这些分歧"。他们之间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分歧中，最主要的是被丘吉尔称之为"可怕的波兰边界问题"。

在波茨坦会议上，就波兰问题，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丘吉尔试图修改关于波兰北部和西部边界

的雅尔塔决定，特别是他想违背克里木通过的决议，反对“波兰北部和西部领土的明显增加”，反对以西尼斯河（包括斯维内明德和什切青在内）为走向的边界。

丘吉尔没有遵守早在1944年英国政府就波兰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1944年11月2日，当时担任英国常务副外交大臣的A·卡多甘致驻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外长罗默的信函就是这些决议的证据。这封信说明了苏联、波兰和英国的外交谈判部分内容。

丘吉尔责成卡多甘告知罗默——在有关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英国政府坚持波兰应该有权“将波兰边界沿奥得河一线，包括什切青港向前推进”的意见。英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准备“确保新波兰的独立和不受侵犯”。英国甚至准备在美国政府不支持波兰关于新边界和国家独立要求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但是，丘吉尔在波茨坦坚持将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推迟。

当斯大林单方面决定把奥得——尼斯线定为波兰西部的边界时，丘吉尔立即声明：“我从未承认过这条边界。”“可怕的波兰问题”产生

了。

早已决心进行会议大战的丘吉尔，准备承担同苏联发生公开冲突的责任。丘吉尔公开承认：如果选民再次批准对我的委任，这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丘吉尔对此十分自信），我的意图是，就这条（奥得——尼斯）分界线，同斯大林闹翻。

如果他在华沙建立起一个合他心意的政府，这一“可怕的问题”就根本不会存在，整个“波兰问题”的形势就截然不同。波兰就会成为已在孕育之中的未来的“西方集团”的一部分，它的任何要求都不会被拒绝。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把白俄罗斯划归了波兰。丘吉尔会以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承受了巨大牺牲为由，来为波兰新的东部边界辩护，而且这块领土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人种上看，都是属于波兰的。

由于苏联代表团的坚持，以博莱斯拉夫·贝鲁特总统为首的波兰民族统一战线临时政府的代表应邀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他们为波兰人民对各个时期德国侵略者占领并使之变为德国帝国主义基地的波兰西部领土的合法权利提供

了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的根据。

7月25日晨，丘吉尔会见贝鲁特总统时，不安地问道："波兰是否打算转向共产主义？"贝鲁特回答说："波兰想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并向它学习。"贝鲁特进一步阐明：如果英国现在对波兰的要求不表现出理解，那么英国当初为波兰而参战是犯了大错误。

看来，华沙已从丘吉尔手中滑掉了，波兰已建立起一个红色政府，丘吉尔于是感到波兰人的要求"太过分"了，他对波兰不再有兴趣了。今后他的兴趣就转向德国这个明天的"盟国"了。一想到战后的波兰既得到扩大，又成为苏联的朋友，丘吉尔就愤愤不平。他说："有许多问题可以提出来同苏联和波兰相对抗。波兰人得到了大片的德国领土，所以他们已十分明显地变成了由它（苏联政府）控制的热情的木偶。"

丘吉尔是唯一如此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的人，也是唯一主张把这个问题搞到底不惜闹出极端结果的人。"这不过是一个同斯大林闹翻"的借口。因为，当丘吉尔希望召开他设想的会议，以便同斯大林"算帐"的时候，"可怕的波兰问题"还不存在，斯大林还没有提起这个问

题。

所以，在波兰问题上，谈不到英国政策的“连续性”问题。丘吉尔一开始推行的、到波茨坦会议上继续推行的政策，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

这就是说，如果丘吉尔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项政策就会停止。

历史实际上就是沿着这个轨迹发展的。

波茨坦会议召开前夕，这是英帝国大选的前夜。作为竞选者之一的丘吉尔，与其他的竞争者不同，表现得格外镇定、自信，他毫不担心他的光荣业绩对他竞选成功的保障系数。

丘吉尔这次的竞选策略是，用极权主义来恐吓选民。保守党的刊物声称：“当盖世太保刚刚从惊魂未定的德国人民心中消失不久之后，难道你们赞成用其他名称伪装的盖世太保闯进你们的家中吗?”

一位名叫弗吉尼娅·库斯的女士曾谈到，她于6月5日在报业大王罗得米勋爵家中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丘吉尔的演说。她回忆说，当丘吉尔的演说结束后，房屋内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说话，最后主人打破了沉默：“如果他继续保持

这种思想状态，可以预料，选举将失败。”

丘吉尔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声望和治国才略，以致很难使他认识到他所采取的路线是错误的。

丘吉尔也没有把握住英伦三岛人民的情绪，他的活动脱离了人民，选民们对此都有看法。丘吉尔夫人曾对莫兰勋爵说："温斯顿经常带着有色眼睛看世界……他一点不了解普顿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

丘吉尔在竞选宣传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他同他的竞选班子一起乘车进行竞选旅行。经常走在车队前面的是保守党的宣传车，高音喇叭里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注意第三辆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城市和村镇的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

然而，对于选民们来讲，战争的胜利已是昨天的事，他们关心的是将来。他们痛恨战争，也惧怕战争，他们对来之不易的和平格外珍惜，希

望选出维护和平的人来代表他们讲话。

选民们不相信丘吉尔是这样的人。

保守党竞选运动的组织者很快就发现了反对苏联将引起选民们的反感。因此，丘吉尔和他的同事们一方面攻击工党是社会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又力图使选民们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保守党坚持同苏联结盟的。而且特别强调，丘吉尔似乎是斯大林最好的朋友。

保守党在选举活动中把主要力量放在批评自己的政策上，他们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纲领。他们以为在选举中利用自己领袖的照片和个人威望就可在大选中获胜。

令人注目的是，许多选民已看到了工党和社会主义苏联似乎有某些一致性。红军在东线的胜利，证明与保守党的主张相反，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带来了利益。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为，管理英国的经济和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国家干预。

工党的领导集团在1945年的大选中似乎体察到了这种民情，他们提出了迎合选民情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他们向选民许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内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

社会保险制度，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他们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英、美、苏三国联盟。

两党在选举中的作风也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明显地有利于工党。丘吉尔坐专车到全国各地竞选，工党领袖艾德礼则和妻子乘一辆旧汽车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艾德礼为人谦和，作风沉着、稳健，他的演说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而丘吉尔做事一向放肆、傲慢，又自命不凡，讲起话来也是华丽词藻连篇，且不说选民对其演说内容的反感了。这样，艾德礼和丘吉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选民们对工党的印象好起来。

在波茨坦会议闭幕之前，7月25日，丘吉尔偕女儿玛丽飞回伦敦。因为第二天将公布英国议会选举结果。三国首脑会议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决定暂停几天。

丘吉尔离开波茨坦时声明说，他相信自己是会回来的。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把行李留在了柏林，他以为过一两天就将和丘吉尔一起回来。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的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

但实际情况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没能真正了解1945年春季英国选民们的思想情绪，工党在下院得到393席，保守党及其追随者共得到213席。

这对丘吉尔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打击。在7月26日那个倒霉的午宴上，丘吉尔得知选举结果后，悲痛万分。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女儿看到父亲这般痛苦，流出了眼泪。

英国人民赞美和感激他，因为他领导了反对德国纳粹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不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

丘吉尔的后路断了，他不必再返回波茨坦了，他不得不中途离开这一他所希望的、并且有决心有能力按照他的愿望开到最后结束的会议。一个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阻止了他完成他的任务，大选中的失利使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丘吉尔在抱怨说："大选的结果把这些谈判（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争论）割成前后两段，并使其过早地结束了。"前往波茨坦的新政府的部长们没有经过"任何认真的准备"。

如果丘吉尔回到波茨坦，无疑会按着他的计划，在会上同斯大林"算帐"，即使在需要时同苏联决裂，"也不接受把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以西的一寸领土让给波兰"。

不列颠的人民及时地剥夺了丘吉尔铤而走险的权利，从而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

新首相艾德礼建议丘吉尔同他一起参加波茨坦会议，就象他以往那样。丘吉尔拒绝了，他是绝不肯作为普通代表团成员返回机场的。

第五章　唐宁街的眼泪

“听着，你这个美国佬的混血儿！”一位愤怒的议员骂道，丘吉尔却洋洋自得，他认为这不是侮辱，而是恭维

丘吉尔的母亲是位美貌、多才的美国妇人，她所爱好的是穿着、社交、出风头和金钱。但温斯顿却深深地被母亲的美貌和聪慧所吸引，即使手头拮据得难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时（丘吉尔年轻时，有一段日子并不富裕），他也要竭力凑足一些钱，来使自己的母亲过奢侈生活。

丘吉尔首先是英国臣民，并对他作为一个英国臣民感到骄傲，而且似乎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是典型的英国人。

但是，他深爱着的母亲的血统与美国有密切的联系，他一生对美国总怀有一种深厚的感

情。

有一次，一位愤怒的议员骂丘吉尔："听着，你这个美国佬的混血儿！"没想到，丘吉尔听了以后，不仅一点儿也没急，反而显出一付颇为洋洋自得的样子，他认为这不是污辱，而是恭维。

当美国辛辛那提同乡会要授予丘吉尔会员资格时，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同乡会是丘吉尔的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所心爱的。

丘吉尔在逝世时享有独一无二的荣誉：既是英国臣民，又是美国公民。

当初，提出要授予丘吉尔美国公民称号（这是美国可以授予他的最高荣誉）时，他产生了误解：他以为这样做的意图是迫使他改变国籍，所以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说："我是一个英国臣民，我愿作为一个英国臣民死去。"在美国表明了真正的和感人的意图后，他欣然接受了这个荣誉。这种欣喜是提出这个计划的人们想要给予他的。遗憾的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没能到华盛顿亲自从肯尼迪总统手中接受这个公民称号。

丘吉尔的特性中没有什么触犯美国人的地方。他的口齿不清的、语调很重的英语吸引了美

国人，而且他还能毫不费劲儿地理解美国人的想法和意图，即使他并不总是理解这些想法和意图。

美国人也没有触犯他的地方。

虽然丘吉尔常常使用“这些该死的美国佬”这种词，但是他更经常地是带着感情和信心讲到美国人的慷慨、理想主义以及对自由的坚定信心。美国国务院常常受到他的批评，但并不比英国外交部受到的批评多。象他指责他自己的参谋长们一样，他有时也指责美国参谋长们无知和固执，但总的来说，他是作出较大的让步去和美国人妥协的。

丘吉尔信赖美国人，相信美国人。缔造和维护英语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家庭关系，在丘吉尔看来，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美国人的眼里，丘吉尔是个英雄，如同他在英国人眼中是个英雄一样。至少，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丘吉尔是赢得这场战争联盟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下野后的丘吉尔没有把亲友们的劝告——退出政治舞台以便在晚年享受他在战争年代所赢得的荣誉，放在心上，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失败

而永远退出政治舞台，所以他宣布，他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并将继续领导保守党，还准备用他的全部威望去影响西方的政策。

战后初期，西方社会最有特点的现象是，许多政治主张都带有“英国制造”的标记。这些主张的最初鼓吹者便是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丘吉尔已不再是英国首相了，但他的韬略和威望，使他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在英国政界如此，在西方国家也一样。

战争刚刚结束时的华盛顿尚未找到应当遵循的新的道路，一切都尚未决定。人们在混乱中探求，徘徊于新、老思想之间。

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对待苏联这个盟国应采取什么政策和战略的问题上，丘吉尔一直同罗斯福争争吵吵。现在，对丘吉尔来说，重要的是把美国完全争取过来支持他的政策。

在英国，工党领导下的政府政策与丘吉尔任首相时的政策相差无几，尽管工党是以谴责丘吉尔的“战争政策”而赢得选举胜利的。

美国各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反英情绪，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英心理”现在仍然十分

强烈。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日子里，在如何看待战争目的的问题上，美国的“反英主义”变得特别敏感，普遍的呼声是，“美国人不能为了大英帝国去打仗”。

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在英、苏之间继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以防止英、苏间的长期争吵最后发展为一场全面的冲突。

1945 年 10 月 21 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宣布：“美国永远不会同一个欧洲的敌视俄国的国家集团合作。”这些话是在巴黎和会第一次失败之后讲的。国务卿对苏联安全政策的赞许，使这些话更加意味深长：

“我们同情地看待苏联为建立同它的中欧和东欧邻国更加紧密和更加友好的联合所作的努力。我们完全承认从安全角度来看它在这些国家的特殊利益。对于苏联人民决心永远不会允许在这些国家内存在一项蓄意针对苏联安全的政策和苏联人民看问题的方式，我们表示赞赏。”

第二年 2 月，国务卿先生在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美国对联合国及苏联的立场时，非常肯定地说：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能作为各国

人民相互争吵不休的理由。美国"衷心地、满怀喜悦地"欢迎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加入到联合国的大家庭中来。

实际上，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把世界分割成两部分，就表现出美国对战后现状的事实上的承认，因为这是和平的唯一保证。几个"大的盟国"在赢得了对共同敌人的胜利后，意识形态问题使它们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达成"默契"和相互尊重外，是不可能保持团结的。和平只能置于这个基础之上。任何企图改变这种基础的努力，都只会酿成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丘吉尔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同苏联进行公开的冲突，西方应当在"解放"东方"被奴役的人民"的名义下，在美国领导下进行这场战争，因为英国已无力担当起领导的责任。当反德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这些主张便构成了丘吉尔政策的基础。下野后，丘吉尔有可能更自由更公开地继续煽动一场"十字军"计划战争，也可以更好地影响美国公众舆论。

丘吉尔认为，在公众舆论压力下，杜鲁门最终将坚决地向他的政策过渡，"只有对共产主义

的恐惧，才能动员美国人；只有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才能引导美国在世界上采取类似英国的立场。”

1945年底至1946年初，丘吉尔在美国渡过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会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领导人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家。通过这些会见，丘吉尔打算发表世界政策演说，并确定了演说的方针。1946年2月10日丘吉尔和杜鲁门总统商量了演说的基本内容。丘吉尔在佛罗里达州疗养地住了几周，他在这里修改并完成了自己的讲演稿。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一切准备就绪，在杜鲁门总统的陪同下，前往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富尔顿演说”，从而铺垫了“冷战”的基石。

丘吉尔的演说得到了杜鲁门总统以及贝尔纳斯国务卿的赞同。杜鲁门甚至不惜旅行千里把这位演说家推荐给听众。可见，丘吉尔表达的不仅是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是英、美统治集团的纲领。

丘吉尔在演说中宣称，新的战争和暴政的危险直接威胁着世界，这种威胁的根源就是苏

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提出要建立“英语民族之间的兄弟联合。这就是指，不列颠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兄弟的联合不仅要求在我们两个广阔的、亲密无间的社会体系之间不断增长友谊和相互了解，并且要求我们在军事参谋部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研究可能发生的危险，研究武装和条例的标准化，甚至交换技术学院的学生和教官。同时必须保持建立在共同安全基础上的现实条件，即共同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样可以成倍地增加美国的海军和空军的机动性，并且能够……显著节约财政支出……由此，可以制定共同的国际原则，我确信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原则”。

丘吉尔清楚地说明了英美联盟的攻击对象——反对苏联和正在增长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铁幕’已在欧洲大陆放下了，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用一条线把欧洲分开。”后来“铁幕”成为反苏人士的惯用语。

在阐述英美联盟的战略原则时，丘吉尔指出，应用武力来反对苏联，而且要在美国拥有原

子弹而苏联尚未制造出这种武器之前就尽快行动。过去在欧洲大陆上，英国惯用的伎俩是，唆使一个国家去反对另一个国家，丘吉尔改变了英国的传统政策，"力量均衡"已使他力不从心，不列颠王国必须身先士卒了。

丘吉尔声称："我们陈旧的力量均衡政策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实力只占微小的优势。"为此，丘吉尔制定了"实力政策"。他说："根据我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确信他们最欣赏实力。"他建议立即在1946年"同俄国人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全面的相互谅解"——

如果苏联不在实力威胁面前投降，就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

在演讲中，丘吉尔将自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怀有的建立英美世界霸权的思想，表述得淋漓尽致："和俄国的相互谅解"必须以"各英语国家的实力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后盾"，"如果英语民族联邦和美国合在一起，并在海洋、天空、科学和工业领域中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则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将存在不可动摇的优势——我们将沿着不断加强实力的道路前进……如果不列颠王国的全部道

义力量和信心同你们结合在一个兄弟的联合体中，则不仅在我们而且在所有人的面前，不仅在现在而且在整个世纪中，将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

可以肯定，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绝不是个自发的、孤立的现象，它同英国工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同出一辙。

实际上，丘吉尔试图使美国人家喻户晓的，始终是实力政策。他竭力向美国人宣传“战争并没有结束”，还需要把欧洲人从布尔什维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1946年3月6日，英国广播电台B·B·C·在其法语广播中，指明了“富尔顿演说”的深刻含义——丘吉尔谴责的是新的“俄国危险”。

斯大林在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使人不仅想起了希特勒，“希特勒就是从宣扬种族理论开始挑起战争的，他断言只有德语民族才是最优秀的人种。丘吉尔先生也是从种族理论开始来挑动战争，企图证明只有英语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能负责主宰全世界的命运……事实上，丘吉尔先生及其英美朋友们是向非英语民族提出了一个

最后通谍：乖乖地承认我们的霸权，则一切都好，否则就是战争……显然，丘吉尔的方针就是战争的方针，就是号召发动反苏战争。"

1946年3月6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说：任何人也"不能象丘吉尔那样激起美国人的想象力"，"富尔顿演说"是给"美国的一个机会"。

然而，由于丘吉尔"走得太远了"，华盛顿的反应只能是有保留的。

无论怎样，丘吉尔对美利坚的"警告"毕竟发出了。

丘吉尔直接了当地警告美国人，一切"坏事"都来源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

1949年3月23日，美利坚合众国，波士顿工学院。

数不清的人站在台下，聆听着时代"巨人"丘吉尔先生发自肺腑的"警世恒言"。

丘吉尔这次美国之行，是为了巩固"富尔顿讲话"的成果，如"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人所面临的威胁，如同纳粹德国及其朋友们的威胁那样严重"，如此之类。）等等，特别是为这

一步阐述他的思想，使美国“新政策”从犹豫不决和左右摇摆的状态下走出来。采取强硬的态度，那就是说，他必须让美国从最高层的领导集团到下层的普通公民，都很好地“吸取教训”。

丘吉尔在波士顿工学院讲话的公开主题是“20世纪，它的允诺和成就”。但实际内容，却让人感到总是有些文不对题。

在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上，如果说在“富尔顿讲话”中尚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的话，那么，在波士顿，丘吉尔已把自己的思想展示无余——他公开煽动美国人准备为消灭布尔什维主义而奋斗。

丘吉尔说：“事情的发展证明，过去我认为有义务向你们发出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

丘吉尔直截了当地警告美国人，一切“坏事”都来源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因此，只有到苏联不复存在的那一天，全世界才能重新获得安宁。

他“语重心常”地说：“今天，如此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的是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未能做到把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襁褓之中。”丘吉尔认为这是盟国的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犯

下的致命的“错误”，如果当时扼杀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获得成功，今天就不会存在红色苏俄了。

丘吉尔坚信，昨天没有做到的，今天可以做到，因为和那个时代比，盟国没有变，他们是能够“把布尔什维主义扼杀的”。

在丘吉尔看来，布尔什维主义同希特勒主义一样是应该被消灭的，讨伐布尔什维主义同讨伐希特勒主义一样亦将是合乎情理和正义的。他说：“我现在与之打交道的，是某种跟希特勒同样狡猾的东西，但从某些方面看更为可怕。”

他进一步指出，希特勒只能利用贵族老爷们的种族的骄傲和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克里姆林宫的 14 个要‘有他们自己的’反上帝的宗教”，“得到世界最大的军队的支持”，并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而这是任何一个沙皇所从未成就过的事业”。

丘吉尔在波士顿又采用了他惯用的虚张声势的手段，高声呼吁：俄国人“现在又骑着他们的战马大批地杀过来了”，英、美两国应该赶快行动起来，把俄国人从欧洲赶出去！也许他已忘

记了，在对德战争最关键的时候，他是怎样渴望俄国战马大批地到来。

可见，丘吉尔正在超越“杜鲁门主义”——他不再满足于“遏制”苏维埃俄国，想是想把它从欧洲“赶出去”。

丘吉尔之所以在承认苏俄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军队的支持”后，又提出如此“大胆”、明了的计划，那是因为他知道盟国手中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所以“昨天没有成功的，今天就可以成功”。

丘吉尔庄严地宣布：“我们肯定并不拥有无限的时间来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丘吉尔的大脑中，充满了关于发动“预防性战争”的种种问题。

为了使美国人更深刻地认识苏维埃俄国的存在所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把它从地图上抹掉的必要性有切肤之感，丘吉尔把“中国问题”挂到“苏联问题”上，这样，丘吉尔就选择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对美国人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

“只顾欧洲”是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的，还应该“考虑亚洲”，“自从我们取得共同的胜利以

来所遭到的最大的灾难，就是在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和阴谋活动的夹击下，中国陷落了。”——他无情地用手把盐撒到美国敞开着的伤口上。

他的论证既简单又直接：美国之所以输掉了在中国的赌博，是因为盟国未能做到把红色俄国消灭在十月革命刚刚成功之后。现在，既然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这一局，就应该设法在欧洲赢回来：要从根本上重新开始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并且要斩草除根，把苏维埃国家干掉。

丘吉尔似乎颇感遗憾地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责任并不在他，“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理想”是，“曾经希望”战后苏联能够“进入各大洋”，能获得“各种原料”，“到处都会如接纳幸福的大家庭中的亲兄弟一般接纳俄国人”。

这样，丘吉尔的意向就十分明确了——“可恶的”只是“克里姆林宫的14个要人”。

所以，他在波士顿的讲话中再次倡导对苏联实行“实力政策”，发出了“在暴政面前”要团结、要强硬这样一个颇能迷惑人的号召，他高呼：“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前进！除了

上帝，我们什么也不怕。”

丘吉尔在波士顿的讲话，在美国无疑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再次挑动美国人反对俄国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所做的，只不过是证实了他在莫斯科、也在华盛顿已经获得的名声。

1945年5月，斯大林在同美国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话时，责备了美国人向英国人“看齐”的行为。当大使问斯大林为什么他认为一个大国或一些大国似乎威胁着苏联时，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回答：

“因为有丘吉尔！”

1949年9月23日，苏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丘吉尔成为苏俄炸弹的第一个受害者

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政策是建立在美国的绝对优势之上的，而美国的优势又来自于核垄断。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中，告诫美国人永远不要同俄国人分享原子秘密，他说，否则，无异于是“一种犯罪的疯狂行为”。同样，在波士顿的讲话中，他又固执地重提这个问题。他说：

"如果没有原子弹引起的恐惧，欧洲早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成为共产主义的了，伦敦也会遭到狂轰滥炸。"

他在1948年12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保持美国原子垄断的深刻的政治理由，他说，西方国家应当在苏联也拥有原子弹之前，努力同它达成一项"协议"。他认为，这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的希望。

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丘吉尔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所以倡导反苏战争，是为了避免苏联的"侵略"引起世界战争。消灭了苏联，也就消灭了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他声称，在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他就料到了苏联发动"侵略"的可能性，并且说，他仿佛看见俄国人侵入了英国。丘吉尔告诉人们，如果英、美军队放弃他们在德国占领的划归苏联的区域，所有这一切不幸就会猝然而至。

然而，丘吉尔的"恐惧"完全是想象中的，当英、美军队撤退以后，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如果美国人接受丘吉尔关于发动一场对苏联的预防性打击的观点，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早就爆发了。

美国的原子垄断地位使它能够推行一项基本上属于“修改现状”的政策，而这项政策旨在改变欧洲的政治和领土现状，削弱苏联的地位。执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将出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这一政策忠实地体现在共和党的纲领中，它被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把苏联推回东方”——“解放”处于布尔什维克“暴政”统治下的国家。

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是整个美国政策的目标，“原子垄断”使美利坚合众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苏联即使不被从地图上抹掉，也被削成二流国家，那么，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美国称霸于世界。建立在核垄断上的美国政策并不排除战争，因为胜利对美国来说是肯定的。

1949 年 9 月 23 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继美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这一天爆炸了。

苏维埃俄国拥有了原子弹使英国失掉了它进行政治赌博的王牌，并且再也无法获得别的什么王牌了。伦敦感到了苏俄原子弹的打击，就是这个原因。

苏俄的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原子垄断，消除了美国的绝对优势，这样，美国人就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抉择。

——给俄国人以时间去发展新武器，放弃美国的绝对优势，容忍在共同拥有原子武器的基础上，建立美、苏之间新的均势；

——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一场"预防性战争"，阻止苏俄也变成一个原子大国。

这使得美国的对苏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华盛顿摈弃了关于"预防性战争"的思想，因为美国人深知，新的力量的均势——原子均势与美国的原子垄断时代不同，它是把战争排除在政治手段以外的。

伦敦发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电讯说："俄国人成功地爆炸原子弹的消息，对伦敦是个沉重的打击。"的确，苏俄的原子弹在美、苏之间建立了新的核均势，从而使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变得遥远了。

在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丘吉尔一心想赢得"和平"，由于胜利的形势对苏联十分有利，他便认为"和平"已不存在了。因为，丘吉尔的"和平"是英、美通过战争，或者不诉诸战

争，通过它们的优势施加的压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强加给苏联的那种"和平"。为了扭转这一形势，他竭尽了全力。

美国的原子垄断使丘吉尔以为可以顺利地达到他的目标了，但随着美国原子垄断的结束，丘吉尔的这一希望也破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丘吉尔是苏俄炸弹的第一个受害者。

此时，英国比其他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加感到，核战争已不再是一种政治手段了。英国躲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不受伤害的日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不复存在。在一场新的世界性冲突中，英国正处于核战场的第一线。

苏俄的原子弹，开创了"理智"的新阶段。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了。美国的政策将逐步地摆脱诸如"推回去"、"预防性战争"和"不可避免的战争"等主张，而一些新的思想，在新的核条件下诞生了，如"缓和"、"共处"等等。

美国对原子垄断时期的结束，意味着和平不再是丘吉尔所希望的那种"和平"。现在的"和平"将是在大国的核均势下，战后所形成的在领土和政治方面保持现状的"和平"。这一"和平"将经受住诸如越南危机、中东危机和捷

克斯洛伐克危机等的冲击，并通过各种力量之间的“对话”方式来加以“保持”。

英国人不仅不再向往战争，而且成为特别关心阻止那些尚能玩火的人。

第一个启动制动器的人，恰恰还是丘吉尔。

当丘吉尔再次上台执政时，他便不再重提那充满火药味的“富尔顿警告”和“波士顿警告”了。

历史的发展已到了这样的时代：

要么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彼此和睦相处，要么在核战争中同归于尽。

除了和平共处之外，人们别无选择。

“丘吉尔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象帝王一样……”

在离职的那些年代里，丘吉尔在战争后期变得衰弱的身体明显地好转了，这除了因为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渴望复仇而使他精力充沛并勇气十足。

但是，岁月无情。他在青年时代所爱好的各

种体育运动都在渐渐地疏远他。

这一时期，丘吉尔有了新的嗜好——赛马。1949 年，丘吉尔的小女儿的丈夫麦里·克里斯托夫·索姆斯送给他一匹赛马。从此，丘吉尔开始用自己的马参加赛马。他还给马专门雇了一个教练。

丘吉尔心爱的赛马名叫柯罗尼斯特卫，如果不是外出旅行，他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去看它训练，或给他喂食，有兴致的时候，还会给马洗刷，甚至同马聊上一会儿。这匹赛马在比赛中曾 13 次获胜，给主人赢了大约 12000 多英镑。每当柯罗尼斯特卫参加比赛时，丘吉尔通常是整天呆在赛马场上，紧张地关注着比赛的情况。当柯罗尼斯特卫取得胜利时，丘吉尔高兴得简直象个小伙子。

许多时间丘吉尔是在查特韦尔度过的，他醉心于乡村生活，查特韦尔刚好成了他的世外桃园。

丘吉尔特别喜欢动物。他在查特韦尔的湖里养着澳洲西部的黑天鹅；池塘里养着各种珍奇的鱼类，只要他敲敲铺路的石板召唤它们，它们就向他游来。

丘吉尔最心爱的动物是小巧的深棕色的狮子狗鲁菲斯，当这只小狗不幸被汽车轧死时，丘吉尔异常伤心，因为他与这只狗几乎形影不离地共同度过了好多日子。朋友们都非常同情他失去爱犬的那份痛楚，后来，一位朋友帮他弄到了一只同样的狮子狗，取名鲁菲斯第二，这才稍稍使丘吉尔得到些慰藉。

坐在查特韦尔色彩缤纷、馨香扑鼻的花园里，丘吉尔在感到下野的轻松之余，总是禁不住地觉得寂寞。他一点也不服老，他的思想还十分活跃。

他的老朋友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即将去世；年轻些的朋友则忙得分不开身；孩子们也都已结婚成家，自己过日子去了。虽然有心爱的妻子经常在身边，他有时还是感到有点无聊。所以，除了写作之外，他便用绘画来打发时光。当他用笔名展出的两幅画被皇家美术院选中后，他感到十分满意。1948 年，美术院将丘吉尔选为名誉院士。

如果有人邀他去一座漂亮的别墅共进美餐，他总是表现得情趣盎然，在这些事情上，丘吉尔的头脑出奇的简单，别人可能有些什么想

法，这对他毫无影响。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夫人很少愿意同他一起去作这样的访问，但不管他是不是充分理解她的顾忌，他认为自己是没有义务受到这些顾忌的约束的。他本人总是乐于尽自己的一切和他所能给人的乐趣使他所喜欢的人得到满足。他认为别人也跟他一样。他自己以为他追求享受反正只不过是他的具有许多优点的性格中的一个小小缺点而已。

G·佩林写道："退居在野党期间，丘吉尔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象帝王一样……"

按照不列颠王国的规定，遗留在大臣和将军们手中的官方文件，在他们退职后，自动为他们所私有。丘吉尔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权利。

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下野后的丘吉尔打算利用离职这一段时间把它完成。

他接受了别人的建议，认为完全由自己承担是不明智的，可以由别人代替他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把许多海军、陆军和空军的军事专家、学者、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召集到自己身边，组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机构，它的任务是核对事实，查阅材料，并对他本人不太了解的问题做一些

简要说明。除此之外，在丘吉尔那里工作的还有两个很能干的秘书班子，每天工作8个小时。

许多人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在丘吉尔的著作中被提到，同时希望被描写得更完美一些。这样，丘吉尔能够得到来自全国各方面的著名活动家和专家们的主动帮助。过去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们乐意答应丘吉尔的请求，详细地把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写出来。

丘吉尔的新著作包括的事件很广泛。他详细地研究了1/4世纪的世界历史。当然，他写的事件首先是欧洲的，但也写了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丘吉尔是以这种观点——历史不过是叙述以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人民群众为背景进行活动的善良或凶恶的英雄们的事迹，作为写作原则的。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丘吉尔自己。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战争年代里，所有正确的、明智的决策，首先归功于他丘吉尔；所有的错误和失败，都归咎于希特勒的狡诈，或被解释为由于英、美、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的愚蠢或外行。

在评价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钱多斯勋爵说："捍卫大不列颠人种的光荣、名誉和天职，是丘吉尔著作的最重要部分。"丘吉尔在书中用丰富的表现手法来描述英国的伟大，英国人种的优秀，他甚至认为英国和英国人优于所有国家和人民。

丘吉尔在著作中提到了苏联在反法西斯事业中的决定性贡献。但他又竭力证明，英国政府是忠实善良的，是力图维持伟大的合作政策的，而由于苏联政府的种种行为破坏了这一联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丘吉尔按着自己的思考，解释了战争年代英、苏合作的原因，为丘吉尔在战后所倡导的反苏路线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丘吉尔在书中从头到尾，时刻都在宣传英美间的紧密合作。但丘吉尔指出，美国人对英国人是不够友好的，是蠢笨的，在战争过程中经常地不能正确地估计世界形势。丘吉尔写了许多关于战争年代中美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和殖民地方面侵犯英国利益的事件，并向读者们生动地描述他是怎样坚强有力地反击美国的侵犯行径的。

丘吉尔歪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客观结局。他认为，由于苏联的恶劣举动，战争的结局给英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造成了悲剧。从丘吉尔的书中可以看出，早在1945年春天，他就企图用英美的武装力量把苏联赶出东欧，并镇压在那里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

同以往一样，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尽力去收录那些对自己有利，或能使他本人和不列颠帝国获得荣誉的事件。所有不符合他观点的事件，全都被他放弃在一边。

在许多重大事件上，丘吉尔出于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例如，关于第二战场的问题，关于英国派遣武装护航队到北方港口的事件，等等。

正如安奈林·比万在下院所讲的：

“丘吉尔能够修正历史，如果碰上他所不能接受的事实，这件事就会飞向天外。”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尚在写作之中时，丘吉尔便开始着手进行声势浩大的广告战，使得该书在出版前，便广为人知，接下来这本著作获得诺贝尔奖后，更是家喻户晓。美国和英国的著名杂志竞相争取得到首先连载丘吉尔著作

的权利。据说美国《生活》周刊花了近乎200万美元购得了这个权利，加上其他出版机构和许多国家付给他的稿费，的确不是个小数目。据报纸公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仅仅几年时间，丘吉尔出版书籍和文章所得的稿费收入就达100多万英镑。

1965年《星期日太晤士报》写道："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

"哈巴狗又丢掉了自己的骨头。"

在1945年落选的那一刻，丘吉尔心中便已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他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自己和自己政党的政权，改变选民们在倒霉的1945年对他的判决。

由于在1945年大选后工党在议会中保持稳定多数，这就意味着这个政府可以持续到5年期满，并且不能排除工党在下届选举中仍将取胜的可能。

但71岁的丘吉尔雄心不减当年，对重返唐宁街10号充满信心："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

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象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如此看来，丘吉尔在议会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工党政府的威信。

虽然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比其他国家小一些，但是仍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它的财政恶化，战争的支出超过了250亿英镑，国债增加了两倍。由于法西斯飞机轰炸造成的巨大的损失，船舶、货物和工业资产的损失以及海外投资的损失等，加在一起约占整个国家财富的1/4。英国工业产品下降，出口贸易锐减。

英国统治集团趁着某些竞争对手由于战争而削弱的机会，利用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集团来扩大出口贸易，但这方面的效果是不稳定的，并且这也不会是长久之计。

面对着诸多困难，工党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加工业投资；对煤炭、电力、天然气、国内交通等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并进行了改组。在采取这些措施后，使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占整个英国职工总数的1/4。工党政府似乎要通过各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在英国造成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从而把资本主义经济变成混合

式经济。

但是，工党的“国有化政策”，按其性质来说，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其结果是促使垄断资本主义加速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工党政府所实行的社会保险、国民教育和保健等方面的政策，也没有改善劳动大众的生活状况，相反却加强了对这些人的剥削程度。

战后初期，英国工业增长虽比一战后要快一些，但与其他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比，速度还是要慢一些。英国国内的劳动大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生活水平，不得不坚持罢工斗争。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消灭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运动，导致了许多英国殖民地取得了自由，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府，其中包括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大不列颠帝国的崩溃严重地削弱了英帝国主义。

为了维持驻外军队和镇压游击队运动而需要的巨大的军事开支，殖民体系的瓦解、经济的高度军事化和国家垄断官僚机构的膨涨，使不列颠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地位“今非昔比”。

在战后的头几年，工党政府的政策没能扭转英国国内的困难局面，也没能提高英国的国际威望。相反，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工党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了违背竞选诺言的政策：

工党政府不顾1942年英苏条约的有关规定，抛弃了和苏联的联盟，而与美国一起进行“冷战”，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同美国一道，在暗中破坏裁军。

1949年4月工党政府与其他许多国家签定了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公然违反三大国在波茨坦商定的对德政策，在西德复活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

工党使英国卷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英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军备负担。英国人民越来越认清了工党所说的“国家普遍富裕”等的空洞性和欺骗性。

在战后年代里，丘吉尔对议会活动不太感兴趣，他不经常出席下院的会议，有时也做一些不太成功的演说。

丘吉尔对工党政府的谴责，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他断言，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完全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特定的

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他预言，工党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经济不可避免的破产。

当工党政府通过下院讨论进一步限制上院权力的法案时，丘吉尔攻击政府的法案。工党在提交这一法案时重新宣读了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说片段，从而使保守党在有力的自相矛盾的证据前面丢尽了脸面，成为工党讥讽、嘲笑的对象。

丘吉尔的言行在保守党中颇不得人心，他一意孤行，从不听从任何人的意见，不征求保守党领导层的同意，就在议会发表演说，从而给保守党造成了许多尴尬和被动的处境。

尤其令保守党活动家们不能忍受的是，丘吉尔没有考虑英国人民的情绪就对政府的政策妄加批评。丘吉尔的伙伴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清楚，在当时的复杂条件下，工党政府不可能废除战时形成的对经济生活的国家监督，同时也不能不对许多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化，不能不实行新的社会保险制度来向工人阶级让步。

作为反对党的领袖，丘吉尔没有充分注意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没能组织起一个有统一领导的坚强集体，把下院的保守党人联合起来，制

定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以赢得下一次议会选举。

当听说保守党有人提出必须制定一个政策以赢得选票时，丘吉尔不仅不予以肯定，反而非常气愤地说："反对党领袖的责任就是攻击现政府，只有这一点，没有其他。"

于是，许多中年的保守党，如R·A·巴特勒，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以完成丘吉尔作为党的领袖应该完成却没有完成的工作。

这时保守党的刊物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标题为："丘吉尔是不是保守党的累赘?"

丘吉尔的固执和不适应新情况，在客观上已使保守党遭到损害。但是，保守党又不能没有丘吉尔。保守党没有其他在国内有巨大威望的著名领袖能够吸引选民的注意力。丘吉尔在战争中赢得的荣誉，成为保守党争取选民好感的一张王牌。

丘吉尔在富尔顿警告过美国后不久，1946年9月19日，他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又发动了新的轰动一时的宣传活动。

这次他建议建立所谓统一的欧洲，以此与苏联对抗，并用欧洲反动派的联合势力来消灭东欧各国人民取得的民主及社会主义。按照丘

吉尔的意见，在统一的欧洲中，德国将是主要力量。由于当时人们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记忆犹新，丘吉尔就号召人们“应该把过去的恐怖放在脑后，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在未来……忘记所有的罪行和恐怖”。

在丘吉尔的计划中，“统一的欧洲”不仅是英国的反苏堡垒，同时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也是英国的后盾；依靠不列颠王国的实力和“统一欧洲”的支持，英国可以和美国平等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在丘吉尔的讲话中，暗示了“统一的欧洲”在恢复英帝国往日地位的计划中应起的作用，这是值得注意的。

他还发展了“三大势力范围”的观点，认为第一势力范围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以及所属地区；其次是英语国家，其中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英国自治领起着重要作用；第三就是“统一的欧洲”。丘吉尔说：“事实上，我们（英国）是主要的联系中心”，“是在各个势力范围内都起重要作用的唯一国家。”

1948年10月，丘吉尔在兰达诺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中主张，立即毫不拖延地向苏联提出

坚决的要求——“在东欧各国消灭人民民主制度，从德国和奥地利撤出占领军。世界各国自动取消共产主义运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消除民族解放运动，让国际垄断组织能够剥夺苏联的‘广阔土地’，最后在苏维埃国家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真理报》的评论文章选段）。这是一个挑起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侵略战争的庞大计划。

1950 年，丘吉尔在英国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断言：“如果在欧洲领土上，从英吉利海峡到 1938 年的苏联边界内，没有统一欧洲的自由伙伴，那么西方国家政策的主要目的便没有达到。”

战后 6 年当中，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执行了丘吉尔制定的计划。1947 年英、法签订了同盟条约，迈出了扩大反苏集团的第一步。1949 年，在英国的积极努力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在国内反对革命运动，在国外反对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及联合王国的成员国派军队与美军并肩作战。

在 1950 年英国大选的前夜，丘吉尔了解到

英国人民希望和平、希望同苏联友好的愿望，在选举运动中及时地提出了“同苏联重新进行最高级会谈的主张”，企图以此取信于民，而实际上这个声明无任何实际内容，甚至连他的工党朋友见文也看出了他的“把戏”。

保守党很好地准备了这次选举，他们改组了党的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在选民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相反，工党的纲领却比1945年大选时后退了。

选举的结果是，艾德礼政府依靠下院中17票的微弱多数，继续执政。但这种局面使政府的地位很不稳固，很可能在近期就将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对于丘吉尔在1950年的议会选举中又未能上台执政一事，埃默里斯·休斯是这样描述的：“哈巴狗又丢掉了自己的骨头。”

“温斯顿老了，他的事业已经是过去了。”

由于工党政府推行的政策违背民意，降低

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增加了战争危险，使得英国国内的形势颇失稳定，同时也使工党领导集团内部产生了尖锐的分歧。这一切迫使工党政府于1951年10月25日提前举行选举。

使丘吉尔非常不安的是，人们认为他是战争贩子。为了在公众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丘吉尔许诺：如果保守党执政，将与美苏首脑举行会谈。

1951年10月25日，选举结果揭晓。保守党得到321席，工党得到295席，丘吉尔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当选为英国首相。

这次担任首相职务，使丘吉尔非常满意。他非常清楚，1940年他担任政府首脑是因为当时复杂的特殊条件造成的。而1951年的这次担任首相职务，是在他所领导的政党于选举中获胜后争得来的机会，完全符合英国传统。

根据战时的实践经验，丘吉尔自己担任了国防大臣，海军、陆军、空军大臣皆隶属于他。

对整个内政问题，丘吉尔依旧很少过问。这方面的问题均由大臣们独自去处理。首相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外交政策上。

1952年1月，丘吉尔带领一大批专家和顾

问到达美国。这次美国之行涉及到一系列重大问题。丘吉尔想得到美国人的帮助以完成其扩军的计划，达成了美国向英国提供钢材、交换有色金属的协议和两国共同使用美国在英国岛屿建立的军事基地的协议。与会者准备深入商讨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一切重大问题。总统和首相同意支持欧洲防务集团，并使西德加入有英美参加的军事集团。

丘吉尔政府继续执行“实力地位”政策，并对原子能的研究给以极大的注意。

早在 1945 年美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丘吉尔便正确地评价了科学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新武器的意义。但是他对于原子能问题的政治观点则是错误的。他企图用原子武器威胁苏联，使其屈服于英美。

1949 年 8 月苏联的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对丘吉尔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这之前丘吉尔认为斯大林并不了解美国拥有核武器的意义（通过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听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消息时的反应），并断定苏联需要很大时间才能揭开新武器的研制秘密，而现在看来，丘吉尔的确判断错了，就如同他曾断定美国人会向

他透露原子弹的秘密，而实际上又订出了一份“麦克马洪决议书”一样。

据丘吉尔透露，他的工党先驱者们已经为原子能规划耗费了近1亿英镑，但这些费用对议会是隐瞒的，议会之所以没察觉，是因为供应大臣在预算中把用于制造原子武器的费用列入了工资、建筑、仓库等项目。每当谈及此事时，丘吉尔脸上总是禁不住露出“赞赏和羡慕”的表情。

1952年10月3日，英国试验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丘吉尔坚信，有了核武器必然会加强在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必然会有利用他在富尔顿演说的精神来“调节”同苏联的关系，即有利于在“冷战”中取胜。丘吉尔认为，有了原子弹，就会使英国在同美国打交道中的愈来愈不平等的状况有所改善，会使英国政府能够与美国人进行平等的谈判。

丘吉尔抱有这样的希望——有了原子弹，大不列颠便可以恢复其昔日世界大国的地位。但丘吉尔及其政府中其他的保守党人没有估计到，参加核军备竞赛必然导致经济破产，因而削

弱了英国在各列强中的地位，尽管对此有许多权威性的警告，但这些呼吁都没被理睬。

1955年保守党政府决定全力以赴地开展研制核武器的工作。

1957年5月15日，英国制造的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在执政的最后阶段，是丘吉尔政治生涯中最平淡的时期。消灭社会主义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一统的战略思想，这时已过时了，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做出了相应的结论：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新的力量均衡，这种力量均衡，是在相互都有毁灭性武器的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不仅不能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而且如果采取这种尝试，处于核前线的英国将首先被消灭。

无论怎么说，首相毕竟已是近八旬的老翁了，虽然看上去他身体十分健康，精力充沛，但实际上他的躯体已开始衰弱，耳朵也逐渐聋了，并且日趋严重。他说起话来已有些颠三倒四，办事常常力不从心。丘吉尔伤心地说：“我再也无法提出什么创见了。”

1953年6月丘吉尔中风之后左半身瘫痪，

接着又大病一场，生命垂危。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帝国政府对丘吉尔的病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丘吉尔周围的人看到他的病情，都认为他再也不能返回政治舞台了。但是，丘吉尔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生命力，他不仅治好了中风，左半身的机能也恢复了，并且在10月又出席了一年一度的保守党年会。

1953～1954年间，在保守党领导层中，愈来愈多地议论着丘吉尔辞职和更换保守党领导人的问题。

1954年11月，英国的上院、下院、驻伦敦的外交使团及各国在伦敦的高级官员聚集一堂，隆重庆祝温斯顿·丘吉尔80岁诞辰。贺词中说：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1953年由女王授予，同时还奖给他英国最高勋章）是伟大的英国政治活动家，是资本主义世界杰出的领袖之一。

人们共捐了2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要送给他一个生日礼物。

在保守党内，希望丘吉尔辞职的情绪日渐增强，这一点对他已不是什么秘密了。1955年1月，丘吉尔决定辞职。

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茶话会，感谢在那里曾和他一起工作的朋友、同事及工作人员，并和他们话别。

人们把他送到门口，此时门外已挤满了早已等待在那里准备为他送行的群众。丘吉尔用右手表示出象征胜利的英语字母“V”，他把手臂高高举起，向在场的人致意，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手势，它使人们回想起战争年代里那位不知疲倦的首相。

在跨入车门的一刹那，丘吉尔猛然回过头，不知是想再看一眼唐宁街10号，还是希望唐宁街10号不要忘记他。

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也许他回忆起了过去，也许他想到了未来，不管怎样，那泪水是真实的。

唐宁街相信眼泪。